

群衆

第十卷 第二十二期

要

解放區是取消不了的(社論)
動盪中的世界大局
越南的革命(下)

閻錫山批判

目

論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孫中山先生論三大政策

馬克思是怎樣研究和寫作的

于懷

張尙民

陳伯達

曉明

資料室

格略塞爾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解放區是取消不了的(君健)

時 論

再一次呼籲和平

美軍應立即停止參加中國內戰

建設東北必須實行民主

紀念孫中山先生論國是問題的根本上解決

文 獻

莫洛託夫在十月革命二十八週年紀念的報告全文

專 論

動盪中的世界大局

越南的革命(下)

論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閻錫山批判

孫中山先生論三大政策

馬克思是怎樣研究和寫作的

解放區報告

從村選看邊區民主生活(晉冀魯豫行進)

文 庫
 談折扣
 美國人民的利益與安全烏乎在!

讀葛季的小說(書評)

國際職工會的組織及其權(讀者之頁)

(七七〇)

(七七二)

(七七四)

(七七四)

(七七五)

(七七七)

于 懷(七八四)

張尙民(七八八)

曉 明(七九一)

陳伯達(七九八)

資料室(八一五)

格略塞爾(八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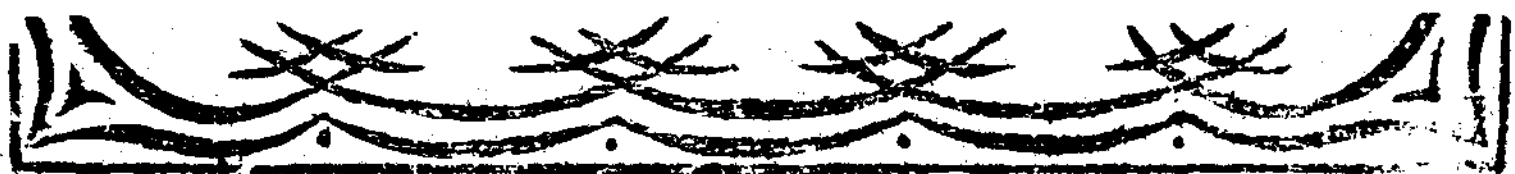
周而復(八二二)

荷 寢(八一二)

黎 望(八一九)

鉗 耳(八二五)

編 者(八二五)





社論

解放區是取消不了的

在國共代表會談話中的第十項就是關於解放區地方政權問題。對這問題，中共在會談中提出四種解決方案，都未為政府方面接受，最後雙方同意繼續商談該項問題。不料會談結果方寸發表，據說解放區地方政權行動已極大受限制。這動搖一面全國用軍事行動來消滅解放區，一面又尋找種種理由來否認解放區。我們願意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反對解放區的人有一種最幼稚不過的說法。他們說：解放區這名稱在抗戰時期還有價值，現在抗戰已經結束，解放區自然就應取消。但要知道，解放區不是一個空名號，而是有它的實際內容的；因為這種實際內容並未有消失，所以這名稱就不應隨便取消。反對派所要求取消的價值也並不是其名義而是其實際內容。

解放區的實際內容是什麼呢？抗戰時期在深入中國領土的敵軍的後方人民自動起來，拿槍或投，組織佔領的軍隊，使敵後極廣大的地區恢復中國人民的主權。這些地區不同於在敵偽統治下的淪陷區，兩者解放區，自然起點也不同。但是這些解放區，並不是在淪陷區相對比的時候，才顯出其特點；假如只是抗戰，那麼現在抗戰結束，淪陷區已經開始渡過了，解放區的特色也就不存在。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

解放區人民為什麼能組織軍隊，光復領土呢？他們必須有足以打敗侵略者的實力，他們更必須有能夠團結人民力量，照顧人民生活的地方政權。而這些軍隊是守土衛民之軍和官員們早已在敵後佔領時期，紛紛組織起來了。地方政權，雖然在敵後佔領時期，而且人民由敵人的剝削，也已知道，應如何組織軍隊和官員們回來是一點好處也沒有。於是，人民不但不自己給自己製造。人民用民主的選舉方法選出了各級的地方政府，人民又根據自願的原則組織了抗日的武裝力量。因為這些自願的政府，人民的實力，所以就能很好的組織了組織人民，抗擊敵人

，和從事社會建設的任務。他們在那裏做到了孫中山先生所希望的實力為人民所有，也在那裏真正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因此他們才能在敵人最後階段的進攻下保持着一部分領土，並且不斷地牽制敵人打擊敵人；他們才能在最困難的物質條件下用合理的經濟政策調劑各階級的利益，發展生產，提高最大多數人民的生活。他們真正做到了抗戰與建國並行，他們一方面直接對於抗戰盡了大功，一方面又以他們的民主建設來做了新中國的模範。民選的政府和人民的軍隊就是解放區的基本內容。所以在抗戰時期，解放區固然和淪陷區不同，和大後方也是不同的。

現在抗戰雖然已經結束，但是解放區在抗戰中的功績難道就可以一筆抹煞麼？八年來許多線在大後方的人都得了「勝利勳章」，抗戰有功的解放區軍隊得不到什麼勳章也就罷了，怎麼可以連他們已經得到的民主權利和榮譽都奪掉呢？到現在，因為因為敵人已經投降，淪陷區的實際內容和名義都已經不存在，但是解放區和全國其他地區不同之處却還是在於此。這固不必說在淪陷區，解放區已經實行了民主，而且行之有效；人民已經得到充分的民主權利，已經產生了民選的政府和人民的軍隊，而在全國其他地區都沒有。這固不必說，意義非常重大，誰也無法否認。既然解放區有這樣的實際內容，為什麼還說名義不存在呢？但我們已經說過，名義不是重要的事，假如你不喜歡這個名字，你可以換用別的法法，你可以因為只有在那裏是真正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叫民主的地方自治，改而稱之為民主自治區，以別於其他還實行着一黨專政的地區，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反對解放區的人又說：解放區有軍隊，政治情形又和別的地區不同，所以這就是所謂獨行。這種說法更加不通。

解放區是有軍隊的軍隊，但有了軍隊有什麼不好？假如解放區還有軍隊，早在抗戰八年中敵人的敵人消滅了，現在現在，事實證明，解放區

軍隊的存在也便沒有必要。假如沒有軍隊，解放區的民主建設還不是被反動派大軍所一舉消滅了麼？假如放區沒有軍隊，反動派社會不用武力進攻麼？這話聽也不相信，江南新四軍已因遵守雙方協定而撤出，但反動派還是一樣調兵遣將去「清剿」已經沒有軍隊的解放區，屠殺那裏的和平的老百姓，因為反動派所討厭的是解放區民主建設，沒有人民的軍隊來保衛，解放區的民主建設隨時都會受到破壞和摧殘。

但是假如說，解放區只是靠武力而存在，那却是完全不合乎事實的。固然，解放區倘無自衛的武力，就會被摧殘，但是解放區倘若沒有民主政治，雖然有武力，也還是會失敗的。只要反對解放區的人沒有武力，那麼解放區就完全不需要武力。他沒以武力也一樣能生存發展。解放區之所以能生存發展，在基本上是民主的力量表現。

在封建時代有武力割據的現象。地方的割據勢力和中央的統治勢力，在政治上其實沒有什麼不同。在中央的是大皇帝，是依靠武力的專制統治；在地方上的是小皇帝，也還是依靠武力的專制統治。這就叫做割據。所以奉天割據之名加在解放區身上是最愚蠢的謬誤。難道可以說，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建立的政府對於北洋政府是割據麼？廣州政府是有武力的，但我們不說這是武力割據，因為廣州政府是民主的進步的政治，而北洋政府是封建的，落後的政治。要說割據，只能說北洋政府是割據，因為他完全依靠武力而存在，失掉了武力，他就立刻會自行崩潰。就這點說，現在的情形也正是如此。解放區政治和其他地區內的政治情形是不同的。其不同就在於解放區政治是民主的，進步的；而在國民黨地區內的政治是一黨專政的，不民主的，落後的政治。何況乎現在的解放區並不像孫中山的廣州政府那樣企圖以革命武力來推翻北洋政府，解放區之保有武力只是在萬不得已時作為自衛的手段，解放區的民選政府也居於地方政府的地位，只是企圖拿自己的民主建設的實驗來作為全國其他地區的模範。假如這就叫做「割據」，那麼中國人民是歡迎這種「割據」的。

反對解放區的人理屈詞窮，最後只好拿出抽象的「統一」二字來做法寶了。他們說，不管怎麼樣，中國現在總是非求統一不可，解放區是統一的阻礙，所以非消滅不可。

我們並不反對統一。解放區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解放區政府是民選的政府，但解放區軍隊願意在全國軍隊合編整編之下減縮其數目成為正規的國防軍中的一部分，解放區政府也願意在正式承認為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的地方政府。這豈不是為了達到命令軍事的統一麼，所以假如說現在中國還不統一，那麼其責任並不在於解放區，而在於不承認解放區的人。現在的事情是解放區願意統一，要求統一，而反動派却硬不願承認解放區，他們以不承認的手段來使解放區負損分裂的罪名，他們以軍事進攻的手段來逼得解放區不得不以人民的武力自衛。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承認解放區呢？因為在他們看來，既是統一，就要做到全國一切地區的政治完全一模一樣。其實我們也不反對全國政治達到同樣的水準，問題只是：還是應該取消解放區的民主來做到全國政治一樣一樣呢？還是使其他地區也和解放區同樣地實行民主政治呢？很顯然的，我們只應該對落後的走前進步去和進步的看齊，不應對進步的退後進步去和落後的看齊。

但我們並不是空想的清一色的統一論者。全國一切地區都像解放區一樣的實行民主，雖然是全國人民所努力爭取的目標，但在現在還不能一下做到。我們不能不承認，全國各地區政治發展不平衡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種不平衡的狀態上根據民主的原則，建立統一的國家。已經實行民主的地區要更加民主化，同時引導別的地區也逐步向民主的方向前進，最後終於達到全國一切地區都實現高度民主。這樣的統一，是可貴的，也是有益的。相反的，企圖以落後的政治為標準來實現清一色的統一却是不可能的。他們喊叫統一，不是已經喊叫了多少年了麼？但因為他們自己不願意任何民主進步的改革，同時還要去破壞已經實行民主的地區，所以他們的統一也就從未實現過。他們只能依靠武力進行內戰來實現他們的統一論，萬一他們的統一竟能實現，那只是加深了人民和國家的災難。就過去的歷史經驗看，就今後的世界和中國的潮流趨勢看，所謂清一色的統一是一定不能成功的，因為人民決不答應這種所謂已經得到的民主權利被損害，更決不甘願跟隨反動者一起倒退。由此可見，解放區並不是破壞統一而是促進統一的力量。是阻礙統一呢？破壞統一的不是別人，就是那些反民主的反動派。因為他們堅持要消滅人民所已經獲得的民主權利，堅持要走反民主的倒退的方向，因為他們製造內戰，發動內戰，所以他們就成了破壞統一的罪魁。

以上所說種種反對解放區的虛構根據，本來都不值得駁斥，我們之所以不據詞費，一一加以駁斥的，就是為了可以出動別種種種看什麼是解放區的特色？為什麼反對派企圖取消解放區，為什麼解放區不應取消而應該發

揚光大。

由此可見，不要取消解放區，這在實質上，就是不要取消民主的問題。民主不應取消，所以解放區也不應取消。民主的解放區願做統一的中國中的一部分，而統一的中也必須包含著民主的解放區。中國應該成為民主的中國，全國的從地方到中央，政府都應該成為民主的政府，這是誰也不能反對的。現在還不該馬上做到全國統一，但是有一部分地區在抗戰時期已經有了民主的地方政府，那正是中國人民的榮光。中國的軍隊也應該做到孫中山先生的主張的武力與人民相結合，而且進一步做到武力為人民所有。現在雖然全國軍隊還不能做到這一步，但是在抗戰中已經產生了一部分真正屬於人民的武力，那也是中國人民的榮光。統一的中國政府應該不應該排斥這種種民主的地方政府呢？統一的中國軍隊應該不應該排斥這種種人民的武力呢？當然不應該排斥。在抗戰時期早就應該歡迎他們，排斥了民主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武力的統一為人民所反對，人民所贊成的統一就是包含著民主地方政府，包含著人民武力的統一，因為只有這種統一才是民主的統一，有這種民主的統一。

再一次呼籲和平

重慶現在正舉行軍事會議，國民黨的許多高級將領都到了重慶，路透社記者曾於八日由重慶報導說：「此間（重慶）的將軍們會告訴我：政府對共產黨的危險戰爭，是最近才採取的手段，但是他們並不否認，政府訂有作戰計劃。」又說：「此間廣泛認為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憤同美國駐華陸軍參謀長麥克魯中將的最近北行之行，不僅限於日常的巡視」。這個報導雖然詞句含蓄，但可以推測：第一，國民黨政府已定下了對解放區的通

盤作戰計劃，這一點從前吳國楨拚命否認，現在連政府人員也不否認了。第二，國民黨軍隊與美國軍隊將在華北共同有所行動，這一點從前魏德邁拚命否認，現在已成爲衆所周知的事情了。重慶的軍事會議如果其所討論的和所決定的正是這點，那末更大的戰爭，因之是人民更大的痛苦，都將不可避免了。

抗戰八年了，抗戰不勝利，人民願意向日本打倒，任何犧牲在所不惜。但是，現在抗戰勝利了，在國共會談中，中共方面曾提出一種最公道的辦法來解決解放區地方政府的問題，那就是，在這些地區內從新實行全民普選。各黨派各界人士都可以同聲參加選舉，由民選產生省縣縣級的地方政府，並一律由中央政府加委。假如實行了這辦法，那麼解放區現有的民主可以更擴大其基礎，而全國政令統一也就能够實現。連解放區這個名字也未始不可以取消。解放區以這種辦法，正是以證明那里是真正已經有了民主的基礎，而連這辦法也不肯接受的人，就是見他對於實行民主是一點誠意也沒有。

所以我們應該指出，現在沒有解決，而成為國內政治問題的嚴重所在，的解放區地方政府的問題，並不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之爭，而是民主和反民主之爭。全國主張民主的人一定都贊成在解放區內鞏固和擴大現有的民主制度，民選政府的制度，而且贊成全國其他地區只要有可能實行民主制度，都立即實行，只有反民主的反動勢力才把民主的解放區看做非加撲滅不可的敵人。但是用武力是取消不了解放區的，因為解放區人民所獲得的民主權利和全國人民要求民主的熱望都不是用武力所能取消了的。

，抗戰一勝利，人民一致的要求和平，再不願意打仗了。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明白的，在八月廿五日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中，就提出以和平爲當前全黨的第一個方針，第一個鬥爭目標。在四十三天的重慶談判中，中國共產黨作了許多讓步，包括退出八個解放區，和把一百五十萬解放軍縮編爲二十四師到二十個師，並在談判過程中及談判以後，即由長江沿岸和淮河流域撤走。中國共產黨方面這樣的讓步，曾在許多進步人士、民主人士中引起「讓步過大」的批評。但是，我們還是堅決讓步，目的爲了求得和平。平心靜氣，中國共產黨方面是沒有什麼可以責備了。

國民黨方面與共產黨訂了雙十協定，這個協定的方針，第一個也是和平，這是很好的。但是十月十日協定簽字，十月十二日發表，而九月十七日國民黨軍委會已經把「剿共字第一號給關錫山的命

會這好了，十月八日這這命令的飛機已滿載在河南無休，十月十三日的「委座西元帥」已經叫胡宗南「剿匪」了，十月二十四日這這命令就轉到胡宗南那裏去了，十月十五日委座巧電胡宗南時「負責圍剿伏牛山平漢路中段以西、黃河以南地區」「軒輊」皮定鈞、王樹聲部而撤之。」這這電報到十月二十六日就由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裴昌會轉發給十五軍軍長武庭麟了。一手簽定雙十協定，而另一隻手發出「剿共手本」和「剿共」命令，我們不說政治風度，就說說普通為人的道德也實在不應該。

是非曲直，現在是弄清楚了，我們除了提供上述事實外，是一句話也不願多說，因為國共兩黨的是非曲直，和全國和平比較起來，究竟是非曲直事小，全國和平事大，只求能達到全國和平，過去的事情譬如昨日死了也罷。

現在事情發展到一個新的段落，重慶舉行軍事會議正是當前時局的一個標誌。在過去的一個段落中，從雙十協定到十一月九日一個月的時間，由於人民的要求和平，反對破壞和平者，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官兵達到高潮對內戰，在一百萬黨軍進攻的國民黨軍隊中，有萬多人的起義，有八萬八千人放下了武器，兩者共計十萬人，即全部進攻解放區兵力的十分之一。這一個月的經過時間雖然不長，足以窺見人心的向背。這次重慶軍事會議究竟是什麼動向呢？這是一不依二不休呢？照甘其兩的報章看，國民黨當局是選擇了第二條路。

甘其兩雖然都說報章了，但是我們為了人民，為了民族，還要作一次呼籲。我們呼籲國民黨當局不要走內戰的道路，而應和平的道路。參加軍事會議的各位高級將領，誰能家管了誰無家管，誰不是吃老百姓穿老百姓的？你們的兵馬那一個不是老百姓出身？你們之中有許多對於內戰準備運轉的人，也有許多懂得內戰打不得的道理的人，在你們在這緊急關頭，把人民的意見反映到會議上，仗義執言，力爭停止內戰吧！中國實在不能再內戰了，實在要和平了，實在非和平不可了。在這時候，吃老百姓出的糧，帶老百姓出身的兵，却要強執動內戰，那實在天理人情都難容許了。國民黨當局不是說要「復員」麼？不是說要「恢復交通」麼？我們贊成得很，我們與其說贊成，不如說主動得更積極一些。因為東北解放區的人民，八年來受敵人「三光政策」的殘酷摧殘，實在迫切要求復員，迫切要求恢復交通，迫切要求休養生息，繁榮經濟。但如果你要打內戰，我們在作了仁至義盡的讓步之後，能夠不起而保衛自己的生命財產和民主權利麼？各大城市的居民商人，因為有內戰以交通斷絕，冬季沒有煤燒，沒有糧食，沒有生意做，能修不而要求停止內戰麼？能不起而反對國民黨當局現在正在起草中的「對共封鎖令」麼？為什麼一定要弄到「官逼民反」？為什麼一定要各階層人民都起來反對他們？

再請看看他們自己的隊伍，他們打了抗戰，吃了千辛萬苦死了也還願意。但是，為了內戰，誰願意做無謂的犧牲品。現在連「青年軍」都要求「復員」，連高樹勳將軍這樣的高級將領都起來反對內戰，人民和軍隊的和平要求，就如一堆大火，飛機擄去，只有燒死的份兒。即是想出了稀奇古怪的辦法：如拉了把老頭子刺了刺子穿上軍衣也算是兵了！試問不會有第二個第三個以致成千成萬的木大小的高樹勳將軍麼？

再其次，據說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為外國人的飛機大炮和技術，靠外國人的原子彈，靠外國人做開路先鋒，據說有了這一條就無往不利，那也不

是得吧？外國人總要的補償有一小批反動派，口口聲聲不干涉中國內政，實際上恨不得痛痛快快做一回帝國主義者，做一個東方斯考比。但是要知道外國人不只這一小堆反動派，還有廣大的人民和開明人士，他們同我國有朋友之誼，他們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退一萬步說，就算如願以償，得到了外國反動派的幫助又有什麼了不起呢？解放區人民總沒有「唯武器論者」，我們打過日本人並不能給他，任何利考比也不成，因為中國不是希臘。而且如果我們還有點民族觀念，何苦要去幫外國人引進來武裝干涉，使中國陷於殖民地地位，使我們自己利子孫孫再嚐亡國奴味道？中國能夠打敗了日本和廢除了不平等條約，難道你們就獨立不起來了麼？

我們千言萬語只是為了和平，依我們看來：和平有百利，實在有必要，內戰有百害，實在要不得。而要達到和平也很容易，共產黨方面已經讓步了，只要國民黨方面努力一下就夠了。這種努力包括明令取消「剿共」命令，包括明令停止內戰，撤退一切進攻解放區的軍隊，包括停止對解放區的進攻，停止對解放區的佔領，並停止進兵，包括以政治協商辦法解決受降、僑民與敵對解放區人民自治，和承認解放區軍隊就緒了，其餘問題，慢慢再談，政治解決，豈不甚好？如果不此之圖，在只言復員的掩護下，繼續派兵進犯解放區，則解放區軍民為了保衛民主自由的生活，唯有奮起自衛，如此內戰無法停止，和平無法實現，這一責任，完全應由國民黨當局負，蔣介石先生從四民黨六全大會以來不是高喊「政治解決」嗎？難道現在還說「不作罷了嗎？如果作新的勢，為什麼一定要揮動刀兵？（轉載延安解放日報十四日社論）

美軍應立即停止參加中國內戰

今天，在中國，本國人的內戰不
僅已經存在，而且正在擴大。據
本報昨日特約所指出：「內戰普遍地
進行於滿洲、廣九路、浙江、江蘇
、安徽、湖北和華北各省；且已擴大
到山蘇間，並有向東北發展的趨勢」
。這是中國人民的不幸，也是世界和
平的威脅。凡是真正同情中國人民、
擁護世界和平的國家，都不應該站在
這一內戰的發動者方面，來支持和參
加這一內戰。美政府雖然對華
政策所以能維持到中國人民的讚美和
擁護，就是因爲它不主持，更不參加
中國內戰。羅斯福總統雖然逝世了，
但現總統杜魯門會一再表明仍繼續維
持羅斯福的這一政策，並屢次聲明決
不干涉中國內政。這是中國人民所歡
迎的。然而不幸得很，事實上，美軍
在中國的行動已完全違反了羅斯福的
對華政策。它不僅間接支持中國的內
戰，而且直接參加中國的內戰！

首先，美軍以太武飛機運送國民
軍軍械到華北解放區去，這即是爲了
使國民軍軍隊能完成受降任務。其
實，華北解放區的受降任務，八路軍本可勝任擔
當，美軍却偏要運送大批的國民軍軍械去
。這在受降儀式早已進行了，而這些國民軍軍隊的
受降任務亦已停止。不僅如此，據延安本月三日訊，美
國十四架飛機在河北安大縣飛，低空掃射，我軍民頗
受驚嚇！這難道也是爲了完成受降任務所必須採取
的步驟嗎？

其次，美軍不僅以飛機運送國民軍軍械到華北

，而且以軍艦運送國民軍軍械到華北，同時美海
軍陸戰隊自魯南運往天津、青島，並在萊蕪島作爲
國民軍軍械的轉站，用武力趕走駐華北抗戰的八
路軍。據美特約員兩納斯說：「美國海軍陸戰隊
派駐中國是爲了履行美軍所負協助委員會接受日
軍投降和解除日軍武裝的義務」。美國國務院東亞
司長范宣德也說：「美國軍隊派赴華北是爲了幫助
中國解除當地日軍武裝並運送他們回國。」但實際
上，美海軍所指出：「平津青島以及北寧膠濟沿線
的日軍並沒有被解除武裝，更沒有被運送回國，
反而是美軍聯合日偽軍協同國民軍軍隊向解放區進
攻！」

第三，美軍以空運、海運幫助國民軍軍隊外，
美軍並担負起所謂「鐵路」的任務，以便利國民軍
軍隊通過鐵路，進行內戰。在北平路上，美軍以「
鐵路」爲名，已公然站在國民軍方面，參加了進佔
北平河與蘇州山海關的內戰。「路」本來是無須「
讓」的，更無須「美軍」來「讓」。只與國民軍軍
隊停止進攻解放區，只要合理解決受降問題，不利
用破壞武裝進行內戰，交通便不會被破壞。以美國
的武裝部隊來「讓」中國的「路」，這明明是武裝
干涉中國內政。

此外，美國繼續裝備和訓練國民軍軍隊也還是

建設東北必須實行民主

最近，官方有人去東北回來後說，東北情況和
想像中大不相同，民氣十分激昂。——這話雖然很
簡單，但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誰不願到這個
事實而去「接收」和「建設」東北，誰就一定會犯
極大的錯誤。

十四年來在日本統治下嚐了殖民地奴隸的痛
苦。在日本做主人的「滿洲國」裡，人民是沒有任
何政治權利的，在日本人的殘酷的經濟掠奪下，東
北和延長中國內戰。事實告訴我們，過去，美國
所裝備和訓練的國民軍軍隊，在抗戰中，用以打日
寇的並不佔多數。現在，却用來打內戰了。據京南
的部隊，傳作義的部隊，平漢路北平路上的部隊，
不都是這種軍隊嗎？如果在抗戰已結束的今天，美
國仍繼續裝備和訓練國民軍軍隊，那除了是支持中
國內戰外，還有什麼意義呢？當然，這並不是說，
軍備落後的中國決不需要友邦在軍隊的裝備和訓練
上，予以幫助；而是說，在政治上還沒有民主化，
軍隊還沒有國家化的今天，單單裝備和訓練國民軍
軍隊是有弊的。

最後，美國在租借法案停止後，仍擬以約六
千多萬美元的軍需品及其他物資，貸給正在積極從
事內戰的中國當局，也不能不認爲是對於中國內戰
的支持和參加。我們認爲，任何物資的供給，在內
戰期間，都應該停止。

不僅是爲中國着想，而且是爲美國着想，美國
在中國的這些措施，都必須立即改變。不僅如此，爲
了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爲了尊重中國國家的主權
，爲了保持中國人民對於美國的好感關係，美軍應
斷斷停止參加中國內戰，決不干涉中國內政。這
樣，中美的友誼，才能持續於永久，東亞的和平，
也將得有保障。

大多數人民無衣無食，飢寒交迫。但是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却和日本的侵略相始終。東北人民抗日聯軍在一九四〇年春曾發動對十二個軍的武力，雖然由於日本在東北拼命發展交通事業，使聯軍的條件日益困難，但是武裝人民的鬥爭一直對日本失敗時仍舊存在。此外如工人的罷工，農民的暴動，青年知識份子的抗日活動，僑軍的轉變，在十四年間也日益普遍的發生。聯軍紅軍之所以能在最短期間迅速解決關東軍和「滿洲國」偽軍，固然由於紅軍的英勇，同時也得力於東北抗日人民的協助。所以解放後，東北人民立刻就建立了人民的愛國武裝，並在許多地區內成立了民選政府，和紅軍當局友好合作，維持地方秩序，肅清奸偽殘餘。現在東北人民一定因為他們能脫離奴隸命運而感國而歡欣萬分，同時他們也一定有決心永遠不在不民主的政治下做奴隸，他們要求在國對祖國懷抱後進真正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

所以我們現在去接收東北時，首先就應該認真看一看東北人民的意願是什麼。假如以為東北人民向來是「化外之民」，所以現在連忙搬去一大套「黨化」的辦法，去把東北人民「化」一下，連忙搬所去請「開政」的設施，去把東北人民「開」一頓，那就是和東北人民的意願恰相反了。現在東北行營已經到連長春，中國當局更應該明白宣示接受東北後的政策如何，第一件要緊的事並不是忙著派兵去調開外去。忙著派兵去幹什麼呢？是去對付敵偽麼？但關東軍和滿洲國偽軍早已撤換的器械，解散的情數了。是去維持地方治安麼？維持地方治安

無非乎派去幾萬大的兵力，現在的東北人民自衛武裝已經在滿地組織起來了。中蘇和好無間，自然用不著動刀槍，東北人民傾心祖國，更無需用武力去示威。日本對待東北，是以殖民地主人自居，所以地竭力強迫關東軍以實行武力壓迫，但這種武力統治的政費畢竟也失敗了。現在東北回到祖國懷抱，政府當然該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政策和做法，才能使東北人民感到滿意。日本是把東北人民武裝視為匪類而企圖加以剷滅的，我們就應該首先承認這些在抗日鬥爭中生長起來的人民自衛武裝，在日本統治下，人民是沒有一點政治權利的，我們就應該首先承認已經由愛國人民所組織的各地地方民選政府，並且在還沒正式成立民選政府的地方，也實行民選制度。各黨派的地位應該完全平等，廣大人民的利益應該受到尊重 and 保障。承認人民自衛武裝，承認民選政府，實行民選制度，保障各派派各階層的利益，這就是東北實施民主建設的起點。能修實行這樣的政策，才能够在東北確立和平安定的環境，才能够得到發展工業，開發富源，才能有利於東北人民，有利於全國人民。

平心而論，政府過去對於東北人只有對不起的地方，沒有獲得今天夫應該擁護的地方。十四年來，東北人民受的苦難太重了，今後東北在中國的地位也太重要了。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慎之於始，切實尊重東北民意，確定建設東北的民主政策，使東北成為一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模範區，這才對得起十四年來吃盡了苦，並且爲了回到祖國而奮鬥了十四年的東北同胞。

紀念孫中山先生國論是問題的根源

容話不足以紀念孫中山先生，在內戰及全國的今天尤其如此。爲了紀念孫先生八十年辰，我們願將目前國內政治的出路問題，以與國人商榷。

孫先生之所以爲偉大的革命家，因爲他始終堅持民主爲中國的唯一出路。他說：「余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中國革命史）又說：「我們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願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民生主義第一講）。處在今日的形勢，重讀先生遺言，我們不能不感佩萬端。孫先生離開我們二十年了，今天我們不僅沒有得到「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而且內戰正使國運的頹危和人民災難達於極點，其中關鍵點就在於我們還沒有能使中國成爲一個民主的國家。目前成問題的一切問題，解放區自治問題，敵軍受降與偽軍解散問題，內戰問題，國大問題，根本上無非是一個民主問題，解放區什麼問題了？就是因爲解放區內已經實行了民主，有了民選的地方政府，而全國其他地區還沒有。受降問題爲什麼成問題了？就因爲民主的軍隊在抗戰中立大功，但反民主的軍隊在抗戰中抽却不抽不許他接受敵偽軍械投降，反而指使敵偽軍去進攻他們，爲什麼發生內戰？無非因爲不承認民選的政府和人民的軍隊，必欲加以消滅而快意。爲什麼有國大問題？所爭執的也無非是我們到底要一個全民普選的民主的真國民大會呢，還是用一

備國民大會來做幌子以蒙蔽政治的實質？——既
然要辦一切問題，國體都應在民主，就不能不實行
國體上本國體的原則。

如何實行民主？去年中共方面已提出了一個公
平而具體的辦法，就是召開國體會議，結束一黨專
政，成立臨時性的聯合政府以準備國民大會普選，
由真正代表全國民意的國民大會產生民選的正式的
聯合政府。這個辦法提出以後，雖始終未為當權者
所接受，却始終為全國各民主派派系人士所熱烈
擁護。直迄最近，這個辦法仍為各方所堅持，如中
國民主同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中國民
主同盟始終相信全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是當前國
家和平、統一、團結的唯一途徑，同時亦是全國通
力合作實現實力共同建國的唯一途徑。……因此，
我們始終希望全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能早日成
事實」。又如大公報十一月二日社論「中國政治之
路」一文，雖未提出聯合政府，但也明白主張政府
當局應「立刻宣佈國民黨不再專政」，並召開國民
大會（黨派代表，改訂組織辦法），選舉政府（由
民選政府而改組為國家化），制憲法（徹底修
改五五憲法）。

中國共產黨當然始終認爲只有如此，國是問
題才能根本徹底解決的，但是爲了在抗戰結束以後
迅速實現國內和平，在此期間共談中不能委曲求
全，首先退一步提出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綱領
辦法，才將到會談紀要中的協議。關於政治民主化
問題的雙方協議是：「一、政府應爲應迅速結束訓政，
實施憲政，並應先採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
治協商會議，選舉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組成國事
院，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
現在中共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這種辦法也還
是爲了達到根本解決的最後目的，即徹底實行政府

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而這兩大目標也只有有了
民主聯合政府時才能完全做到的。但是結果如何呢
？政府當局對於政治協商會中各項協議，有關於保
民民主自由的各點採取決而不行的老辦法，並且有
意使政治協商會議成爲一個粉飾太平的空談機關，
至於受降問題，解放僑軍問題，解放區民選政府問
題，更是一概擱置不予解決。政府在十月十二日公
布會議紀要後所做的唯一工作，就是在十月十三日
密令全國實行所謂「剿匪」，以至國內形勢日趨嚴
重，會議紀要中的協議，竟被隨地拋如同廢紙！

爲今之計，欲求國是之解決，只有捨棄治本兩
條路。治標的辦法，就是切實實行會議紀要的一切
協議，切實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立即解散僑軍，公
平解決受降問題，並且立即承認解放區的地方民主
自治。若說這在統戰區民選政府的基礎還不夠廣
泛，中共也已經準備重新進行全民普選，一切在外決之舉。

的人士都可以回憶參加選舉，一切黨派也可去自由
從事競選，試問天下沒有什麼更公道更民主的辦法
呢？如果政府對於政治協商會中各項協議，今後仍無意
實行，那麼，會議紀要的協議，就只有通過治本的
辦法來實現。所謂治本的辦法，就是立即停止國民
黨一黨專政，召集黨派會議，首先成立臨時性的聯
合政府與聯合訓練部，統一政令軍令，實行全國普
選，舉行真正的國民大會，從而產生正式的民主政
府。

上舉二辦法，雖有緩急之不同，但都是政治解
決的途徑，其目的也是一個，就是實現孫中山先生
的民主理想，達到「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的
目的。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利用內戰來紀念孫先生，
我們心頭回憶着先生的遺訓，耳邊響着彭彭的內戰
砲聲，不能不迫切陳詞，呼籲全國共同爭取政治解
決。

本刊啓事：

上期曾預告自這一期起繼
續刊載尹啓民先生撰著之「中國歷史講座」，但尹
先生略以：此書寫作時間在數年前，因爲限於史料
、環境，未能盡善；現正着手修正，俟改定後，再
爲刊載或另印單行本。因此本刊暫時不擬續載，謹
向讀者致歉。

莫洛託夫在十月革命廿八週年紀念的報告全文

同志們：艱苦戰爭的幾年以後，我們今天在和平以及對法西斯主義獲得光榮勝利的情況下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廿八週年。爲反對曾經壓迫我們的國家和全歐州的希特勒德國而進行的四年的戰爭，以及今年秋天我們不得不參加了的爲反對侵略的日本而進行的東方的戰爭，已成了我們的主要溫度，已經被揭發了。現在，我們已經贏得機會來重理和平的勞動，以便鞏固我們的勝利。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我們蘇維埃人民會經爲了勝利不惜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精力和勞動。我們會經度過艱難困苦的日子。但是，現在，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能夠說一句：『我們已經打贏了』，從今以後，我們可以認爲我們的國家已經解除在西方德寇侵略的威脅，以及在東方日寇侵略的威脅。全世界各民族長久期待的和平已經來到了。」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

德國在深信他們的強盜進攻的突然性會保證他們成功的情形下侵略我們的國家。不單在德國是如此，而且就在其他國家許多人也以爲蘇聯不會支持得長久，並且在幾個星期以內，無論如何在幾個月以內德國就會把蘇聯打垮，希特勒就要慶祝勝利的。希特勒匪幫在西方幾次的伴勝以後，許多人相信這是不會避免的。所以得到這樣結論的緣故是因爲：首先有些人平常不承認俄國十月革命是「合法的」，其次是一些人不能了解我們革命所創造的蘇聯國家的真正的人民性。德國對蘇聯的侵略對於那些在戰爭的第一階段中由於我們國家所經歷的異常艱苦而感到的我們的盟外的朋友也是一個偉大的考驗。不管進攻是怎樣突然，蘇聯還是站得住腳。在戰爭的初期蘇聯所受的物質損失和深刻的創傷並沒有能夠減損它的體力和精神力。紅軍證實了的確是能够從最初所受的打擊中重新組織和恢復的。蘇聯人民支持它的軍隊並且保證了對敵人的粉碎反擊。每個人都記得我們軍隊轉守爲攻的時候，起先是在戰場上的個別區域，然後是整個全線。

自衛的利刃便成了各大小民主國家反希特勒聯合戰線的成形。大家都知道

道：英蘇美聯盟在組織一切民主國家反抗希特勒主義的聯合鬥爭中，已經成功地完成了它的歷史的任務。

大家也知道，當西歐第二個揚開關的時候，德國就曾經在兩個戰線之間，使得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地位陷於絕望。同時，不應該忘記的是：蘇聯戰線的情況早在第二個揚開關的一整年以前就已經發生根本的轉變。那時希特勒的軍隊已經在紅軍有力的和不斷增加的猛烈攻擊之下耗尽了。由此可見，十月革命所創造的國家不但在保衛自己免於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方面獲得成功，而且爲了撲滅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主要溫度所進行的攻勢也獲得成功。於是，人人都明白了蘇維埃制度和去次世界大戰時的古老的沙俄政權毫無類似之處。因此，很明顯地蘇維埃國家自衛能保衛自己並且能夠擊退自有國家歷史以來最嚴重的考驗。

希特勒德國不但威脅蘇維埃國家，即在進攻蘇聯以前，德國法西斯黨已經獲得了挪威、比利時、荷蘭、法國西、希臘、南斯拉夫。德國在它的條件中，不但有法西的意大利，而且還有許多和德國簽訂軍事同盟的歐洲國家。西班牙和某些別的国家，曾經給予希特勒以半公開的支持。希特勒進攻的威脅，籠罩着英國。萬一向蘇聯的進攻在勝利中結束的話，整個歐洲是會要落在希特勒的鐵蹄之下的。

希特勒份子曾經想藉他到要在歐洲建立的「新秩序」。法西斯走狗們，例如所有形式式的雷斯林份子即代表希特勒，早已確信他們德國主子的馬首是瞻了。在各地破壞所有一切民主制度，禁止勞動階級的一切政治權利，這使希特勒份子來確立希特勒主義的基礎，同時希特勒份子從被奴役的各國中強迫要求，任意榨取所有一切物資，來使他們能從法西斯匪徒獲得更好的供應與武裝。向蘇聯侵略的最初的成就，使希特勒份子更加喪心病狂了。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地不顧國際公約，而且更開始欺騙他們也要求世界霸權了。他們的危險的計劃——日耳曼種族要對歐洲其它各國，而且不僅只是對歐洲各國確立獨權的國家計劃，已對全世界人士洩露出來了。關於「支配種族」對於進入「下等種族」一類的其他各國實行征服的德國法西斯主義說，已變成對於歐洲文明生存的直接威脅。

在希特勒匪徒侵略的各國中，人民曾對對於這擊法西斯侵略者準備不夠。只是逐漸地由於最初的要國民主份子的努力，抵抗侵略者的民主力量，這才開始形成並且成長起來。但是，就在那些國家中，例如在斯堪的納維亞，儘管人民是支持反對侵略者而發動的起義，總缺乏一種力量以擊破希特勒的軍事壓力。決不在我軍轉取攻勢并着手掃蕩德軍，打破了德軍是不可征服的奇蹟以前，就已為那些被德國帝國主義奴役的各國人民的解放，開拓出廣大的機會。紅軍向西方挺進着，以解放帶給我們的各鄰邦去，并且帶給歐洲的其它各國去。蘇聯和盟軍一同，這時以歐洲各國的解放者的姿態作戰，已經跟德國斷絕關係并且加入為消滅希特勒主義而戰的國家隊伍里來的這些國家，也包括在要解放的各國中間。由此可見，歐洲各國從希特勒壓迫下獲得的解放，必將銘記在我們勝利的神聖歷史中，作為光輝的頁。

法西斯意大利是當德國在歐洲挑起戰爭的時候首先站到德國那邊去的。當德國進攻蘇聯的時候，羅、匈、芬各政府，已和希特勒德國締結了軍事同盟，就使她們的國家陷進為反對蘇聯而進行的戰爭中。保國，因為由希特勒代理人組成的保國政府，也已變成了德國的盟友。因此可見除了一些例外，歐洲各國有希特勒的統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把她們的命運跟希特勒德國的命運纏結在一起了。德國的敗北，因而就不僅意味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敗北，它也預示了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其他國家中的敗北。

因此，我們的勝利意義，應該不只在德國法西斯主義敗北光輝下，而且更要在全歐洲法西斯主義在軍事上，精神上以及政治上敗北的光輝下，來加以評價。

歐洲戰爭結束以後，同盟國當前的任務就是：粉碎日寇在東方的侵略，以便加速恢復全世界的和平。蘇聯決不能放鬆這個任務，因為蘇聯和它的盟國之間存在着相互的義務，也因為這是我們在東方的安全利益所迫切要求的。我們大家都記得：在東方，日本會不止一次地進攻我國，我們的國家在東方經常遭日本入寇的威脅。所有這一切，就使蘇聯的參加抗日戰爭無可避免了。不難看出：自從德國法西斯主義在蘇聯戰場上開始吃虧和不斷敗仗的時候以來，就從那個時候以來，日寇在東方侵略的結果也已預先注定了。蘇聯終於出來反對日寇，這就加速日寇的敗北，這慶一來，就使東方戰爭的結束更快了。日本步着希特勒德國的後塵，也對同盟國投降了。

德國帝國主義要在歐洲稱霸的計劃，以及日本帝國主義要在亞洲稱霸的要求，都被打粉碎了，儘管在不久以前，西方和東方的法西斯份子曾把這些計劃只是當做走向世界霸權的一塊踏脚石而已，這樣就由它們本身的例子顯示出：在我們的時代中，這一類的侵略計劃，是多麼近視而且愚蠢呀。作為東方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主要溫床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敗北以及中國從日寇剝奪下獲得解放，對於亞洲各國的，而且不單對於亞洲各國的民主發展，都具有預報的重大的意義。所有一切民主國家的利益，都要求把這勝利鞏固起來。

所以，理所當然的：蘇聯認為同盟國間商談如何由主要同盟國確立適當的監察機構，來督察日本投降條款執行一事，具有這麼重大的意義。關於這個問題所會引起的困難，直到現在並沒有消除。但是，蘇聯從未相信：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都充分認清必須鞏固對侵略的日本取得的勝利，并且必須鞏固同盟國為這個目標的合作創造適當的條件。

德國和日本都被迫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了。英蘇美聯軍因此已經成了自己的目的。

現在，我國的人民很滿意地認清了：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符合各民主國家的利益而勝利結束方面，尤其是在把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最危險的溫床——希特勒德國打垮方面，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蘇維埃人民把自己為反對希特勒德國而進行的戰爭，稱為偉大愛國戰爭。蘇維埃人民的典範，已變成其他各國中的愛國份子為保衛祖國，為祖國的自由與獨立而奮鬥中的楷模。大家也都知道了：蘇維埃人民不僅解放了自己的國家，而且更為確立全歐洲的和平與自由而英勇戰鬥過。一年以前，斯大林同志說過：「現在在全世界認了：蘇維埃人民由自己奮不顧身的鬥爭，已從法西斯蠻夷剝奪了把歐洲

的文明是查出來。那便是被犧牲人民對人類史所佔的偉大貢獻。」

二 全世界和平的建立在與愛好自由的各國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的地方是多方面的，首先就在參戰國家的規模方面以及由於戰爭所引起的傷亡人數和物質損害方面。全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在不同的程度上參加到這次世界大戰裏來。在雙方交戰的陣營中動員了一億一千萬人以上。在那幾年中實際上是不可能舉動任何國家是真正中立的。

人類由於擔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保護，就是說，由於沒有能夠採取過時的措施來對付這種空前無比規模的法西斯主義的侵略勢力，因而人類對於許多國家的人民生命和財產付了無可計算的代價。戰爭強迫到被愛人民身上，他們對於侵略的受害者——宣佈偉大的愛國戰爭。

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的目的不但是奪掠我們的領土和滅亡蘇維埃國家，而且希特勒法蘭克和其他的德意志人種學家們和整個希特勒民族。直到俄羅斯人民和蘇聯的其他各民族人民都按照斯大林的話「一切為了戰爭」把他們的隊伍完全刷新時，並且當他們最後打贏了德國軍隊的背骨的時候，殘殘的希特勒匪幫在它們掠奪的土地上并沒有一時停止追求它們的奴隸人類的目的。如果忘記了這一點，對於那成千成萬的無辜而死亡了的人們，對於他們孤苦無依的家庭，對於整個國家的罪孽上，將是一場重大的罪惡。我們也不會忘記在許多戰月的過程中德國侵略者及其幫兇在蘇聯領土上的罪行所加予我們的重大的物質損害。主要的戰爭罪惡因此首先受到腐爛。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全部或局部地破壞并燒掉一七〇〇個城市和七萬多個村莊，燒掉或破壞了六百萬所房屋，使得近兩千五百萬的人民無家可歸。被破壞和損害最重的都市是我們國家最大的工業和文化中心，如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爾，列寧格勒，基輔，莫斯科，敖德薩，斯摩爾斯克，哈爾科夫，德涅內茨，以河羅斯托夫以及許多其他城市。希特勒匪幫破壞或損害了三一八五〇家工業企業，這些企業中雇用了將近四百萬工人和職員。希特勒匪幫還燒燬和掠了九萬八千處集體農場，其中包括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大多數集體農場。他們把七百萬匹馬，一千七百萬頭牛，幾千萬隻豬羊屠宰或沒收

運到德國去。僅祇對我們國民經濟和我們人民所加的直接損害，德國國家非常委員會的估計就已經達到六七九〇億盧布（按政府價格計算）。

我們不能忘記這些，並且要發動戰爭的那些國家至少要部份地賠償他們所形成的損害。蘇聯人民這幾年來所受的公正是不容否認的。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三強柏林會議對於德國賠償的決定還沒有確實地進行。不過我們沒有人主張採取對於被侵略國人民復仇的政策，斯大林同志不祇一次地指出過：復仇的希望，正像對於憤怒的毒蜂希望報復一樣，都是政治上和民族關係上無聊的政策。

我們對敵國的各族人民，一定不是以報復的心情為指針，而是要阻止新的侵略的發生，要可能的新的侵略者在各族人民之中，更加孤立起來。在過去，必不是侵犯領導者我們，而在戰後時期，則是和平保障與各族人民安全的利益。用不著爭辯，經久和平鞏固的利益，要求愛好和平的人民具有必要的武裝力量。這固然是指那些對和平的鞏固負有主要責任的國家說。但和平保障的利益，與大列強國家武裝的競賽政策，沒有絲毫共同點，而某些帝國主義政策的特別狂熱的擁護者在國外宣傳。

在這一方面，應該把在對日戰爭中應用時表現了驚人破壞力量的原子彈及原子彈的發明，說幾句話。但原子彈還沒有在做為警告侵略或和平保障的東西時而受到考驗。在另一方面，現在不可能有那種大規模的技術秘密可成爲某一國家或狹小的某一軍國家的成就，所以原子彈的發明，不應鼓勵人們醉心於這種發明，而作為對外政策力量的把戲，也不應該對未來的愛好和平的人民加以誤導。

還有很多喧囂的聲言，在繼續製煉不休，大談形成若干國家的集團和組合，作為維護外交方面某種利益的工具，蘇聯從來不曾談論於以對付其他愛好和平的各國為目的的什麼列強的組合。然而，在西方，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却會一再作過這一類的企圖。在過去，許多這類組合，都具有反蘇的性質，也是衆所周知的。在任何場合，西方強國的集團與組合的歷史，已證明了：與其說它們對於控制侵略者有所貢獻，毋寧說正相反，它們是鼓勵侵略，首先是鼓勵德國的侵略。正因為這個原因，蘇聯以及其他愛好自由的各國，在這一方面決不應放鬆自己的警覺性。

世界和平的再建，決不會引起，而且也決不能引起各國間的關係方面或前形勢的再建。在相當時期中，德國、意國和日本，已退出了國際經濟與國際生活的偉大強國之列，這就使整個國際生活協調起來了。因此，這是一國

當的時期，同盟國對這些國家實施聯合管制，以防止這些國家的侵略死灰復燃為目的，但是，同時，並不妨礙這些國家作為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而發展，而與此。歐洲若干法西斯的和平法西斯的國家，已經走上民主的道路，現在力求和同盟國國家建立友好邦交，這一個事實對於歐洲的將來也是具有極大的意義的。似乎很明顯的：這些國家中民主原則的鞏固，應該予以支持，而不應加以阻撓。

我們不能不注意：在同盟國的陣營內，戰爭也已產生了並不是無關重要的變化。在波蘭，反動勢力顯例地已相當地被擯出他們原先的地位，而為新的民主政黨所擠。在歐洲若干國家中，已經實行了根本的社會改革，例如除去大地主階級的獨行的權限，把土地移交給農民，這就摧毀了那些國家中反動的法西斯勢力的舊支柱，而刺激民主與社會主義運動的成長。有些國家如今已把這重要的經濟改革列上議程了，如：大工業的收歸國有，八小時工作日等等，這就使歐洲和歐洲的民主運動日益壯大的隊伍上具有新的精神與信心。

有些反動的報紙，開始企圖把這些大膽的民主改革，主要歸因於蘇聯影響的增長。這些報紙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顯而易見：在進步的歐洲各國中，抗戰問題在以前就已經順利解決了。這並不是意味法西斯主義的勢力已徹底粉碎，無庸再提了。你們大家都讀過三強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克里米亞宣言，其中說：「歐洲秩序的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預備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跡，並且能夠使他們自己恢復民主制度的程序來達成。」

為了確保克里米亞宣言的適當的執行，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然而，毫無疑問，為反對法西斯主義而進行的戰爭，儘管有一切消極的後果，總已在勝利中結束了，這在許多方面都有助於澄清歐洲的政治空氣，有助於為法西斯勢力空前的更生與發展開闢新的道路。這種形勢，不容置疑地，是符合愛好和平的各國的利益的。我們應該希望：對於「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跡」這項工作的必要性的認識，在歐洲各國中更加根深蒂固起來。

蘇聯一向也實行加強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之間的互幫互助的政策。在戰爭的年份中，蘇聯和大不列顛及法蘭西，和法國及中國，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都已建立了友好邦交，而今差不多所有這些國家都已締結了長期的同盟與互助條約，以防止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成為生力軍侵略者的那些國家，可能死灰復燃的新危險。在我們這方面，已作了一切努力，

要和其他的已拋棄對蘇聯仇視和猜忌政策的那些國家，也建立正常而良好的邦交。對這同樣的目的也有貢獻的，便是我國和國子越來越多的許多外國之間的商務與經濟關係的發展，和他們的文化關係，也正加強着。

在戰爭期間形成的英、蘇、美反希特勒聯盟，現在正受着力量上的考驗。這種聯盟，在新的情況下，當戰後時期的更命的新問題發生的時候，會表明依然是強而有力的，而且足以作出共同決定的一體聯盟。倫敦五國外長會議的失敗，便是這一方面的某種警告。英、蘇、美聯盟在戰爭期間，也曾經過過困難，然而，三強的聯盟曾表明了：雖然未必是立刻能辦，然而總能修設法正確解決當前的問題，以符合大大小小各國全體反希特勒聯盟的利益，並且願圖必須更進一步加強偉大民主強國的合作。

今年，新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已終於成立了。這就是俄、英、蘇、美四國的發起而設立起來的，因此，英、蘇、美聯盟對於今後工作的成績，要負起主要的責任。我們大家都明白：「聯合國」組織，不應類似過去的國際聯盟，因為國際聯盟已證明了在抵抗侵略方面，以及在促進行動開始後組織抵抗勢力方面，都是軟弱無能的。另一方面，這個新組織也不應變成任何偉大強國的工具，因為任何一個國家要求在一般的世界大事方面起領導作用，正像要求世界霸權一樣，都是輕率的要求。唯有曾經負起過戰爭的重負，並確保各民主國家對法西斯主義獲得勝利的那些強國的共同努力，唯有這樣的合作，才能促使新的國際組織的工作成功，才能對永久和平有所裨益。要達成這個目的，單靠示好意的願望是不夠的。還要加以強明的，便是以符合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利益的這樣的方式，實行合作的能力。

蘇聯，一向是，而且必將繼續保障各國的和平與安全，並且準備用行動而不空用空話來說明這一點。

三 蘇維埃國家進一步的鞏固與

蘇維埃民主的發展

和德國作戰的四年，是蘇維埃國家一切力量的考驗。蘇維埃國家是穩固地過了這個考驗。偉大的不朽的列寧的教義，又一次地應證了，他說：「如果一國的人民，其中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都覺悟到，感覺到，並且看到他們是在保衛着他們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勞動人民的政權，他們是在保衛着一項事

這，這種事業的勝利，將保證他們和他們的後子們有享受一切文化的幸福，一切人類勞動的創造的可能，那麼，這樣的人民就是決不會被征服的。」

從戰爭中脫穎而出的紅軍，享受勝利者的光榮，它是蘇維埃戰鬥的精華。目前正從事於復興社會主義建設之偉大任務的各項事業，各工廠、各工廠以及我們全國所急聘的數百萬人，現在正在重返家園，從事和平的勞動。蘇維埃人民在比以前更緊密地團結在它的黨周圍，而且在列寧與斯大林的高尚領導之下，以有組織的行列前進着。在艱苦的戰爭的歲月中，紅軍和蘇維埃人民，由明智而可靠的蘇聯領袖——偉大的斯大林領導前進，這是我們極大的幸福。我們軍隊光輝的勝利，將以斯大林大元帥的名義，銘記在我們的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由偉大的領袖和組織者斯大林指引着，我們現在走向和平的建設，以求社會主義社會的力量真正的強盛，以劃全世界我們的朋友的厚望。

人人都知道，蘇聯的國際威信已經增長得多麼的宏大，這是由於我們在軍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成就才有可能的。一年以前，斯大林同志表明這一點，曾說過的話：「正如紅軍在長久而且艱苦的戰鬥中，對法西斯武力獲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一樣，在蘇維埃後方的工人們，在我們抵抗希特勒德國及其幫兇而進行長期的鬥爭中，也對敵人贏得了經濟上的勝利。」斯大林又說過：「希特勒匪幫在這次戰爭過程中，不但已經蒙受了軍事上的敗北，而且也蒙受了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敗北。」這次戰爭，已經向每一個人表明，我國在軍事——經濟方面已經增強得多少的宏大。這次戰爭，同樣也表明了，蘇聯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的威信。在別國人民的眼中，也已增長得多麼的宏大。

在這次戰爭的早年，我們會感覺到異常的經濟上的困難，然而，我們的國家，却證明了能夠以所需的一切，包括在品質上比敵人的武器超越的頭等的軍備在內，供應我們英勇的軍隊。忍受戰時的窮乏和困苦，蘇維埃人民從不歇手地工作着，我們必須讚揚後方的我國工人，特別是更讚揚那些獻身的蘇維埃婦女，讚揚那些無限效忠於祖國的蘇維埃青年。容許我們在困難的戰爭時期保持我國人民生活水準的，正是這一層。

數百萬勞動階級的兒子們，被動員並且在前線作戰，然而各工廠和各工廠，由於特別是從婦女和青年中間產生的新幹部的流入，依然繼續不斷地工作。戰爭期間主要在我國東部各地區，建築了不少的工廠、電力站、鋼鐵和鐵道。社會主義競賽及其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新方式，始終不絕地是前進工人

和整個勞動階級主要關心的事情。職工會和其它的工人團體，在工人羣衆中間進行了深入的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男女工人們比他們在戰前工作更為努力，給與許多的困難都克服了。集體農場的農民們，在戰時，以集體農場的制度，表現了他們的自覺性和農業上的組織性。男女農民現在都已經透澈明瞭社會主義競賽在集體農場的方面的重要性，並且出了很多氣力，彌補了德國侵略者暫時佔領我國一部分領土時所加於農業上的極大損害。這一切，使我們在戰爭的這幾年間，能夠始終擁有豐富的積蓄，並且以優美的原料，供給那些必需的工業企業。貫徹這一切任務，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們如果想起：我們的紅軍主要就是由集體農場的農民組成的。

我們在戰時，所以能貫徹了我們在前方和後方的任務，也因為蘇維埃知識份子盡了對祖國的天職。戰爭已經明顯地表示出我們的知識分子在蘇維埃制度下已變成了什麼樣的人物。我們已不再聽到關於舊的知識分子的話了，這個問題，已由生活自身予以解答了。極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在組織經濟工作方面，在訓練新的專門家幹部方面，在保障人民的健康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準方面，都忠實而有力地盡了自身高尚的任務。現在，我們可以懷着無限感奮的心情說一句：蘇維埃知識份子對自己的人民毫無愧色，而且忠實地對自己的國家服務。

蘇維埃各族人民的友誼，在戰爭期間已經成長得更加壯大。我們的多民族的國家儘管在言語、生活方式、文化與歷史方面是不同的，却已變得更加團結，蘇維埃各民族人民已變得更加互相親密起來了。決沒有一個別的什麼多民族的國家，能夠受得使我們在戰爭期間已經通過的考驗。只有我們的國家，在其中沒有人剝削人的餘地，在其中沒有互相鬥爭的階級，而代替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作為平等的公民，以處理地方的事情和國家的事情，只有這樣的國家，而決不是軟弱無能與唯利是圖的帝國主義國家，曾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艱苦歲月中，抵抗住德國的侵略，並以自身的力量，為蘇維埃的敵人，把敵人逐出國土，而且給與其他各國強有力的援助，以便把他們從外國奴隸主的魔網下解救出來。

現在，在我國，沒有被壓迫的或受不平等待遇的民族了，不久以前，那些民族的地位，在沙皇統治下，原來是殖民地民族或半殖民地民族的地位。在蘇維埃國家裡面，公認每一種民族都有獨立權和自由的民族發展權，所有一切民族的人民，都被變成一種互相友好和尊重的精神，也就變成一種依據每一個民族在發展本身民族文化而推進蘇維埃國家這方面所作的努力

，而對每一個民族的貢獻加以承認的精神。我國無敵職工會的活動，工業的、文化的、運動的和其他的工人組織，團結着所有廣大領土上千百萬蘇維埃農民的集體勞動的創造，在工廠和工廠中，在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上，在礦山和鐵道上，社會主義競賽的着落成長——這一切，都是人民的真正民主發動滋養的表現，這在以往時代我們從未見過，這也不能存在於分爲在戰國早就被蘇維埃政權所摧殘了的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任何其他國家中。我國文化生活的迅速進步，以及作爲人民中間先進的而且最有教養之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如今跟人民融成一片，口口聲聲蘇維埃社會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性，提到更高的水準，這一事實——在一切之中，我們不會不看到蘇維埃民主的新發揚，這鼓舞我們對於我國的將來抱極新的希望和信心。

蘇維埃確保所有各民族人民日益增長的友誼與兄弟般的互助，這在舊俄羅斯是缺乏的，而且在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底下也都是缺乏的。蘇維埃民主對各民族人民真正的進步性的發展，具有偉大的貢獻。蘇維埃民主的動員力量，以及作爲激發人民爭取英雄壯烈的泉源的蘇維埃愛國精神，已在戰爭期間特別有力地顯示出來了。

蘇維埃人民很幸福，因爲由於十月革命，使我們國家免於陷到二等國的地位，曾經被貴族、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統治榨榨的人民的權力，在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享有曠古未聞的發展機會了。正因爲這個原因，在我們對法西斯主義取得的勝利中，我們也看到蘇維埃民主的偉大勝利。

在戰爭的進程中，蘇維埃人民曾不得不穩定到他們的邊界外面去。法西斯主義的頑強抵抗，迫使我們進入若干外國去，更熟悉了他們的城市與鄉村中的生活，到連西方各國首都，如維也納，布達佩斯，柏林。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包括昨天左和法西斯主義的那些國家在內，蘇維埃人民很容易和工人階級與民主方面人士通聲氣。自然，我們不能以爲蘇維埃人民會把昨天的敵人，會把屬於法西斯主義以才陣營內的、以及屬於曾經由法西斯統治維持的社會中若干上層份子，當做自己的朋友。熟悉了其他國家的生活，對於我國人民一定有益處的，一定會擴大他們的眼界。然而，蘇維埃人民都發着更加熱烈的對祖國效忠的熱情回到祖國來，這却是耐人尋味的。

蘇維埃政府的力量，在於它對人民的接近，跟議會民主是同樣的，蘇維埃民主真正具有人民性。因此，蘇維埃國家，作爲一種新式的國家，有着不

是舊式的國家所固有的任務。這樣，蘇維埃國家的大職，就包括以維護世界和平的勝利精神，以建立各國人民間的友好與合作的精神，來對人民進行政治教育，非但決不排斥暴政，反而要求暴政歸於準備新僥倖，以及使法西斯主義更生的一切企圖，這在戰後年份中也是不應忘記的。在蘇維埃憲法下，凡宣揚人種及民族之間的仇恨，反猶太人運動等等，是犯罪的行爲，正像我國的報紙中是禁止宣揚罪惡、盜劫以及對人的暴行的。

這些「限制」在蘇維埃民主的情況下，是理所當然的，正像完全相反的事情，在一些別的国家，却很不幸地認爲理所當然的一樣。在一些國家中，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被人這像手解釋的：法西斯主義的傳播以才，甚至不必較上假面具，就公然無忌宣傳侵略和法西斯主義。雖然全球所有各地人民，由於他們早年放任世界侵略和法西斯主義的猖狂，已經用自己的鮮血和自受的苦難付了極大的代價了，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是足夠的力量，以負起對人民進行政治教育的任務，而當法西斯國家來着手這種任務的時候，唯一的結果便是對於人民的精神生活、文化與體利的迫害。

蘇維埃民主的優點，已在戰爭期間由事實特別證明出來了。蘇聯取得起戰爭考驗的烈大，變得更加強大，成爲真正的人民國家了。衆所周知：在我們，布爾塞維克黨負着對人民進行政治教育的特別責任。我們在這一方面所成就，應該首先歸功於我們偉大的黨，正因爲這個原因，蘇維埃人民懷着感激的心情與偉大的黨，脫起布爾塞維克黨的領袖的時候，所以「我們的導師，我們的父親，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這些字眼，是具有深刻的意義的。

我們要進行新的選舉來選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了。這大新的偉大選舉，是在蘇維埃國家於偉大愛國戰爭中經歷一切考驗以後而舉行的。我國人民，將要帶着在這些年份中獲得的巨大的政治經驗，對於自己國家的命運，對於歐洲的及全世界的局勢發展，加以深思以後，而來投票，布爾塞維克黨和預備的蘇維埃無黨公民的廣大人士，一同籌備這些選舉，把這些選舉認爲蘇維埃民主的最重要的表現，因爲團結我們人民並更進一步鞏固蘇維埃國家的又一種強有力工具。

四 向和平建設的轉移與我們的任務

我們已轉向和平建設。新的偉大任務已在全體人民面前提出來了。我們當然也將必須注意到目前已變成爲蘇聯的一份新的領土。衆所周知：敵人侵略我國，阻撓我們不能對於戰前只是一段短時間會形成了蘇聯於一部份的西烏克蘭和國白俄蘇聯的組織工作，加以適當的注意。現在，由於和波蘭締結的條約，蘇波國界已經確定了。因此，白俄蘇聯人居住的土地，已終於重新聯合在單一的蘇維埃白俄蘇聯里，蘇維埃白俄蘇聯的領土，沿着自由的民族發展的道路前進了。衆所周知：由於和捷克斯洛伐克締結的

條約，外喀爾巴阡烏克蘭也已經歸於蘇俄的一部份，現在，蘇維埃烏克蘭把所有一切烏克蘭領土都聯合了起來，那本是我們烏克蘭同胞的古老的美夢。由於和羅馬尼亞締結的條約，蘇維埃烏克蘭也已經把羅馬尼亞人居住的領土，完全聯合起來，這就為他們更進一步的民族發展開闢了巨大的前途。我國的西伯利亞，並且由於哥尼斯州州府併入蘇聯而擴大起來，這就給予我們在波羅的海上一個良好的不凍港了。在波羅的海區域，蘇維埃立陶宛，蘇維埃拉脫維亞，和蘇維埃愛沙尼亞，都已再建起來了。

這便是我國目前西伯利亞的領土，從蘇聯蘇聯安全的觀點來看，這是最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

在西北方，我們已經恢復和芬蘭依照一九四〇年蘇芬和約而勘定的邊界。此外，在北方，貝加爾（巴沙庫）地區的領土已歸還蘇聯了。

最後，要說到遠東。在這兒，蘇聯承受了原屬遠東的南部和千島羣島，那時候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從來是極重要的。還要提到的，便是我國對於滿洲鐵路的權利的收回，這有我們對於滿洲南部經濟區域和大連區域的權利的收回。我們對於所有這些區域，以及對於芬蘭領土上卡拉——烏得港中我們的陸軍基地區域，都必須給予適當的注意，而因為這些都是蘇聯蘇維埃領土，我們必須加以特別注意了。

我們必須儘速解決和蘇聯人暫時佔領過的那些蘇維埃領土有關的迫切問題。德寇蹂躪所至，留下了許多毀滅的城市，以及以千計的荒涼的遺跡的鄉村。把廢墟逐一整理以後，各處復興工作馬上就開始了。但是直到現在，還只是做了比較小的一部份工作。全體蘇維埃人民；所有各蘇維埃共和國，都應該專心努力把這些地區在經濟上和文化的上從早而完全復興起來。工廠和製糖廠，集體農場和機器站和國營農場，學校和醫院的復興，以及重新住宅給予每一個市居民和鄉區居民，使他本人和他的眷屬都有家可歸。所有這一切，便是我們的迫切的任務。

蘇維埃機關和職工會，黨的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還有集體農場及其在鄉村的組織，都應該把照顧會作職而令使軍隊中回家的人，並照顧榮軍和紅軍將士的遺孤，視為自身主要的責任。我們必須做一切事情，以有效的方式來實施這些負責的任務，從早做好戰爭的創傷。這便是一項迫切的任務。

就從現在起，我們必須着手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基本任務，以便在幾年內就大大超過戰前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並確保大大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標準。這便是最近公佈的黨和政府為擬定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蘇聯國民經濟復興與發展的五年計劃，以及關於鐵道運輸的復興與發展的計劃而通過的決議的含義。我國人民很清楚的知道蘇聯我國實力并保證我們勝利的新大林五年計劃的力量。我們需要重工業的新的高漲，以五金、煤炭、石油、火車頭、鐵道車輛、拖拉機、農業機器、汽車、船舶、動力廠、以

及許多其他的東西，供給我們的國家。各城市和鄉村的居民，都希望大大的增加消費品的產量，并增加糧食的供應。關於滿足集體農場的需索并滿足農民的需索的任務，已變成比一向更迫切的任務了。我們的文化要求，已經增長而且變成更加多樣了。

我們一分鐘也不能忘記關於適當的保護國防的需索，紅軍的需索，以及海軍的需索的我們偉大的任務。

我們不會有過，而且將來也決不會有失業。在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工作，因為我們的國家是勞動人民的國家。我們應該對於改進工業中、農業中、運輸業中以及我們一切機關中的勞動的組織，加以更多的思考，務使蘇維埃公民的勞動生產力和工作素質，會產生出最好的成果。在技術高度發展，以及在生產中廣泛運用科學的我們的時代中，這利用原子能以及其他偉大技術發明，都已變成可能了的時候，在經濟計劃中必須對於技術問題、對於提高我們工業技術水準問題，以及對於訓練高度熟練的技術幹部問題，加以極大的注意。我們必須在工業和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中，和最新的現代世界技術成就並駕齊驅，並確保蘇維埃科學與技術的普遍的進步，獲得必備的條件。敵人會阻撓我們的和平建設工作，但是，我們必須迎頭趕上應有的一切，而要使我們的國家建成繁榮昌盛的境地。我們也將有原子能，以及許多別的東西。

所以，讓我們以我們所有一切用之不竭的布爾塞維克的精力，以蘇聯人民的偉大精力，來着手這些任務。讓我們照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的那樣工作。最後，要說到我們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任務。蘇聯一向以目前列的地位給予了普遍和平與國際關係的發展，而對於和其他國家和平共處與合作而表示的關心。當我們生活在「各國的體系」中的時候，而且當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模範不會最後被除掉的時候，我們對於可能出現的新的和平擁護者們的覺悟性，決不該鬆懈，而對於加強愛好和平的各國間的合作的關心，和以前一樣，將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我們沒有比鞏固我們的勝利的任務更重要的任務了，我們的勝利是在堅強的鬥爭中取得的，而且向着我們國家的新的偉大的隆盛，向着我國人民的生計水準更進一步的改善，已開拓出一條道路。我們以前從來不曾向過在這條龐大的規模的，或蘇聯力量成長具有這毫無阻礙的可能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

我們人民對於他們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事業充滿信心。

蘇維埃人民，勝利者人民，及其紅軍和海軍萬歲！

我們的祖國，十月革命的祖國萬歲而繁榮昌盛！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萬歲！

列寧和斯大林的黨——我們的勝利的黨萬歲！

蘇維埃人民的領袖，偉大的斯大林萬歲！



動盪中的世界大局

于懷

自從十月初倫敦五國外長會議結束以來，整個國際大勢即是動盪不安的狀態，西歐歐洲問題一無進展，東則日本問題陷於僵局，而東南兩面則爆發了一連串民族獨立的戰爭。在這種動盪與混亂中，原子彈的幽靈盤立在世界的中心。原子彈是一個戰爭的破壞的武器，這一個問題今天顯得如此重要，是不是意味著戰後世界和平已不可保，第三次世界戰爭的陰影又投射到這世界上來了呢？

問題的關鍵在英蘇關係，特別是美國，請從美國說起。

一

無論是在事實上，經濟上或是財政上，美國都是今天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因為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是被粉碎了，就是被嚴重的削弱了。被粉碎的有德、日、意，被削弱的如英如法。在力量上只有蘇聯——社會主義的蘇聯能夠和它相比。美國反動力量清楚地意識到美國這種有利的地位，他們下決心要把這有利的地位利用到最大限度。他們的目的是儘可能地把全世界的人民統制在美國獨占資本家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們企圖建立起美帝國主義者的世界霸權，把英國降為一個次要的伙伴。

這種政策的根源在美國的獨占資本家。這一批大獨占資本家在戰爭當中發了空前未有的大財。

杜魯門政府儘管是保證了繼續執行羅斯福總統國際合作的政策，但無論從其本質看，或從其所處的不同環境看，要它不受這一大力量支配和影響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正好相反，自從世界戰爭全面地結束以來，一系列的發展證明了一個大的壓力是起着支配作用的。

在這當中值得一提的是：

一、貝爾納斯國務卿的對蘇「強硬」政策。

二、赫爾利大使的對華所謂「不干涉內政」政策。
 三、不承認巴爾幹各國民主政府的政策。
 四、堅持美國單獨管制日本的政策。
 所有上述各項政策，除第二項而外，在倫敦五國外長會議都遭到了阻礙。如所周知，倫敦五國外長會議是在：一、與巴爾幹諸國締結和約；二、蘇聯要求共同管制日本等問題上產生僵局的。

二

追求極端阻礙，如何辦理？

早在倫敦外長會議通過困難，但尚未宣佈最後失敗的時候，美反動帝國主義者早就訂好了第二步的步驟了。美反動集團的發言人魯斯主辦的時代週刊，在它十一月一號出版的一期上，就有過如下的話：

「……蘇聯知道，它是敵不過英美兩國的聯合力量的，但他也同時知道，有兩件事是對於英美方面不利的：

一、華盛頓和倫敦，在沉重的軍事壓力之下不得不把他們的軍隊復員。
 二、不管美國政府最後怎樣決定對於原子彈的處置，原子彈的秘密是不可避免的保留得住的。」（十月一日，紐約，週刊）

這是什麼話？

這是惡毒。這就是說：我的政策行不通，不惜以武力求其貫徹，保持巨大的軍備，用原子彈——好一副劍拔弩張的面孔！

然而這一噱示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十月二日倫敦外長會議結束，從十月二日到十一月二日的整整一月之中，從太平洋的對岸傳來了五次蘇聯軍事力量變化的聲音。一月之內，美軍政要人作了五次關於戰後美國軍事政策的演講。

第一次，十月九日，美國軍參謀長馬歇爾元帥兩年一度向國會報告。

第二次，十月十九日，美國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元帥在參院軍事委員會主張擴充陸軍航空隊的演說。

第三次，十月二十三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會聯席會上要求實施青島軍備削減的演說。

第四次，十月二十七日，美海軍紀念週日，美總統杜魯門在紐約港強調擴大武力為美國外交政策之基礎的演說。

第五次，十月三十日，美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解釋何以美國必須保持強大軍備的演說。

這五次演說各有重心，但其方向却是一致的。

馬歇爾元帥第一次說：「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明智而強硬，如果我們的外交政策不以明確的安全政策為範圍，其結果必然失敗；現代國家的有效防衛，是維持其力量。」（十月九日）

馬歇爾元帥第二次說：「在此時期，美國人民已發生情緒上的危機：即復員不僅實際上成為軍事力量的解體，且已使美國對於世界所負的責任感歸於消失；由於將來有再度發生原子性戰爭的可能，我們更應刻不容緩保有強大的軍力，以促進世界秩序的合作。」（十月三十日）

杜魯門總統第一次說：「普通軍訓制是我們準備把我們的巨大力量投入戰爭的唯一方法。」（十月廿三日）

杜魯門總統第二次說：「我們認為原子彈這一新的破壞力量保存在我們手中是一種神聖的付託。」（十月二十七日）

所有這些話已經叫這一個個管戰爭事務的世界心驚胆戰了，然而更加駭骨的話還有：

安諾德元帥說：「美國必須有更大的陸軍航空隊，以便在未來的戰爭中控制天空，未來戰爭開始時，可能達到三千哩以外的基地的襲擊。美國現在能夠在國內大半基地派飛機擊亞非三洲的大部份。」（十月十九日）

我們不準備在這種討論美國戰後的安全政策，那是美國人民的事情——附帶的說一下，我們知道，美國絕大多數的人民是不贊成這種攻勢備戰的軍事政策的；現在我們所必須加以注意的，這樣的一種軍事政策表現什麼呢？

它表現：一、對於今後比較持久的和平沒有信心；二、對於美國團結維持和平的前途沒有把握；三、對於美國的外交能力發生懷疑。

人們以為：①用維持強大軍備；②用實施青島軍備削減；③用保持原子彈秘密；④用不惜貽言「美國現在能夠從國內大半基地派飛機擊亞非三洲的大部份」的恐嚇，倒反可以維持「秩序」與「和平」了。誠如英國的一家報紙之所指出，假如用原子彈的恐嚇可以維持得了和平，那和平也不過是一種恐怖的和平而已。請問恐怖的「和平」與和平的「恐怖」有什麼差別？和平而變成了恐怖，那和平有什麼意義？

不，恐嚇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說一句流俗的話，現在儘管有一批反動力量不惜以發動第三次世界戰爭相威脅，來嘗試推行它的世界政策，但在今天的實際情況下，就是希特勒再生（假定他已死），他也不能、不敢發動甚至準備第三次世界戰爭。

實際的力量對比使他不能，人民的和平意志使他不敢。儘管時代週刊猛烈暗示美政府不應迅速復員，美政府依然不得不逐步復員；這不就表明了千百萬人民的意志就貫徹在這些所謂「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的通常事物當中嗎？

三

美總統杜魯門說，美軍龐大的攻擊力量將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骨幹，那麼，什麼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內容呢？杜魯門總統列舉了十二原則（俱見杜氏二十七日演說）；有人把他比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實其重要。

從原則上說，這十二條在大體上是好的；但問題不在抽象的原則，而在具體的實踐。例如十二原則中第四條說：「準備自主的一切人民的一切民族，應能選擇其本身的政府形式」；這是贊成民族自決的原則，這是好的，但是美政府一方面不反對印度尼西亞人獨立，另一方面又不反對荷蘭對於荷印的宗主權，這叫什麼「贊成民族自決」？假如說是美國採取中立政策，不援助武裝衝突中的任何一方；但實際上美國所做的却只是要求英印二國把他們用以進攻荷印人民的租借裝備上的美國標誌塗去，這叫做什麼「中立」？十二原則中的第五條說：「戰敗國將協助以建立和平與民主的政府」；日本的幣原政府算不算民主的政府？十二原則中的第七條說：「一切國家對於海洋上及流經一國以上的內陸水道應有平等權利」，這顯然是指歐洲的內陸水道說的，很好，「世界大同」；但是為什麼忽然又來一個第九條，「西

不，恐嚇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說一句流俗的話，現在儘管有一批反動力量不惜以發動第三次世界戰爭相威脅，來嘗試推行它的世界政策，但在今天的實際情況下，就是希特勒再生（假定他已死），他也不能、不敢發動甚至準備第三次世界戰爭。

實際的力量對比使他不能，人民的和平意志使他不敢。儘管時代週刊猛烈暗示美政府不應迅速復員，美政府依然不得不逐步復員；這不就表明了千百萬人民的意志就貫徹在這些所謂「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的通常事物當中嗎？

三

美總統杜魯門說，美軍龐大的攻擊力量將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骨幹，那麼，什麼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內容呢？杜魯門總統列舉了十二原則（俱見杜氏二十七日演說）；有人把他比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實其重要。

從原則上說，這十二條在大體上是好的；但問題不在抽象的原則，而在具體的實踐。例如十二原則中第四條說：「準備自主的一切人民的一切民族，應能選擇其本身的政府形式」；這是贊成民族自決的原則，這是好的，但是美政府一方面不反對印度尼西亞人獨立，另一方面又不反對荷蘭對於荷印的宗主權，這叫什麼「贊成民族自決」？假如說是美國採取中立政策，不援助武裝衝突中的任何一方；但實際上美國所做的却只是要求英印二國把他們用以進攻荷印人民的租借裝備上的美國標誌塗去，這叫做什麼「中立」？十二原則中的第五條說：「戰敗國將協助以建立和平與民主的政府」；日本的幣原政府算不算民主的政府？十二原則中的第七條說：「一切國家對於海洋上及流經一國以上的內陸水道應有平等權利」，這顯然是指歐洲的內陸水道說的，很好，「世界大同」；但是為什麼忽然又來一個第九條，「西

不，恐嚇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說一句流俗的話，現在儘管有一批反動力量不惜以發動第三次世界戰爭相威脅，來嘗試推行它的世界政策，但在今天的實際情況下，就是希特勒再生（假定他已死），他也不能、不敢發動甚至準備第三次世界戰爭。

實際的力量對比使他不能，人民的和平意志使他不敢。儘管時代週刊猛烈暗示美政府不應迅速復員，美政府依然不得不逐步復員；這不就表明了千百萬人民的意志就貫徹在這些所謂「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的通常事物當中嗎？

三

美總統杜魯門說，美軍龐大的攻擊力量將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骨幹，那麼，什麼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內容呢？杜魯門總統列舉了十二原則（俱見杜氏二十七日演說）；有人把他比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實其重要。

從原則上說，這十二條在大體上是好的；但問題不在抽象的原則，而在具體的實踐。例如十二原則中第四條說：「準備自主的一切人民的一切民族，應能選擇其本身的政府形式」；這是贊成民族自決的原則，這是好的，但是美政府一方面不反對印度尼西亞人獨立，另一方面又不反對荷蘭對於荷印的宗主權，這叫什麼「贊成民族自決」？假如說是美國採取中立政策，不援助武裝衝突中的任何一方；但實際上美國所做的却只是要求英印二國把他們用以進攻荷印人民的租借裝備上的美國標誌塗去，這叫做什麼「中立」？十二原則中的第五條說：「戰敗國將協助以建立和平與民主的政府」；日本的幣原政府算不算民主的政府？十二原則中的第七條說：「一切國家對於海洋上及流經一國以上的內陸水道應有平等權利」，這顯然是指歐洲的內陸水道說的，很好，「世界大同」；但是為什麼忽然又來一個第九條，「西

不，恐嚇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說一句流俗的話，現在儘管有一批反動力量不惜以發動第三次世界戰爭相威脅，來嘗試推行它的世界政策，但在今天的實際情況下，就是希特勒再生（假定他已死），他也不能、不敢發動甚至準備第三次世界戰爭。

實際的力量對比使他不能，人民的和平意志使他不敢。儘管時代週刊猛烈暗示美政府不應迅速復員，美政府依然不得不逐步復員；這不就表明了千百萬人民的意志就貫徹在這些所謂「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的通常事物當中嗎？

三

美總統杜魯門說，美軍龐大的攻擊力量將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骨幹，那麼，什麼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內容呢？杜魯門總統列舉了十二原則（俱見杜氏二十七日演說）；有人把他比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實其重要。

從原則上說，這十二條在大體上是好的；但問題不在抽象的原則，而在具體的實踐。例如十二原則中第四條說：「準備自主的一切人民的一切民族，應能選擇其本身的政府形式」；這是贊成民族自決的原則，這是好的，但是美政府一方面不反對印度尼西亞人獨立，另一方面又不反對荷蘭對於荷印的宗主權，這叫什麼「贊成民族自決」？假如說是美國採取中立政策，不援助武裝衝突中的任何一方；但實際上美國所做的却只是要求英印二國把他們用以進攻荷印人民的租借裝備上的美國標誌塗去，這叫做什麼「中立」？十二原則中的第五條說：「戰敗國將協助以建立和平與民主的政府」；日本的幣原政府算不算民主的政府？十二原則中的第七條說：「一切國家對於海洋上及流經一國以上的內陸水道應有平等權利」，這顯然是指歐洲的內陸水道說的，很好，「世界大同」；但是為什麼忽然又來一個第九條，「西

半球國家能自身解決其問題，不受外國國家的干涉？難道南美洲就沒有
一條流往一國以上的水道嗎？再舉眼前一例，美政府要求五強共同參加對巴
爾幹諸國的和約，說起來很好聽，又是「大同主義」；但，為什麼美政府却
又堅持只有美國有權單獨管制日本，堅決反對英美中蘇共同管制？假如美
「大同主義」的原則恰如有一些人所說的那樣高尚，何以歐洲就對「同」而
遠東却對「同」不憐呢？諸如此類的問題都不能用一個「一以貫之」的原
則來解釋的。

這樣說來，是不是說美國沒有一個一貫的外交政策，或者說它的世界政
策沒有一定的方向呢？不，美帝國主義者的世界政策的性質和方向是確定了
的，當前的問題不是這一政策的性質和方向是什麼，而是這一政策能貫徹
到什麼程度，在這邊我們就必須考慮到四個因素：一、美國是一個新興的世
界列強，不惟英國，它沒有作為一個強國的世界列強所具有的經驗，初生之
犢不畏虎，勇則勇矣，有時不免流於莽撞；二、目前的世界是一個完全新型
的世界，有許多新的深刻變化不是一眼就可以被人看出，更不容易為一些少年
氣盛之徒所承認；三、美國是一個有長遠民主傳統的國家，這一次戰爭更大
大地教育了美國人民，這就形成了上述政策執行時內在的阻力，這不僅包含
了民間的民主力量，而且還包含政府內部的反對派；四、除去內在的阻力還必
須指出強大的外在的阻力，這不僅包含蘇聯，而且還有英法——美國的
反動份子雖有氣吞山河之勢，但在事實上，我們知道，山同河都不是很容易
就一口吞下去的。

由於這種種原因，就產生了某種「舉棋不定」和「欲去頻回」的迂迴曲
折的形勢。

舉一個顯著的例子：正在美蘇關係發展到微妙階段的時候，十月二十二
日美國國家協會的發言人突然聲明說，美國已停止對蘇貸款的談判了；這一
個聲明是非常嚴重的。因為，我們知道，信用貸款是美國外交資本中最大的一
種王牌，假如這聲明是真的話，那就等於說美國已打下它的最大一張王
牌了。但國家協會的發言未過兩天，二十四日，貝爾納斯又否認美政府停止
對蘇貸款談判之說。這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了美方為資本家集團對於美政府的
一種壓力，一種鬥爭；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美政府不能臨事而胸有成竹，而往
往自陷於舉棋不定之中。

但足以表現這種複雜情勢的真如關於遠東顧問委員會一事的发展。
美蘇對於遠東顧問委員會的不同態度，我們在這不再敘述了。我們還

需要指出的僅僅是，遠東顧問委員會是五國外長會議後國際間唯一的一項
未斷的紅線，因此這一問題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十月二日外長會議不歡而散。十月八日，美參院外交委員會就召開緊急
會議，這一會議顯然是決定今後對蘇的會議。自此而後，就一方面有了上述
五次強調軍事力量的演說，另一方面就有十月十日美國務卿貝爾納斯決定在
十月二十三日召開遠東顧問委員會的聲明。假如蘇聯不參加呢？十月十八日
貝爾納斯說，蘇聯即不參加，會議亦如期舉行，態度強硬極了。

不知道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知道的僅僅是：十月二十日美國
務院遠東司長范宣德發表了一篇演說，不管這演說對於現實的問題（如管
制日本，如對華政策，如殖民地問題）如何為既成事實辯護，對於原則的問
題如何空洞而抽象，他的強詞中蘇蘇必須合作的一點是值得讚賞的。這顯然
是為了緩和一下美蘇之間的緊張空氣。同一日，美國務院宣佈遠東顧問委員
會延期一禮拜再舉行，我們不知道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可能是代表大獨占
資本家集團要求繼續強硬，民間和政府內部的民主力量要求緩和，兩者相爭
而有此結果。不過無論如何，會議延期的這一舉表明了美政府還是願意「要
有餘地」的。

這之後，十月二十五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談話說，他有親筆信，已交哈羅
曼大使轉陳斯大林。信的內容不得而知，但這一舉使我們想起了舊金山會議
時美總統的派遣波浦金斯和戴維斯的分訪蘇英。波浦金斯的訪蘇曾經是鋪墊
了柏林會議的道路，哈羅曼的訪問是不是可能產生同樣的結果呢？問題的性
質不同，具體的條件不同，我們不願意讀者產生輕易的樂觀，我們之所以推
出這一點不過是為了說明山似窮而實未窮，水似盡而實未竭而已。

遠東顧問委員會之所以延期一週，其主要原因當然是美政府擬定一週之
內，蘇聯的態度可以確定了。但一週過了，十月三十日到了，問題還未解決
！怎麼辦呢？會議如期舉行！但使人驚奇的是，會議舉行了一個開幕禮，立
即宣佈休會一星期，十一月六日復會。

舉此一例，我們就可以看出美國世界政策的方向雖然確定了，但在執
行中，由於內外的阻力，它可以產生怎樣複雜和曲折的情況。

四

然而必須指出：美帝國主義者的方向不僅不能代表美國人民的意志，而

且我們還必須嚴格的區別開美帝國主義者的方向和以蘇聯為核心的全世界人民堅持團結和平的方向，這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帝國主義者以為在一切國際糾紛的後面，他們握着一張最大的王牌：原子彈的秘密；他們以為，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有了它，他們就可以在所有的問題上，不管有理由和無理，都能貫徹自己的要求；他們得意到一種程度，認為穿鼻的國家連原子彈的名字都不敢提。

這在他們的心目中形成了一個威脅全世界的巨大幽靈。

然而實際上，這並沒有什麼可怕。十一月六日蘇外長莫洛托夫就公開提出反對一個國家乃至幾個國家的集團保持原子彈的秘密，因為這種保持只能威脅世界和平，而絕不能有助於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的保證不在於某幾個國家保持原子彈的秘密，而是加強蘇德反法西斯戰爭中形成的英美蘇三大領導列強的團結。

莫洛托夫的這一演說獲得了全世界廣大人民的一致支持，這就表明了：它集中地表現着千百萬人民大眾爭取團結和平的意志。

這是人民的方向。

帝國主義者的方向是和全世界人民的方向矛盾的，有矛盾就有鬥爭——這就是為什麼，自從十月初倫敦五國外長會議結束以來，整個世界大勢呈現出動盪不定的基本原因。

說動盪，是說世界人民堅持團結和平的總方向雖已確定，但在到達這個方向之前還存在着經過嚴重曲折的可能，目前我們正是處在嚴重曲折當中，但不贊成帝國主義者怎樣企圖阻撓這種方向的實現，他們是不可能推翻這一總方向的。美國外交政策在某些方面所表現的若干迂迴曲折的情形一方面固然表示了當事者的「留餘地」；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全世界人民大眾堅持團結和平的壓力究竟是不容忽視的。

這樣我們可以說：整個國際形勢雖在動盪之中，但所動盪的限度是不會超過和平協商的範圍之外；世界的方向是向着公平合理的和平，而不是向着另一次戰爭。

然而這不是說這一批破壞世界和平的份子不是一股危險的力量，不，低估了他們的危險性是錯誤的。今天，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課題正是集中火力向這批反動力量進行嚴厲的鬥爭，不遺餘力的阻撓，這批反動份子是不會自動地放棄甚至限制他們獨霸世界的企圖的。懂得了鬥爭本身就是世界和平的一個因素而且不懈地進行這一鬥爭，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團結和平的

人民的方向是一定會取得最後勝利的。

有一批無知的但是野心勃勃的反動賭徒，看到了國際形勢的某一些側面，就以爲第三次世界戰爭即爆發了；他們閉起眼睛胡說：現在是備戰的時代，不是和平的時代；當前的工作是動員不是復員。由於他們的無知，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出於他們害怕和平——國內的和平和國際的和平，因爲真正和平了，他們就沒有任何理由爲他們的廣散無能辯護，拒絕那日趨滋潤的民主改革的浪潮了。對於這些人，必須當頭棒喝：趕快打住，你們的賭注押錯了。（十一月九日）

毛澤東同志三大著作

論聯合政府

二〇〇元

新民主主義論

一〇〇元

文藝問題

一〇〇元

新華日報圖書課經售

越南的革命(下)

張尙民

編者按：上期我們曾刊載黃復南先生「越南的革命」一文的上篇，旋以黃先生因事離滬，該文後半部未及寫成。黃先生的文章敘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越南革命運動的發展情形，張先生緊接着論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越南革命的復蘇，正好爲黃先生一文的續篇。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越南發生了革命危機，越南人民襲擊東京、富壽法國兵營，西貢等城市屢次出現越南反法的暴動。在這時期，一部份反對法國壓迫的越南皇室、地主、官僚和資本家，利用歐戰法不暇東顧的時候，策動復國運動，維新皇帝於一九二六年的密謀，潘永龍在西貢的企圖及一九一七年梁玉船和上士根領導下的太原起義，相繼發生，事後均受法國殘酷的鎮壓而歸於失敗，維新皇帝被流放到非洲小島。這時期的鬥爭，帶有普遍的自發性，是由皇族官僚領導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越南民族運動的發展

一九二〇年以後，越南受西歐民主運動和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民族運動開始走向自覺的道路，特別是由於越南先進的知識份子當中產生共產主義的思想，行動，使越南的民族運動很快與工農大眾的反抗相結合。一九二四年間，爆發南定紗廠工人大罷工。夏烈廠工人工罷工及括林五千餘農民的暴動，一九二五年罷工浪潮波及西貢兵工廠，尤其是越南水兵反對干涉中國革命的兵艦事件引起了法國當局恐慌，一九二五年於法國逮捕越南救國領袖而引發有力的反抗運動，早在一九二三年退後生過工人范鴻森在廣州沙面炸擊法國總督商榷等的事件。這些事實，不僅說明越南人民有組織的鬥爭已經萌芽，同時，顯示出越南工農大眾已成了越南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

早在一九〇五年，越南人潘是模、阮誠等就組織過國民黨，圖謀復國，因事沒而逃亡；一九一一年日法簽字後，在廣西的越南流亡份子，也曾組織

立了光復會，但當時這些組織並沒有對越南的反法鬥爭起直接指導的作用。

資本主義穩定時期，法國利用戰後復原強化統治的結果，引起越南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不滿情緒的增強，代表越南這些階級的黨派於此時先後誕生，越南民族運動因而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一九二六年，越南留法生潘倍珠、梁世傳等在巴黎第一次成立越南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越南民族獨立黨；次年，進行改組，在自己的政綱裡吸收了革命的因案，並改稱爲越南國民黨，綱領的主要奮鬥目標，是「反抗壓迫」，「民族自決」，「實現安南民族的獨立」，並宣言：「決定對法國帝國主義採取革命的鬥爭，且願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親密合作」。越南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擴大了自己的影響。

此外，代表越南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有：越黨，越南青年黨。當時，越南還沒有出現無產階級政黨，以領導越南工農大眾並從而組織反法鬥爭，造成強大的力量；因此所有這些鬥爭，都顯露其脆弱性。

越共成立至第二次歐戰

在世界經濟危機年份，越南共產黨正式成立。在這以前，越共還只是以零散的和小組的形式出現。成立後便參加領導一九三〇年安南與富壽暴動，並在部分地區建立工農蘇維埃的政權。法國出動大批飛機、坦克、作血腥的強壓，殺殺暴動的越南人達一千二百人。同年，交趾支那的薩得和安南的榮合也發生廣大的示威遊行，一九三一年「五一」勞動節，越共曾領導

費、河內、海防、西貢等大城市的黨業紀念大會。

經過一九三二—三四年的準備(低)潮時期，一九三五年，越南又處在民族運動高潮的飽和點。

二五年初在越南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反帝統一戰線的口號。爭取民主，改善工人生活，揭發法國反動派統治所引起經濟危機，及其對越南的欺騙政策，反對法國犧牲殖民地人民準備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陰謀。同時，教育和組織廣大羣眾，成爲越共鬥爭的中心任務。法國人民陣線的抬頭，大大有助於越南民主反帝運動的開展，越共的影響飛躍的擴大着，一九三五年交賦選舉中，越共黨員當選爲西貢市議員。

一九三六—三七年間，工人報紙和羣眾運動，在西貢、順化、河內以及全國都普遍出現，反帝統一戰線的運動還取得了部份士著資產階級的參加和支持。

越共提出適合於人民的要求，主要是：越南各民族享有與法人同等的政治權利和義務，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減稅、禁止高利貸、取消無報酬的強制勞動，八小時工作制，釋放政治犯。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越共擁有兩萬有組織的羣眾，出版各種無期的越法文刊物和幾十種小冊子，公開的，半公開的，秘密的讀者有十萬以上，包括各階層民族人士，到處都有公開的黨支部和公開的共產黨員，深入到各種羣衆團體，培植自己的力量。

歐戰爆發，越共即爲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努力，自九月中旬至十月底一個半月內，東京交賦一帶的城市，到處發現反帝的標語傳單，在越共領導下，交賦地方的農民，公開出來示威遊行，高呼「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

正是這個時期，法國人民陣線的勢力在反動的達拉第上台之後被打擊下去，鎮壓、逮捕共和民主人士的白色恐怖也就開始。一九三九年正月，參加反戰運動被捕的革命青年，有一百五十多名。同年十月七日至十月三日內，法越政府封閉西貢、堤岸進行反戰宣傳的十八家報館，許多羣衆團體(如工人互助社、新聞記者協會等)都被解散。越共被迫，又成爲地下黨了。

越共第一、二期的揭發越南反戰反帝鬥爭，並沒有使越共的活動消滅，一九四〇年越共爲團結華僑力量，發表「告越南華僑書」，號召越南華僑和越南各民族一致行動，參加反戰反帝的統一戰線。

越共正確的估計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老大腐朽的舊法蘭西的必然滅亡與日寇南進威脅的嚴重化，給越共提供了新的任務。於是它在一九四〇

年六月廿五日的宣言裡，清楚指出：「……現在日本向東南亞進軍，已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了，我們爲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爲民族解放，爲祖國成功，號召反對對日妥協……立即與中國政府訂立互助協定，中越及其他各民族團結起來！」

可見，越共在日寇進兵越南之前，早就提高了警惕性，動員和教育越南人民。

反日戰爭階段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蘭西淪陷了，不出半年，日寇果然橫行越南，法越政府被日寇增加軍事壓力便屈服，無能的對日妥協了。越南民族充滿了不可抑制的憤憤，首先是越共領導了廣大越人，起來堅決反對日本侵略者而戰鬥。

當時，「越南獨立同盟」是越南抗日運動唯一的和最大的領導中心。「越南獨立同盟」是以越共爲中心的各派抗日組織的總稱，其中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及越南各階層人士。它的目的，是爲了驅逐日寇，建立越南民主國家而鬥爭，越南抗日戰爭時期。它的影響最大，一九四〇年西貢一帶的反日暴動和以後的三折抗日活動，就是在它領導下進行的。

越共直接積極參加領導一九四〇年十月反對德古軍隊行爲及日寇的政治陰謀而策動的大暴動。這是越共領導越南人民進行抗日鬥爭的大規模的行動的開端，這次鬥爭蔓延到全越境，持續了兩三個月，革命黨人割斷了南線，源公河的交通也完全切斷，政府機關和建築物被搗毀，法蘭西官吏及法國兵營的事件經常發生，日寇張貼的及勸誘被擄毀，或者就改裝革命軍(如：「把日寇驅逐出境」)、「發動全國人民的力氣，奪取越南的民主，獨立解放等」。德古勾結日寇集結大兵，我數月時間而攻進，革命羣衆被捕殺者以千人計，僅在雲南一個地區，越共黨員被捕殺的就達三十名。其中有五名，就地被槍殺，西貢、堤岸各地，成百個村莊被焚毀、洗劫，統治者動員了飛機、坦克、裝甲車向越南人民，作極殘酷的攻擊，搜各通訊社報導，參加反日鬥爭遭難的越人在五萬以上，其中有一部份是反日的法籍和越籍的士兵。

越南「統一黨」在日寇與德古指使下，參加了許多數百民族利己的破壞活動，它們在越南一帶掛着「復軍」，「復國軍」的旗幟，成爲破壞越南抗日勢力的幫兇。這個所謂「統一黨」，成立於日軍攻佔西貢前，是少數越南的親日頭目份子，在雲南訓練的軍隊，他們打着抗日旗號，每爲日寇利用，進行時期的勾當，並且被越南民族黨中少數反日派所同情。

發動失敗之後，越共爲培養自己的力量，爲團結越南各民族各階層抗日人士，採取了新的對策。一方面揭露了日寇的政治陰謀和欺騙，反對德古的出賣行爲，另一方面，則和越南民族黨中少數親日的親日份子及越、日特

條件鬥爭。同時，協助擴大越南準備的救亡運動，一句話，總共遵循着獨立越南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而邁進。

蘇德戰爭爆發，在遠東，日寇獲得越南作「跳板」這時候，準備立刻滅亡整個南洋各民族的野心已暴露無遺了。面對着新的局勢，越共更復明確的重新提出建立越南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呼籲：「越南全民族團結起來！」

「配合中國抗戰與印度人民的解放運動，為趕走日本侵略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而奮鬥！」這時候，越南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是完全必要的。直至太平洋戰爭，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太平洋各戰區反日統一戰線的宣言廣播之後，越共便盡其全力，發動抗日武裝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越南人民切身體驗到日寇「共存共榮」、「日越提攜」的內容，不過是把越南人民放在沉重的奴隸、壓迫、屠殺、奴役的統治之下，因此，越南人民的反日情緒一天比一天高漲，反日鬥爭也日益澎湃。逃亡、罷工鬥爭，逐漸在擴大。一九四二年二月間，河內、義安及西貢等處的彈藥庫被炸毀，河內、西貢的鐵道被破壞了三次，使清軍運送軍火的火車出軌，河內路上和東橋等處，經常發生日兵被暗殺的事件；在統治者隊伍中，大批逃亡的現象在蔓延着。一九四三年工人反日罷工，比四二年更形嚴重，金邊、西貢各地的企業工人，因不堪敵人的壓迫與奴役，紛紛舉行罷工，日寇大批捕殺罷工工人，但是越南工人頑強抵抗，十二月開始的工潮延續至一九四四年春天才平息。

甚至於連監獄中的差役，在他們經過被投下獄的越南華僑或英美僑民監房時，也敢於向窗外叫喊：「中國萬歲！」「祝盟國勝利！」「試用手指打個V字手勢。」

日寇佔領越南期間，實際上內部都是不穩固的。

戰爭同樣也教育了各黨派，各階層人士。過去，越南的許多黨派，對越共一再提出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沒有一致的認識，其中黨派因為堅持不同的政策及信仰，因而分散力量，給日寇以各個擊破的條件。一九四四年初，越南成立了民族陣線委員會，越南各民族各黨派團結起來了。

越南民族陣線委員會，建立在反法西及要求民族獨立解放的政治基礎上，它包括越南各黨派，越南國民黨，越南共產黨，越南獨立同盟，越南社會民主黨，越南反侵略同盟，越南人民救國會等組織，蔣德，法蘭西的反法西勢力也被吸收入去，越南民族統一戰線由此形成。

越南民族統一戰線成立之後，越共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顯得更為強大，威信也提高了。

越南反日運動的後期，在越共及其他黨派領導下，有顯著的成績。一九四四年夏天，越南革命勢力成立了臨時軍政府。越南全境的山村中，已經普遍的發動了游擊戰爭，除了正規游擊隊之外，還組織了廣大的武裝自衛隊，這些武裝隊到各階層，各救國會的配合與支援，北圻上游諸省，實際上完全

控制游擊隊手里。他們經常破壞交通線，反對敵人的糧食運送，襲擊敵人火車與火車站，他們的力量，一天天在壯大，成為同盟國在東南亞反對的一支主力軍。

「三九」事件

自古德越人利益對日妥協，幫助日寇鎮壓越人的抗日運動，供給日寇以無數軍需資源與糧食。但是，這些罪行只能部份的獲得日寇的歡心，日寇被通過談判的方式壓迫德古，以謀全面的控制越南蘇聯軍政實權，割斷德古與美、英特別是與法國的微妙關係，這種關係，在希特勒崩潰前夜，尤其是美國在太平洋反攻節節勝利的情況下，已成為日寇南洋佔領區的一顆心腹之患，到今年三月九日，談判破裂，德古與日寇的矛盾於是表面化。

「三九」事件沒有得到有組織的越南抗日運動的配合，很快就被日寇武裝鎮壓，此時，越南面對着日寇直接統治的局面，但是越南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始終堅持着艱巨的反日陣線。

日寇投降越南要求完全獨立！

日寇投降，是越南民族運動的新的歷史轉捩點。反對法國在越南重新確立殖民地的蘇洛，抗擊法國聯合英、美反動派及日寇對越南人民所發動的進攻，已經成為全面性的流血戰爭，九月廿六日法越衝突開始了，越南爭取民族獨立聲響響遍了全球。

經過日本侵略者五年來的蹂躪，越南人民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自覺，在越共努力下，越南人民從未有像今天這樣的團結一致。越南革命黨派（特別是越共）的勢力，已經滲透到越南各種抗日與革命組織及工廠企業中去，建立了廣泛的深厚的基礎。越南有了五十萬在抗日戰爭中鍛鍊成長的武裝，並且成立了民族政權。這是越南人民流血犧牲換取的代價，對於抗日事業，越南人民是有貢獻的。

法越衝突以來，反法、日運動普遍發生，會一處停火的大規模戰爭亦因談判破裂又展開起來，越南革命臨時軍政府，派已控制東京，安南及交趾支那各區地帶。

越南民族運動領袖凡·巴克，在談判中堅持越南完全獨立的要求，要求法國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允許越南獨立，要求英、美停止支援法國武裝干涉越南人民的獨立運動。

現在東方被壓迫民族，世界工人階級與各國進步人士，正在密切注視與聲援越南人民的獨立解放鬥爭。

論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曉明

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一種特殊情況之下進行的，主要的大城市與交通線，被敵人佔領，抗戰的主要依靠是鄉村和農民。所以蔣主席在抗日戰爭開始時就指出：「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戰之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經濟基礎在於農村的農業國家，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中，有三萬萬六千萬是農民，所以鄉村與農民才是抗戰的主要支柱。抗戰八年來的事實是：沒有充分的兵力，不能進行長期戰爭，尤其像中國的工業與軍備這樣落後的國家，如果沒有廣大士兵的血肉作長城，簡直就不會抵禦敵寇和保衛祖國，然而兵士百分之九十五是農民；沒有足夠的糧食，也不能支持長期抗戰，然而糧食全部是農民手裏所生產的；為了抗戰的需要，在各地辛辛苦苦建築公路與飛機場的，十分之九是農民；抗戰需要大量的財力，而這些財力的最後負擔者亦是農民。當然，其他社會層對抗戰也盡了相當的貢獻和作用，但農民對於社會國家出力最多最大，負擔最重，却是被偏視的事實。這是中國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夠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八年多，打敗敵人無敵次的進攻，終於獲得勝利的主要原因，這證明了農民是創造歷史的主力。

土地是農業經濟最基本的生產手段，是三萬萬六千萬農民賴以生存發展，賴以創造歷史創造社會物質財富，賴以支持抗戰需要的主要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基礎。然而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歷史偏見作弄，封建社會一成立，農民一登上歷史舞台，普遍地農民就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權，土地問題就開始產生了。戰國秦孝公十二年，商鞅開始廢井田開阡陌，便有「豪強兼併，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的歷史現象。而且中國自從幾千年來，每次歷史上的興亡治亂之巨變的主要原因，都是土地問題尖銳化的結果。奇怪得很，仍有許多人硬要歪曲歷史，硬說事實地說：「中國從來沒有大地主」，硬說實

是取公正最合理的，它清楚地告訴我們：中國地主的「王國」一向是驚人的。這的不說，我們身處的湖南就是中國一個地主勢力很大的地方；新化縣一個陳姓地主「王國」領有土地五十萬畝。孫中山先生說：「中國革命也可以說就是土地問題的解決」，他早即看透了中國社會的病源，但我們從未大刀闊斧地去割治過，一直使它殘害我民族的健康，阻礙抗戰力量的動員。儘管早在抗戰開始後即二十七年四月一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就有「中國為農業國家，大多數人民皆為農民，故中國之經濟基礎在於農村。抗戰期間，宜謀農村經濟之維持，更進而加以獎進，以謀其生產力之發展」的莊嚴而明確的規定，但自始即不曾切實的實踐過，以致農村問題加劇地惡化。

抗戰任務的重心，在於打敗敵人，消滅敵人，爭取民族獨立，獲得國家的國際地位之平等，同時，並取得國內人民真正的自由民主和統一。建國任務的重心，在於迅速而切實地完成國家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巨大的建設事業，使臻於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境界。現在，抗戰勝利了，今後的主要工作是和平建國。但這個更偉大更艱巨的建國任務和建國工作，也必然地要同抗戰一樣，非主要的依靠着全國廣大的農村和廣大的農民，即不可能順利地進行和完成。說而不做，不能改變事實，歪曲歷史，蒙蔽現實的真相，不但不解決問題的態度。為了要真正解決問題，我們必須從正地來研究問題，通過問題，發見它的癥結所在，求得正確解決的途徑。

二 土地問題與農村經濟的特質和動向

中國土地問題與農村經濟的病疾之沉重，本是一件由來已舊的事實。戰以後，由於通貨膨脹無限制，物價飛漲不斷飛漲，土地資本和官僚資本資本互相勾結壟斷於土地投機和物價囤積，以致地價高漲，地價集中，農民

失地，社會中產階層加進崩潰，地租加緊，高利貸橫行，生產迅速減少，經濟發展到非常嚴重非常尖銳的程度，實在再不容許全國人民等閒坐視了！

抗戰中土地問題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特性和動向是這樣的。

第一，地權集中。中國土地分配不均與地權集中的情況，據抗戰以前的調查統計：全國三億三千六百萬的農民中，只有一小半即一億五千萬農民（領地一畝至十畝）是有土地的，其餘一半以上的農民包括佃農一億三千六百萬，雇農三千萬，游民兵匪等二千萬，共計一億八千六百萬的農民，都是貧無立錫的。同時，在一億五千萬領有土地的農民中，人口佔百分之五的大地主（領地百畝以上）即佔去了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五，如果合計人口佔百分之三十的大地主，中小地主（領地五十畝至百畝），人口佔百分之九，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九）和富農（領地三十畝至五十畝，人口佔百分之十六，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七）即佔去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一，而且這些土地都是比較肥沃的水田或平地；然而在相反方面，人口佔百分之四十五的貧農（領地一畝至十畝）却僅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六，如果合計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和中農（領地十畝至三十畝）也只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九，而且這些土地大都是很瘦瘠的旱田和山地。抗戰以前，地權集中的程度，由此可以概見。

抗戰以來，大後方農村經濟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土地資本的畸形發展。在這種情形下，一方面由於抗戰財政未能健全，通貨膨脹無法限制；由於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與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際金融動蕩極度不安，外匯波動劇烈，從前大批從事外匯投機與國際貿易的資金因失去活動地盤而回國奔馳到去後方，同時東南地區的資金因不堪敵人的壓迫，又大量內流；由於商業利潤之肥厚吸引了工業利潤，不僅巨額資金有人對工業生產的投資不感興趣，反而使大批工業資本為了自救或者追求更多的利潤，而不斷地逃亡到商業資本的範圍裡來，因此種種關係，官僚商人資本和地主資本的勢力便被培養起來，龐大得驚人。另一方面由於物價高漲尤其是糧價高漲與通貨膨脹無法限制，幣值不斷跌落，使巨額資金持有者，認為不僅土地是發財最好的對象，而且一土地是安放資金的保險箱。於是那龐大得驚人的官僚商大資本和地主資本互相結合，除囤積糧食，囤積物價外，轉瞬在於積聚土地，使地價扶搖直上，地拉地前前漲幾倍或十倍以上，使地權集中，農民失地，農村中產階層加速崩潰。此種現象開始於抗戰第二年以後，跟着資金內流，游資泛濫的凶惡，土地投機現象也更趨嚴重。距今四年前，第X戰區

經濟委員會出版的一東南經濟一三十年四月號，就已披露了這一事實的真相：「擁有大量土地及特產的地主，烽火中的暴發戶，以及一部份不借利用地窟流埃作走私和囤積居奇的非法買賣發財的喪心病狂者，他們在國難中對法幣懷疑，他們很聰明的想到購置國地是貯藏資金的，大家不約而同的紛紛購買土地，從後方到前方，從東南到西北，潮湧了暴發戶等購土地的熱潮」。近四年來，這種地價飛漲與土地投機的惡浪，是只有加高，而決不會緩和的。

在西南大後方，一方面因為比較安全，同時又是游資擁塞的區域，地權集中的趨勢更趨猛烈。四川的情形最為顯著，重慶與成都一帶的地價，比之抗戰以前，已經增漲七八倍以上。其他像昆明附近，桂東，粵北一帶，發國難財者層集之區，等購土地的惡浪也非常洶湧。不僅原來的大地主在併會兼併，而且還添加了大批官僚商人資本的爭購。其影響所及，使大後方土地兼併與地權集中的趨勢，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據葉良先生在本年六月份一軍事一十卷第十一、十二合期刊，根據新近各種官方報告和私人材料研究現在大後方川、康、滇、黔、陝、甘、寧、青、新九省地權集中的結論說：「今後大後方農地，十分之六以上，而且都是比較肥沃的一部分，全在佔全人口不到百分之三的地主手裡」。此種影響之擴大，由於地價與糧價的飛漲，刺激了其他物價的高漲，打擊了人民的生活，造成社會的不安。

官僚商人資本與土地資本是無孔不入的，在地價高漲的區域，固然有它們長袖善舞的餘地，即連這災荒地價慘跌的地方，也可以成爲它們角逐的場所。例如自三十一年以來，河南、山東、浙江、安徽等地，由於敵入蹂躪與人事不修所造成的災荒，使廣大農民棄家陷於水深火熱，農村生產停滯。在災情最嚴重的區域，土地價格一落千丈，有不及原價十分之一的；暴發戶得悉因之大量購進，土地兼併的現象更趨嚴重地滋長着。地權集中的結果：一方面就是意味著大批中農或自耕農失去土地，但農戶餘糧增大；但另一方面因爲大部份官僚商人資本所積聚的土地，不是當作生產手段去利用，而是當作待價而沽的奇貨，於是弄得許多肥沃的土地不能適當的使用，甚至讓它荒廢閒置，同時，大多數需要土地使用的農民，却又苦於無法求得土地，結果造成一地不能盡其利與人不能盡其力的不幸現象。

第二，土地使用分散。這人口不及全體百分之三即佔有全部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比較肥沃的土地的地主們，他們握得這塊廣大肥沃的土地，並不能夠自己耕種也不是僱用工人作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的農業經營

，而是次第地經過其土地管理人或持有資金的土地租當者之手，以五畝十畝至多不過三十畝的零散方式，轉租給一值三千六百萬而且正在飛速擴大其隊伍的佃農去作生產力極小極低的耕作。這種土地使用的實際情況，在全中國農村中和地權集中相形影地嚴重而尖銳普遍而深刻地存在着。試就我國農戶經營的面積來說，一個佃農最多能佃得三十畝耕地，而廣東農戶的經營面積竟有少至五畝九分五厘七毫的，在西康平均一個佃農僅佃得八畝耕地，福建亦平均為八畝左右，廣西平均十四畝，而全國的平均數字亦不過為十五畝。這就充分說明地主的狡猾和佃農的貧困。因為佃農是僅能得一塊面積廣大的土地，情形就將完全不同了，可以生產比自己需用和繳納給地主而外更多一點剩餘產品。但地主僅得佃農貧困是愈利於剝削愈易於制服的。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地主學會了將土地畸形的分散，在細小的土地的利用上打算，使佃農永遠「束縛在土地上」，不能翻身。而佃農只能在極小面積的土地上從事生產，這就註定着他們永遠陷於貧困悲慘生活的命運。因為在一片小土地上，他們不能以辛善取得比土地所能生產的更多的收穫。而在這一些可憐的收穫中除了十分之七八要作為地租繳給地主而外，所剩餘的東西供一家數口的最低生活尚且不足，即所謂「仰不足以及事父母，俯不足以養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斂於死亡」，那還有餘力購買肥料，採用良種，購買高價農具和提高生產力呢？所以他們永遠只被允許用疲疲的勞動去取獲着那極低極小的單純再生產。所以土地使用分散的毒害，不啻使農民永遠陷於貧困悲慘的深淵之中，而且使農業經濟的生產力永遠無法擴大和提高。

第三，社會階層加速分化。土地兼併風行與地權集中的趨勢，其反面便是充分意味着中農或自耕農的迅速失地與崩潰，佃農隊伍的形勢增大，以及社會階層分化的益大與加深。

在大後方，四川佃農增加與自耕農減少之趨勢，可從下列前四川糧務改進所與金陵大學農學院的調查統計表中看出來：

年份	佃農%	半租農%	自耕農%
二十三年	四九	一一	三〇
二十四年	五〇	一一	二九
二十五年	五二	一〇	二八
二十六年	五三	一一	二五
二十八年	五四	一一	二二

表中所列自耕農減少到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即在抗戰前後五年之間，佃農

增加了百分之五，半自耕農增加百分之三，而自耕農減少的速度最大減少百分之八，表示中間階層崩潰的程度最大，這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其次，自耕農減少與佃農增加的趨勢之速度，抗戰開始以後比抗戰前更快得多，表示抗戰以後土地資本開始活動的猛烈有力，這是第二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再次，自二十八年，自耕農與佃農在農村經濟的成份中即已成了二與五四這樣懸殊的比例，即佃農的隊伍為自耕農或中農的兩倍半，而且這還是在抗戰期中自耕農減少與佃農增加之趨勢發展的初期情況，以後他們勢力消長的對立，只有加劇加速的，而決不會減緩或緩和的，這正表示着農村經濟中，土地改革要求之迫切性，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三個特點。

再按陳翰笙先生在中國農村第八卷第五、六期合刊根據朱述仁對清華調查所作的一個粵北兩縣佃戶成份表，可以表示出粵北農村分化的動向。

兩縣佃戶成份變動表（以百分率表示）

年份	地主兼富農	中農	貧農	佃農
廿八年	七	一一	四〇	三五
卅一年	一〇	一八	二〇	四二

表中明顯地告訴我們，地主富農與貧農階級都在增加，只有中農在減少，而且三年時間就減少了三分之一，可見其衰落程度之厲害。這種地主富農與貧農階級向兩極端增加，而中農迅速沒落的現象，不僅表示地權集中於地主手，中農或自耕農失地，佃農或貧農向階級增加，而大大增強了地主對農民的控制和剝削的關係，而且說明了封建半封建的社會階級間之鴻溝正在加深。

第四，高漲地租的加劇，中國農村中佃農的成份普遍要佔全農戶的一半以上。據國府主計處統計局的數字，民廿六年中國佃農佔農戶的百分之三十三，半佃農佔百分之二十四，二者合計佔百分之五十四。據四川糧務改進所與金陵大學農學院的調查統計，四川二十八年佃農佔農戶百分之五十四，半佃農佔百分之二十四，二者合計佔百分之七十八，這與佃農的比例成份是驚人地。據前段的研究，抗戰以後，由於通貨膨脹，土地資本急形發展，地權加速集中，農民失地，自耕農減少，佃農隊伍與日俱大。因而更加劇了地主對農民加劇剝削的條件。

由於農村中封建半封建的經濟關係，中國各地租額都是提高。四川租

佃戶則比較嚴重，租額最高竟達產物收穫的十分之九，普遍的則八成，即普通所謂「三八佃二」。廣東租額亦普遍為正產物收穫的八成。江浙則普通為正產物收穫的七成。湖北各省如山東河北因農村產物減少，租額不稍低，普通為正產物收穫的六成或五成，但沒有比五成再低的。抗戰以後，由於糧價高漲，剝地地主從各方面極力增加租額。首先，就從正租方面增加：據三十二年一月廿六日大公報載，四川成都一帶普通將租額增加到正產物收穫的九成，甚至有全數繳給地主而僅以田賦及附近地地產給與佃農者。再在巴縣一帶，還有把租額增加到超過正產物總產量，叫做「乾加」的一種辦法，一戶只能產五十石谷子佃田，租給佃農，可以硬要收五十五石或六十石的租，迫得佃農必須買了谷子來繳納田租（見民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新華日報）。

其次，由於通貨膨脹，糧食幣賤，以及政府實行徵實購實的辦法，地主則更從改租為收實以及加押減扣等方面無微不至地增加租額。他們不僅將自己在抗戰時期所受的通貨膨脹與政府徵購的一切負擔，完全轉嫁於佃農身上，而且藉資榨取農民更多的糧食。是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但是，租額增加得愈高，農民改良甚至維持生產的可能與興趣也就愈低，結果，就是農產品的產量減少，影響於抗戰所必需的糧食軍糧和公糧。例如，前兩三年川北大旱時，農民坐視禾田變麥無力以救。因為農民們，與其去換高利貸來雇人車水，收穫所得全為地主奪去反而增加自己的痛苦和負擔，不如禾枯稔荒還來得合算啊！

第五，高利貸橫行。和租佃關係的高額地租同樣在農村瀰漫着一種殘酷的榨取作用的就是借貸關係的高利貸。它們不同的，僅在於前者是通過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後者是通過貨幣或實物所有權的形式，其殘酷榨取的程度前者尚有條件可言，後者竟無條件可言而已。

抗戰以後，農民在高額地租，捐稅苛重，兵役勞役（特別是保甲制度不健全與弊病百出下的兵役和勞役），物價高漲的重重壓迫之下，農村中佃農貧困和中農負債的情形是極普遍的。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三十三年七月調查四川璧山附郭四鄉，除地主外，二百六十一家農戶中負債者達一百二十九家，約為百分之五十，平均每戶負債額九千三百五十三元。又據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調查湖南會同縣的統計數字，農戶負債者達百分之六十以上。河南鞏縣三十年（大災以前）據調查農戶負債者亦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由此可見，中國農戶一半以上是生活於債台之上的。

利率的提高，在抗戰以後本是普遍的現象。債權人由於通貨膨脹與物價飛漲而不耕地位上，拚命提高利率，那是勢所必然的。例如湖北某些地方在抗戰前利率普遍為百分之三十，至二十七八年間增加了一成。西南大後方則更為慘重，高利貸的勢力更因通貨膨脹而更趨於高利貸。然而單只提高利率，其榨取程度是有限，抗戰時期高利貸的特點，尚不在提高利率，而在把榨取物實幣的趨勢，普遍實行「貸款收實物」的吸血方法。例如三十二年以後，粵閩兩省高利貸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除了少數城市還有錢貸銀行外，廣大的農村差不多一致是實物借貸，借的是錢，還的是實物。而在福建則「借息通常加九利，就是一石還九石，而借出時，是九斗作一石算」。高利貸吸血方法之厲害誠忍於此可以概見。

在抗戰期中，農民除受高額地租與高利貸濰滅的剝削而外，還要在善於舞弊的保甲制度下忍負捐稅的苛額，兵役勞役的重担，以及受物價高漲和商品關係的剝削，這些有目共睹的事實，此地因關係不詳論。

三 土地改革是工業化的基本前提

中國如果要使國家轉於真正富強的境地，要使國家的社會經濟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建立強大的民族資本主義的工業基礎，要把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經濟落後的農業國家改造成為一個在國民經濟中工業比重佔巨大優勢，農業現代化的國家，在中國目前全部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中，首先必須徹底地消除阻礙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數千年遺傳下來的封建半封建的經濟關係，即必須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實行沒收日本侵略者及親國有據的匪要漢奸份子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實行減租減息，確保租權等辦法，實行國父孫中山先生解決土地問題的兩大基本原則：即對於城市的土地，為抑制土地投機，以實行地價稅及土地增價全部歸公為根本主義，對於農村，則實行耕者有其田為根本要求，將全國廣大農村中三萬萬六千萬的廣大農民，從目前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額地租，高利貸橫行以及捐稅苛重等等封建半封建的舊物中解放出來，使他們的生產生活趨優裕，能夠有無限量的改進和擴大生產的充足的能力。只有這樣才能為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建設之發展，造成無限寬廣而不平坦的道路，達成其必要的諸前提條件：

第一，自由勞動者 建立強大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第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

，是必須要有大批的從封建對建的土地東線上解放出來的自由而獨立的產業勞動者。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就知道自由而獨立的產業勞動者，在現代社會經濟生產力中是一個最決定的因素。如果一旦缺少了它，作為另一重要因素的生產手段（包括機器工廠原料土地等）都將馬上失去作用而變為死的廢物，而整個社會經濟的核實財富的生產過程亦將立即宣告停頓。

我們有三萬萬六千萬農村的農民，他們在過去是中國封建社會時代兩千餘年來社會物質財富與歷史的創造者，是抗戰八年來為爭取最後勝利而與民族獨立所必需的大力物力和財力的主要供給者，是今後中國富強力量的根本源泉；更具體的說，他們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式的大城市，就需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期過程。但是，這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期過程，在中國今天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下，必須經過如何的方式才能完成？更明白地說，就是要用如何的方式才能把幾千萬的農民從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租地租，高利貸橫行與捐稅苛重的封建半封建的經濟束縛中解放出來，成為工業化所必需的產業勞動者？

這個問題，從歷史上來看，西歐諸先進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英法，把人格不獨立身體不自由的農民從中世紀封建莊園裏的土地束縛和其他許多對總額中解放出來，變為獨立而自由的產業勞動者，即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而達到偉大的產業革命的過程，不僅經過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乃至十八世紀前後數百年，為城市資產階級幫助和領導的，無數次的農村的反封建束縛的農民戰爭，與無數次的潛在的長期反對封建束縛的經濟鬥爭，而且還經過英國一六四〇至一六八九年與法國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前後兩次以城市平民為先鋒隊，以廣大農民為後備軍的推翻地主貴族和僧侶統治之封建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大革命，徹底地（如法國）或半徹底地（如英國）解決了為封建社會之經濟基礎的土地問題。但是中國目前所有的歷史條件比英法當時更為有利更為進步，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抗戰獲得最後勝利，民族獲得獨立解決，國內取得自由民主和統一的國家政權以後，只要我們決心繼承祖國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遺教，徹底地實行土地改革，把三萬萬六千萬農村的農民從目前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租地租，高利貸橫行，捐稅苛重等的封建半封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就能在幾年至十年左右，完成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過程，造成幾千萬自由獨立的與現代化的工業

技術相適應的產業勞動者，同時並造成廣大的生活優裕而有採用機器擔任農業現代化之充分能力的農民，而為國家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開闢一條寬宏而平坦的道路。

第二、資本的積蓄 顯然，中國要進行巨大的工業建設，是非有幾十萬萬萬萬萬的投資不可。在這種我們知道，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少部份地是藉助於外面資金的流入而建立了自己的重工業的。即藉助於掠奪殖民地，藉助於向戰敗國索取賠款，藉助於外債。然而我們中國在抗戰勝利後，它兩兩從被壓迫被掠奪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火坑中踏出來，所以我們原則上不能而且不可能採用那掠奪的來源，作為工業化的資金，如掠奪殖民地而向戰敗國的人民索取沉重的賠款。當然，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以後，藉助於戰爭的日統治階級以及作它幫兇的漢奸分子的企業和財產，歸於被沒收來作為工業化資金之一部，盟邦善意的投資也應當大量地歡迎。但是前者與我們巨大工業建設所需之資金比較起來有限，後者又不敢無條件無限制的採用。如像納爾遜先生所主張的郵務，中獎合辦紡織工業，「美國資本佔百分之六十或七十」（註一）中國方面出資本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然後在「二十年之後，美國一部份股份可由中國人買去，直至中國人管理全部財產為止」（註二）。但是，中國抗戰勝利以後，剛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剝削中站起來，真正的民族資本還是非常的幼弱，而且它的半殖民地性質仍然沒有完全的消失。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我們認為那種借外資與華資處於七與三之比的不平衡的出發點上，中國實在沒有把握將來在十年之後逐漸收回百分之七十的外資。這決不是說我們不能利用外資，而是必須像過去美國在南北戰爭以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所已有的先例一樣，站在民族獨立的原則上，利用外資，那就是：無論如何要千方百計保證民族資本積蓄的規模和速度在全盤工業化過程中佔有主導地位。如果不然，那只有淪於殖民地的一途。這決不是消極的限制外資的意志，而是積極扶助民族資本更大更快發展的意思。

因此，我們工業化資金的來源，主要的只有求之於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自己來積蓄，外資是可以利用的，而且應該十分的歡迎，但它只能是輔助作用的東西。總而廣大農村中的廣大農民，目前最應在土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租地租，高利貸橫行，捐稅苛重等的封建半封建的束縛中，生產力那樣低微，生活那樣貧苦，就是堅持那唯一賴以生存的農業再生產向非常困難，那種還有餘力從事資本的積蓄。

問題如同玻璃一樣的透明，要打開關稅這一個合理的出路，那就祇有澈底地實行國父孫中山先生遺教中關於解決我國土地問題的兩大基本原则：即對於城市的土地，爲抑制土地投機，以實行地價稅及土地增價金部歸公爲根本主張。對於農村則以實行耕者有其田爲根本要求。然後即將我們工業化資金開出三個最理想的來源：（一）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抗戰最後勝利獲得以後，從前在抗戰時期，退居到西南大後方和農村中的大批巨額資金持有人，定將迅速地擁入東南或內地的大小城市中去從事活動，而使全國的都市迅速地繁榮起來。因之都市的地價亦將隨着都市的日趨繁榮而高漲起來，如果澈底地實行地價稅和土地增價金全部歸公這一基本原則，不僅可以抑制都市土地投機的惡現象，而且可以爲我們國家重工業建設取得一個龐大的資金來源。（二）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以後，如果實行沒收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份子的土地，分給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實行減租減息，保障租佃，更積極地實行扶助農民獲得土地的各種有效的辦法，例如實行大量低利或無利的貸款，幫助農民購買土地。務使廣大農村中的廣大農民達到「耕者有其田」的根本要求，使他們的生活日益富裕，生產力日益提高，生產規模日漸擴大。然後三萬萬六千萬廣大的農民持有充分的餘力，來不斷地大量地積蓄資金，向工業部門購進大量的工業品，農業機器，化學肥料，改良種子，使農業走上現代化的道路，爲城市工業部門供給豐富的糧食和原料，使農村中無限厚龐大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巨大的工業建設中去，壯大工業化的資本，使國家工業的發展建立在一個最堅強最健全基礎之上。（三）在澈底地實行土地改革，逐步地使土地歸耕者之手，使農民生活日益富裕，使農業生產無限制地繁榮提高和擴大起來以後，從前在抗戰期中在大後方在農村中從事於土地投機，放高利貸和囤積居奇的，禍國殃民的，巨大驚人的官僚資本，商業資本，土地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都將完全失去它們向來投機活動的地盤，而自然地或被迫地走入工業生產建設的正路上變爲工業化資本的一個巨大來源。假若不然的話，它們這股巨大的洪流，仍將泛濫在全國的都市和農村中，無孔不入地從事各種投機事業，不僅使工業化失去一個巨大的資金來源，而且它們的洪流所到即將將死工業化發展的一切道路。抗戰時期甲它們已股洪流所加於工業生產的災害，是值得全國關心國家工業化前途的人們的痛省並引爲戒鑒的！

由以上所論，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只有土地改革才是解決工業化的資金積蓄問題的一把最銳利最健全的金鑰。

第三，國內市場的開拓 更明顯的，就是如要使民衆資本主義工業建設順利地建立起來並發展壯大起來，一個和資金積蓄同樣的重要的前提條件，即是工業品的市場之開拓。祇要一個具有經濟學基本常識的人就會知道：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法則的統制之下，商品的第一次再生產過程要達到商品的第二次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過程的中間，必須將第一次再生產出來的商品，拿到購買力充足的市場上去經過一度交換過程之後，把它轉變爲比進行第一次再生產過程之前更多的貨幣和更多的商品（如原料和機器等）始有可能。不然，沒有市場或市場上的交換過程一經阻礙和停頓，工廠中的生產過程即將隨之而阻礙而停頓。同時，那可怖的經濟危機的驚濤駭浪，亦即阻礙轉來，因而工業品的市場之爲工業化的前提條件，即爲商品的交換過程之爲商品的生產過程的前提條件之外的表現。

先進諸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市場，其中的一部份是求之於國內廣大的人民，其另外部份乃是求之於本國以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國家。它們首先經過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由海外探險，發見了南北美洲的新大陸和非洲南部、印度、南洋、遠東及澳洲諸經濟落後民族和國家，而建立了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建立之後，使它們的工業化得到廣大而驚人的發展和進步。中國戰後工業化需要一片購買力豐厚的廣大的市場，那是沒有問題的，但以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經濟的性質來說，原則地不能也不應請求之於本國以外的殖民地或世界市場。如像納爾遜先生所主張的那樣，極力發展經工業去承繼日本侵略者於太平洋戰爭之前在南洋、印度、近東、和澳洲非洲同英競爭得異常尖銳化的世界市場。如所週知，日本過去之所以能够維持它在世界市場上角惠的地位，主要的依靠兩個支柱：一個是對外實行大規模的廉價傾銷政策，一個是對內實行殖民地式的極度的低額工資；而前者之存在的可能是完全建於於後者之上的。假若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去代替日本的地區，據過去競爭的經驗，勢非承襲日本這種對外的廉價傾銷政策和對內的極度低額工資不可。然而這兩者無論從後同盟國的國際的政治團結與經濟合作的利益着想，或者從國家工業化之健全發展與國內廣大人民之幸福的利益着想，對於中國人民都是極端有害而必須嚴加禁絕的。

然而，中國工業化所必需的市場，既不能求之於本國以外的殖民地或世界市場，當然就只好向國內廣大人民尤其是廣大農村中的廣大農民中去開拓了。因爲三萬萬六千萬廣大的農民中具有着無限大的可能性，可能爲城市的

工業供給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吸收廣大的工業品。但是，如果他們處在像目前一種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額地租，高利貸橫行，及捐稅苛重的封建半封建的嚴重壓迫之下，廣大農民的生活是那麼貧困，農業生產力是那麼低微，以強度勞動來維持其賴以生存的單純再生產，實覺十分困難。那裡能夠為城市工業供給必需的糧食和原料，和吸收龐大數量的工業品？問題是工業化資金的積蓄一樣要打破難關找出合理的出路，祇有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一途。即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以後，澈底實行沒收日本侵略者及重要漢奸份子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澈底地實行減租減息，保障農民的租權，實行有效地幫助農民獲得土地的辦法，例如實行低利或無利的借貸，幫助農民購買土地，務使三萬萬六千萬廣大的農民個個都能逐步達到「耕者有其田」的根本要求，使他們的生活日益富裕，生產逐漸改良和擴充。然後農村中的農民，才能為城市工業供給豐富的糧食和原料。而且向工業部門購買工業品，農業機器，化學肥料，使用改良的種子，使全國廣大的農業迅速走上現代化的道路，為工業化開拓一塊無邊無底的國內市場，使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建立在一個最堅固最健全基礎之上。關於中國土地改革與工業市場之開拓這個問題，美國工。羅辛格先生在「作爲戰後市場的中國」一文中有一段精闢的見解，最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鏡，他說：「要使工業化本身健全，或能發展全部力量於逐漸提高生活水準，則除非把農業不僅加以技術的改組，而且加以社會的改組，使農民有力量來購買工廠的產成品，藉以形成一個廣大的國內市場（着重點係引者所知）。如果中國要完成工業化，而它的農民仍在奇高的租金，苛重的捐稅和普遍存在的高利貸之下來耕種小塊的土地，結果只能是加深鄉間騷動和不安的危機。而同時，城市勞動者必然只能得到低微的工資，因為農村中的過剩勞動將隨時準備被吸收到工廠中去。這種情形下的工業，中國可能會重演日本的經驗，日本便是未能澈底改革其農村而樹立起工廠來的，結果，由於國內政治結構的壓制性，以及國內市場之全然無力以消納日本工業出產最終被推走上了侵略的道路了」（註三）羅辛格先生是何等明確地爲我們指出一條使工業化健全發展與開拓國內市場的道路。同時又何等嚴切地警告我們不要重蹈日本統治階級侵略自取滅亡的覆轍！

第四，政治前提 如果要保證中國工業化能順利地發展，不僅需要獨立自由的勞動者，巨大數量的資金，和廣大的國內市場，而且需要一個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政治，民主與統一的政治，則

不可能有真正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工業，沒有重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沒有人民的幸福便沒有國家的富強。這是政治對於經濟積極的領導作用。然而，據中國近百年來慘痛的歷史經驗，一個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政治，是不可能置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但是，要獲得獨立，就必須澈底地消滅日本侵略者，把全民族從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鎖中解放出來；要獲得自由，民主與統一，就必須在政治上澈底地實行民主改革，使全國人民不論個人和政黨在政治上都有合法平等的地位，都有充分過問政治，參與政治和管理政治的民權，必須在經濟上澈底地實行土地改革，根除現存的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額地租，捐稅苛重與高利貸橫行的封建半封建的經濟制度，解放全國人數最多，束縛最大，苦難最深重的三萬萬六千萬農民，使之自由，使之富裕。然後一個真正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政治才有可能樹立起來。

有了一個真正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政治，我們的人民和政府才能手腳一致，同心協力地採取和實行切實而正確的政策，步驟和計劃，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起巨大的重工業，普遍的輕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使中國農業國的地位升到工業國的地位上去；然後才能使國防鞏固，人民幸福，國家富強。同時，也祇有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佔最大優勢的工業，比現時發達好幾倍現代化的農業，以及與之相應的運輸、貿易和金融事業爲真實基礎，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政治，才能期於鞏固堅強。

總之，中國工業化所必需之根本前提——自由勞動者，資金與積蓄，國內市場的開拓，政治前提——都非經過澈底的土地改革，解放農民，依靠農民，不能達到合理而正確的解決途徑。真理只有一個，假若有人企圖在野路去繞過它，不是遭到落空的打擊，即會錯入迷途，陷進沒頂的深淵。我們願意提醒萬一有此企圖的人們：我們祖先留給我們最巨大最豐富的遺產，就是今天全國廣大的農村和三萬萬六千萬廣大的農民。他們是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這座莊嚴而美麗的華屋的主要建造者，沒有他們即一事無成。

註釋：

①見納爾遜作「中國也能幫助我們」一文，發表在「本年五月二十二日科學雜誌」，譯文見本年六月十八日新華日報

②同註一。

③見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新華報半月刊第十卷第十一、十二合期劉宗光先生的譯文。

閻 錫 山 批 判

陳伯達

最近（按：指一九四四年八月間）西安各報公佈了閻錫山對中外記者團的談話。其內容除了對於抗戰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和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外，沒有其他的東西。對於閻錫山這個人，我們是熟悉的。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高唱反共，向華北伸出其侵略魔手的時候，閻氏就是首先成為反共聲浪的一個，那時候，他那一套一套的反共「理論」都捧出來了。他在一九三一年居住日本帝國主義租借地的大連，偽反共而寫的所謂「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也於這時候發表了。為了達到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目的，閻氏對於當時揭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的中國共產黨，不惜採取一切最無恥的造謠中傷手段，這想我們不想多費筆墨去敘述它。抗戰開始後，即則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在山西方面幫助了他，希望他能夠在敵人進攻的面前站得住腳，但是閻氏始終念念不忘反共，把反共放在抗戰的前面，繼續他在抗戰前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的造謠攻擊。不過這一時期，他的反共是隱蔽的，不公開登在報紙上。民國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七月（有一個單行本又說是九月），他在晉綏軍高級將領會議上發表一個建立中心思想的講話，全篇鼓吹日本帝國主義對出一箭，一切的箭都集中向共產主義射來，對於他過去的造謠又重復一遍，並作了一番小小的概括，說什麼共產黨「鼓吹共產主義的主張，須繼續不斷天天殺人」，「更不但不提倡仇父，鼓勵女子裸體遊行」（見閻氏救國言論選集，第二輯）。這些，可以說是造謠到無聊之極了。可是，閻氏却還在那裡滔滔不絕地噴噴着，希望取得那些與民為敵的人的信任。共產黨因為還想團結他一種抗戰，對於他的各種無理取鬧，向來採取容忍的態度，即使有同志對他經過一點批評，態度也是溫和的。關於他勾結敵人的事實，一直希望他改悔，長期地沒有把它公佈。可是閻氏不但沒有中止對敵人的勾結，而且沒有因為共產黨人對待他所採取的容忍或誠懇是一種好意，反認為可欺，在他那裡繼續進行一切反共的思想宣傳，最近對中外記者的談話，竟然是那麼信口雌黃了。對於閻錫山這種厚顏無恥的造謠欺騙，最好的回答，當然是揭發各種事實，而解放日報八月十一日（三十三年，下同）所登載的太行電訊，八月十四日所登載的薄一波同志轉鈞同志的談話，八月十六日及二十四日所登載的續範亭先生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回答。這些消息、談話和文章都暴露了閻錫山勾結敵人、反對人民的鐵的事實。我這篇東西，只是想就閻錫山的思想及其實踐的若干問題加以檢討。有的問題，以前有同志說過的，這裡就不再說或少說。有的問題，如係比較次要的，這裡也不準備去說它。

一 閻錫山的出發點

抗戰以前和抗戰以來，閻氏各種花樣翻新「學說」，和他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措施（即所謂「新政策」），是有他的「出發點」的。他這個出發點既不是為人民，也不是為抗日，而是為維持他獨自在山西所已鞏固了數十年

之久的軍閥專制政權。這回中外記者團到克維城（即閻氏政權機關所在地）的時候，那是一個「負責政治責任的人」曾經這麼告訴過其中一個記者：他們近來在山西所實行的那套一套，「主要的理由，却與環境所影響，非如此不足以維持正常的政權」。「不完全是戰爭」，他坦白地說，「據我們的經驗，爭取民眾，還是比較輕鬆的工作……我們所最感困難的，是社會廣義的宣傳。為了維持正常的行政系統，我們不能不請求應付之道」。「我

們認為，對共產主義的活動，最好的應付方法……是健全自己的民衆組織，改善民衆生活的觀點」（見重慶新民報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由此可見，閻氏的政策，只是簡單的爲維持他的專制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而對閻氏看來，維持他的這種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乃是同義的東西，乃是同一的工作。至於就說呢？那就早放在他的腦後了。

這類的思想，從閻氏的講演和文章中，我們可以找得很多。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有一個講話，在那裡，他認爲：「只要『拿政權者』（按：實際上是『誰沒有經過任何人民合法手續產生出來的政權篡竊者』）善於『適生』，政權就可以『永不凋謝』（見閻錫山官廳雜誌第二輯二四八頁）。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年）二月，他又有一個講話，是附錄出：自從『九一八』以後，他『經過數年的向中樞要人在南京、太原迭次磋商』，其中大問題，即爲『如何鞏固政權，則成爲抗戰的緊要問題』（同上書二七八頁）。閻氏這種的思想是很明白的，作爲中國抗戰的緊要問題的，並不是如何加強抗戰的力量，以取得勝利，而是如何鞏固他們原來所篡竊了的專制政權，以避勉人民的染指。據閻氏這段話，回溯一下歷史，也是有些意味的。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閻氏有復蔣介石先生函，同年十二月九日，閻氏又有對全省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教職員之講話。那時日寇蹂躪華北，提出『華北五省自治』，形勢極端險惡。大家知道，十二月九日又是北平英雄的學生們舉行悲壯的示威運動，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日子。但是，閻氏在那裡提的問題，却絕不是如何抗日救國，而是如何『防共固存』。他說：『誰自存自固，誰日好，誰日不好。不能自存自固，誰日無家，誰日無家。』他又重復地說：『不能自強，誰英美亦無益，親日無奈，親俄亦無奈。』他認爲，『英美亦無奈，親俄有益，親日亦無奈』（以上所引，均見閻氏官廳雜誌，第九冊）。事實上，當時閻氏這種思想並沒有對抗戰起一件好事，那時他所討論的，僅僅是——『誰自存自固的無恥的反應派』——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新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掌裏的斯斯上，並計劃如何使自己在他的斯斯的一個『日俄戰爭』中安心從事『防共』的工作（見閻氏的兩個文件）。那時閻氏所謂『如何鞏固政權』，真相就是這樣。既然他連進步都沒有達到抗戰這一件事，所以也還沒有什麼進步問題。他的所謂『自存自固』，所謂『自強』，絕不是有什麼民衆組織的成分在內，而是『防共固存』，『鞏固現有政權』，他即是鞏固閻氏及其同類者的專制政權。只要他鞏固這個

政權可以『適生』，『永不凋謝』，誰他的意見，就是誰日，也不如誰，却定算『好』的。你看，閻錫山就是要這樣來建設我們的民衆危難問題。

至於在閻錫山所領導的這個專制政權下面的情況究竟是什麼情況呢？他統治了三十年的山西，不錯，那也是一個『模範省』。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模範』呢？不用我們多說，請看閻錫山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他的綏靖公署省政府紀念週上所自己供述的吧：『山西自身，爲國民經濟崩潰之自身』。『山西國民經濟，已成破產之勢，十家九貧，十村九困』（官廳雜誌八冊）。這就是閻氏在山西的政績。從他這個政績，可以看到他這個政績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這就是極權腐朽的假人民民主的殘民以濫的事實對政績。可是，閻氏無論如何，是必須維持他這個政績的。爲此，他可以支出一切代價，採取一切手段。爲此，他更加加緊反對人民，加強反對民主主義。而他的所以把反共的工作放在最前頭，就正因爲中國共產黨是破壞地方代表中國人民利益和中國民主主義，因此又是最堅決地代表抗日路線的政黨。爲了保持他的政績，他在人民的抗日高潮中，竟然提出『親日亦無無益』，而毫不覺得羞恥。真的，這樣的話，如果全是這樣的統治者，如何能說得出口呢？

一九三五年，閻錫山和日寇的『華北防共自治』唱雙簧，提出了『防共的兩個根本大法』。他說：

「……我認爲這兩條路，均可以澈底的防共。走前一條路，可以說用法西斯主義的防共方法。走後一條路，可以說用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防共方法。法西斯的防共方法，是要重人增加負擔，與政府合作鞏固現有的政權，抵抗共產勢力（按：即指抵抗人民民主勢力）的侵入。以建設農業社會主義防共方法，是廢除土地私有權，樹立土地公有權，消滅共產黨發生的基礎。然而不能說走前一條路，就不說走後一條路，走後一條路，就不說走前一條路。其實這兩條路，均能達到防共的目的，可以說最方法的兩個防共路。不但不能說，並且是前後相呼應。何以呢？因爲如果不走前一條路，就沒有建設走後一條路的基本條件；不走後一條路，則前一條路也絕不能持久。所以這兩條路，只有緩急的不同，沒有矛盾之相左」（消除社會不平等防共，官廳雜誌八冊）。

閻錫山原來是公然主張以法西斯的方法爲反人民反民主的基礎，而以所謂『農業社會主義』爲其補充的（關於他的所謂『農業社會主義』，見下

面(分析)。他在抗戰前途多難時中，總是那麼熱心介紹德意兩國的法西斯國防軍的猛烈運動，又那麼驚嘆地說：「這有今日德意兩國政府出現！」

「這有今日之德國政府！」閻錫山及山西境內和閻氏同類型的政權，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法西斯政府。

中國人民中間，極豐富的潛存的反法西斯的精神，又若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心代表的現實的民主主義的力量，並沒有阻礙閻錫山(及其同類)在抗戰前所倡導的法西斯「防共」的道路，而竟和中國共產黨在一起，走上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和民主主義的道路。日寇大規模打進中國本部領土上來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了，抗戰爆發了，情況的發展，不能使閻錫山專心從事反共的工作。日寇大舉到了山西，威脅了他的「無條件存在」，這時，他只好被迫地進行了抗戰的投機，與共產黨及進步人士合作，表現要「進步」，並採取共產黨的一些號召，作為「爭取民衆」的資本。但是大家知道：閻錫山也並非「以不變應萬變」的哲學的，他這個哲學，據說「部分叫做『母理』」，「一部分叫做『子理』」。正如他自已所說的：我的「母理是永遠不變」的，變的不過是他的「子理」。他的「母理」是什麼呢？就是「至固不變」，就是「自存與自固」。他的「子理」是什麼呢？就是「應付一下抗戰(因此就要和共產黨進行一定限度的合作)」，同時在日寇都仍留了後路，即是「親口亦未嘗無礙」(因此就要繼續佈置反共工作)。他的「子理」並不能離開他的「母理」的，而且只能以維持他的「母理」為目的。抗戰的困難越增加，敵人的誘惑越積極，他就越越來越不說話了，這話，不管表面上唱些什麼「民族生命」的詞句，有些時候甚至「激烈地」唱過，但骨子裡所發的，却是另一回事。政權、政權，政權，政權，專制、專制，這是閻氏全部活動的目的。為此目的，他竟認爲利用敵人來「肅清」八路軍和決死隊(即山西新軍)是「至固不變」。他和敵人早已有了瞭解，並已有了秘密的協定。敵人答應他在一定時機可以讓他回到太原去。即如他現在的晉西地盤，也是敵人和平地覆他存在，作為「防共」的試驗區。這些都是敵人皆知的事實。維持政權和「防共」，本來對於他是二而一和「一而二」的東西，現在對於他更甚二而一和「一而二」的東西。不過在他看來，他的政權已不能只限於單純的「防共」了，他還需要「開展」，因為山西在抗戰烽火中已建立有多處民主主義的政權了，所以這需要向這些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展」，即向共產黨領導抗戰實行民主的地方「開展」，才能達到「收復」他原來所願望的山西政權的目的。總之，不論「至固」也罷，「開展」

也罷，都是聯繫在勾結日寇反人民反民主反共這一清上的，這已成為閻氏專制的邏輯。

且看他那最近大吹特吹的所謂「兵農合一」吧。那想訂的「全而突擊」，並不是秀的什麼字句。這再看他自己對於實行「兵農合一」的真正的目的吧：

「你們對實行兵農合一，不但不敢認爲是個補兵問題，就是認成是實行我們主張也不够，我們還是打破地下組織，象我們組織，惟一的最好辦法。」

看他又說：

「我們今天如果推毀不了他的地下組織，打不破他的基幹小組，就不易開展。但我們今天有什麼辦法，可以摧毀他的地下組織？……我們是要求上實行兵農合一來打破他。如大雨普下，很快的就可以打破他！如何打破他的基幹小組？就是要用上壓強的組織小組來消滅他，他好比是個狗魚鱗，我們是打獵的，一定很容易的打破他！」(上面所引均見本(三十三年)年三月閻氏在莊莊會議上講話)

這是什麼話！大家看，山西省這個「打獵的」，不去打日本人，却去打「狗魚鱗」，却去打「他」。山西的「壓強的組織小組」，不去消滅日本人，却去消滅「他」，却去「摧毀他的地下組織」。在這些不在報紙上發表的話中，比他對記者說話時所說的：「捉共產黨，訓練三天放回去」，「八路軍打我，我忍辱不公佈」，那種似乎有很多仁慈道德似的，僅僅就一區仁義道德的花子也看不見了，看得見的，盡是對人民對共產黨的萬丈殺氣！閻氏的所謂「他」，是什麼呢？「他」就是人民，就是和人民在一起進行抗戰、建設民主的共產黨。閻氏的所謂「地下組織」是什麼呢？那就是人民的抗戰民主組織和支持這組織的共產黨。他所要打破的——對他自己的話——就是這個「他」，並不是敵僞。他所要消滅的，就是這像一種組織，並不是敵僞。閻氏所做的是這像僞親者所願，而爲仇者所快！他的「兵農合一」，竟是這像從抗戰同胞和從事內戰的動機而提出的！

還有，什麼叫做「如大雨普下，很快的就可以打破他」？這在一九三九年，閻錫山在秋林開幹部會議，準備襲擊新軍之時，他就告訴人們：「快要下雨了，準備雨傘吧」。就是說要投降了。「大雨普下」，即所謂「全而和平」，他後來估計，總有那麼一天的。他認爲到了這種時候，對於共產黨，

「很快的就可打破他」。作這種想法的，中國不只他一個，還有其他的人。然而時局的發展，不是「大雨普下」，而是日蹙中天，一定擊打到「無條件投降」，這也就成了閻錫山這批人的永遠的悲哀。

要問：我們共產黨人和閻錫山的主要矛盾何在呢？要問：為什麼我們共產黨人特別受了閻錫山那樣的攻擊和仇視呢？問題的出發點就在於：我們共產黨人和閻錫山在思想上、實際上完全不同的出發點。我們共產黨人思想和實際的出發點，乃是解放民族和解放民眾。我們在政權問題上的一切採擇，全都以此為出發點，以此為標準。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誡我們共產黨員：如果我們這個黨不能替民族人民辦好事，這個黨就毫無用處的。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一個極著名的演說，而且被日寇認為最可怕的演說，其中有幾句特別重要的話是這樣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也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自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他本身決無私利可圖。他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志。他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這番我們共產黨人的思想。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實際。共產黨人和閻氏主要矛盾的出發點，就在於：共產黨無私利可圖（因此，堅決抗戰，解放人民，政權是人民所共有），閻氏一類人則唯私利是圖（因此，認為「親日亦未嘗無益」，束縛人民，而執著自己寡頭專制的政權，反對人民過問）。閻氏他們的攻擊共產黨，也就在於共產黨不圖私利；假如共產黨也是圖私利的，他們也就不會對它攻擊了。

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精細的算盤上，把壓在人民頭上的特權放在「佛一」的心思上，真實就被顛倒了，是非就被顛倒了，人民的擁護者就被看成「被拔之而後快」的眼中釘了，造謠就被當成攻擊人民擁護者的得意工具了。閻氏說：

「宣傳與鬥爭不同，把自己的好意思與人知道，把別人對自己的誤會給人解釋明白，這叫作宣傳。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這叫作鬥爭」。我們的同志要將宣傳與鬥爭分辨清楚。宣傳有時可以不作，鬥爭一刻不可放鬆。不但不可放鬆，更要以鬥爭對鬥爭」（革命行動十卷十期）。

這是閻氏鬥爭哲學的一部分。閻氏認為：「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是「一刻不可放鬆」的。他就是這麼來對付共產黨的，而這回對記者團的談話，竟親自出馬了。對於我們，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還

不過是那兩隻眼睛只注在自己所壟斷了的私人政權，而絲毫不以天下、國家、民族、人民的前途為念的一切人們所必採取的手段。閻氏這個「鬥爭哲學」所告訴我們的，却正是：凡是閻氏所說「自己如何好的」，一定是不好的，因為如閻氏所說，這些都是「故意製造謠言」。而他們所說「別人如何壞」的，一定又是很好的，因為他們所說的「如何壞」，又不過是「故意製造謠言」而已。

就讓事實來證明吧！就讓山西的老百姓來表決吧！以下我們要檢查一下閻錫山的「經濟計劃」和「政治計劃」的各種事實，來看出他從上述的出發點而實施在這兩個方面的具體結果。

二 閻錫山的「經濟計劃」

閻氏最近對記者團大吹大擂他的所謂「兵農合一」。他是這麼說的：「根本上共產主義對勞動者是「先甜後辣」，與人土地，收入的糧食再行分配，無論如何巧妙的說法，根本的政治心算就得不到人的同情。我們是按勞分配，對勞動者是「盡甜無辣」，與人土地，不收人的糧，使人負擔，不要巧妙的說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好吧，我們且按下閻錫山的所謂「共產主義對勞動者先甜後辣」，下面再說，先看看他的「盡甜無辣」吧！

閻錫山所謂「盡甜無辣」的「兵農合一」，按照他自己所述，是這麼一回事：

「兵農合一，就是把投槍（按：指從十八歲到四十七歲）壯丁，每三個人編成一個兵農互助小組，其中一個當常備兵，入營打仗受優待，其中兩個當國民兵，在家種地或做工優待人。

同時，當國民兵的，再與村中其他有勞動生產力的一至三人編成耕作小組，以國民兵為主耕人，其餘為助耕人，每一耕作小組分配地二份，由耕作小組合夥經營耕種，按勞動力分配其勞動生產的成品。

因此，還必須劃分份地，即把村中所有土地，按照年產量劃收穀二十石小麥或小米為標準，平均劃分成若干份地分給耕作小組耕種。

至耕作生產的分配辦法是：一、田賦軍購及村雜糧等稅費負擔，約佔全產量百分之五；二、地租按糧額正額向地主交納，約佔全產量百分之五；三、種子肥料等一切輔助開支約佔全產量百分之十五；四、餘糧約佔全產量百分之五十，作為勞動報酬，由三助耕人合

蘇南訂分地享受。此外，每個當國民兵的主耕人，對其兵費互助小組中受優待的常備兵，每年約負擔小麥二石五斗及棉花五斤，作為優待，故每一常備兵每年可得優待之小麥五石棉花十斤（閻錫山：徹底實行兵農合一，革命行動九卷二期）。

閻錫山說：「這個辦法，不但我們中國從來沒有，就是世界各國也沒有，這是與大家想下的」（革命行動八卷九期二頁）。聽他這「想」，竟想到把從前俄國沙皇東轉農民的份地制度拿了過來，閻氏的偉大也就可知了。

當然，閻氏的偉大，也還是有的。他這個「偉大」，是從他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來取得的。

為什麼說他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呢？因為依照閻氏的辦法，不但不能使得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而且更使得農民只好依附於一定的和固定的土地上。不但地主的所有權還保留，而且人們的人身、健康、財產、生活也更進一步地因受了嚴格軍事的政治的控制，而完全失去了自由。且看下列的一堆事實：

第一：拿份地範圍了人，即所謂「以生活管理了他的行為」。除了編組當他的軍隊的準士兵以外，再不准別人耕種土地。「劃分之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用」（對劃份地問題的解答三三三。革命行動九卷十期）。

第二：隸屬於份地的「國民兵」所領的地，是不能超越份地的固定界限的。「一個國民兵不能領兩份地，如份地有剩餘時，可按照規定辦法實行借耕」（答三。革命行動九卷三期）。

第三：所領的份地，不許變大，只許變小。「如份地不足國民兵種時，准兩個國民兵領一份地，不准輕易離村」（一三四答。行動九卷六期）。

第四：婦女因為「無當兵的必要」，就剝奪了她們領地的可能。「男人領地，尚或不足，如婦女領地，勢不可能。且中國今日，尚無提倡女子當兵的必要，若轉給各級幹部遵照」（二七九答。行動九卷十一期）。

第五：縱使是「國民兵」，但因生活所迫而往謀生，就被剝奪了土地。「因生活所迫，離家他往未回者，按規定不准領地」（二六五答。行動九卷十一期。按：這是回答以下的問題：「襄陵縣國民兵，已有因生活所迫，離家到他處謀生者，如何辦？」）

第六：一有改革，就不可能希望把份地當成謀生的後路。「中途改革者，準田」（二四〇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七：不先交「優待棉花」，即不准領份地，「問：自肯赤費發給款了，擬准其領份地，收秋後，再出棉花，可否？答：不可」（行動，九卷八期）。

第八：「承受份地」後，要換「契詞」，等於簽訂農契契約。「契詞」中有一條：「如期如數完納田賦，及徵購食糧」（行動，八卷九期）。

根據上述種種情況看來，閻氏一方面把農民變成他的份地的羈馬，另一方面把農民轉化他的軍隊的隸屬。

閻氏不僅把農民和一定的份地聯繫起來（即把農民束縛於一定的份地單位上），而且又把農民和一定的村界聯繫起來（即把農民束縛於一定的村界位上）。除了上述「不准輕易離村」外，且再看下列的事實：

第一：把份地和人民放在村單位的基礎上，強迫劃分村界，使得份地和村界形成一條連環的鎖鏈，人民居住和謀生的自由更又都在這種鎖鏈上。

「這回劃份地，一定要先確定村界……土地人民均應以村為單位，離開村說土地，說人民，無從說起。所以今天一定要劃分村界」（閻氏在份地會議上講話。行動八卷十一期）。「村界非劃定不可，不劃村界，等於沒有村政，最後可由區派員會同強迫主持，不服從者懲處」（二三〇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二：領有份地的，以在固定的村入籍為限。「劃分村地後，仍應到其村入籍，不願入籍，即是不願種地」（二四四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三：採取屬地主義，不准離村耕種：耕種別村的土地，要由這個村請「依法」轉入別村的村籍。「應採取屬地主義。張家莊人民向種山嶺內土地者，得請求改入山嶺村籍」（答之一。行動，九卷八期）。

第四：不准離鄉耕種，耕種別縣的土地，要由這個縣的縣籍轉入別縣的縣籍，而且是以本縣「地不敷種」為限。「仍按屬地主義辦理：汾陽小園村接近孝義，其耕地多在孝義境內，地不敷種，准向孝義請求入籍編組，領份地」（十四答。行動，九卷三期）。

第五：離村他往，不出本縣，要回村編組領地的，如有保證，可准，已出本縣的，就不准再回來。「移住村不准本縣者，如人保證其確能歸原村耕種，准之，移住村已離縣境者，不准」（答之一。行動，八卷十期。按：這是回答以下的問題：「移住他村他縣人民，願回村編組，應否照准？」）。

上述的一切告訴了我們什麼呢？那一切告訴了我們：閻錫山在那裡建立新式農契制度。閻氏明明白白提出他的農契制度的名稱，叫做「屬地主義」。

。根據他這個地主，農民獨立的人格變成份地的人格了。農民的自由經濟完全被取消了。這是超越古今極端反動的、軍事的、官僚的國家農奴制度。因為他這種農奴制度是以隸屬於軍事和官僚的直接控制為其特徵的。閻氏的確不愧是從前俄國沙皇實行「份地」制度的及門弟子，而且青出於藍了。根據閻氏的計算，他這個份地制度實行了以後，第一，「打仗的人多，可以保社會的安寧」。閻氏所以想「打仗的人多」，不是為着抗日，而是為着「保社會的安寧」。所謂「社會」，就是他這個新農奴制度社會。第二，「種地的人多，可以保社會有飯吃」。閻氏所以想「種地的人多」，並不是為着發展農民生產，而是指他這批新農奴主們可以獲得更多的糧食（以上引文，見行動八卷十一期）。據閻氏看來，如此就可高枕無憂了。你看他這態度得意地說：

「此次我們實行兵農合一，等於把家裡的堆的一堆錢，拿串子一串一串的串起來，不只是好處理，而且好使用，也等於百川匯於海。所以今後政治上的管理也好管理了，並且我想大家也一定可以感到今後在努力上有目標了，「兵農合一」等於「平掌」，「組織」等於「政治」，「軍事」等於「教育」，「經濟」等於「五個指頭」，手牽作了五個指頭的根據，就可掌握運用屈伸自如，我們深信將來一定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一切復興上的工作就有了着落」（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朝陽講話，革命行動，九卷八期）。

閻氏把農民當成錢貨，份地當成串子，拿份地把農民「一串一串的串起來」，就以爲「不只好處理而且好使用」了。這樣，就不怕他們不「拿出錢來人來」，而且「必須拿出錢來人來」（閻氏的話，革命行動八卷九期），也即是必須讓他拿出錢來，拿出命來，否則就取消了他的份地，不給全家生活。中國古代封建制度，還有「罪不及妻孥」的，但在閻氏制度下，那就是懲罰一人，餓死全家了。既不怕人民不拿錢來拿命來，當然他的「組、政、軍、教、經」也就有了辦法，可以把人民玩弄自如了。這就是他的所謂「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而據他自己看來，復興他在山西的私人政權的工作，因此也就「就有了着落」。

閻氏不止對於農民採取「一串一串的串起來」的辦法，對於整個社會人等，他都有這類的做法。比如，他對於「綽號商官」（即他那個原來做生意的一些公務員）就這樣規定：「如原籍係我政權能達到之村莊，而又能實行調劑者，准其按規定發返回原籍，否則不准，並不得到其他省份易謀工

作」（革命行動，九卷三期）。你看！這他編造的部廢，謀生和遷居他領的自由也都被剝奪了。閻氏說：「不經許可的不准私自工作」。工作上不依規定的，即奪其工作之權，發定期乞食證，使他改悔。「拿上他的生活來管理了他，使他不敢犯罪，再拿上工作權來懲處他，使他犯罪以後，必須改悔；不改悔，無生活」（閻氏與高毅幹部談話錄。革命行動十卷一期）。就是說：凡是不服從閻氏的規定的，都要被奪去工作權；不服從閻氏的命令的，都叫做犯罪，犯罪不改悔，就無生活。我們過去只聽說有「機警公民權」的，閻氏竟創造出「機警工作權」了。這是軍事官僚直接控制的工作與生活的連坐法。閻氏正是要把農奴制度實施到全社會上的。這也是不足怪的，閻氏所統治的社會既然是建立在以農村封建份地為基礎的新農奴制度上，那末，這種新農奴制度就會反映到他所統治的各個角落上去了。

「我們聽了我們的話或許是發生氣的，他一定要說他這叫「兵農合一」制度是「實現了勞農合一，取消了剝削制度，執行了收負合一，取消了負擔的不合理和不公道」（見閻氏：徹底實行兵農合一），是實行「按勞分配」呀，是實行「農業社會主義」呀，怎樣會是新農奴制度呢？

是的，閻氏不是對記者們說嗎？他那個土地制度是「不收人的糧」的。不幸，他卻還有「使人負擔」這幾個字。偏偏不幸的，就是這幾個字。按照前節所引的閻錫山自己公開承認的數目（不幸的，這個數目半句又是絕對不可靠的，因為太少太少了。）來說吧：他所規定的田賦得糧，糧派和地租已佔了農民全產量「百分之三十五」，除此以外，還有所謂「特種稅」等。這些當然是「使人負擔」的。可是，照閻氏的特別邏輯看來，這「使人負擔」却是「不收人的糧」的，所以，「不收人的糧」也就是「使人負擔」。同時，閻氏的話又是很有道理的，因為「百分之三十五」的掠奪，照閻氏看來，是輕得太不成體了，假如事實真是這樣，那豈不是要算得是「不收人的糧」了嗎？

必須把實際的掠奪和閻氏口中的掠奪分別清楚，而且那裡的實際掠奪的數目，也還不必我們親自去調查，只從閻氏所說的革命行動刊物上，也可以知道了。且看閻氏自己幹部的報告吧：

「孝義一二兩區，據城東村指導員稱：該村土地每畝最高者小麥一官石二斗，最低者四官斗，平均約爲八官斗，每畝糧銀爲九分四厘，假定每份地六十畝，共計糧銀五兩六錢四分，應納地租、田賦、賦、賦負擔，及調劑糧麥或米一官石，無雨七石三斗，每份地四十一石

一斗七升二合，再加每份地餉料（按：這也是對閻氏政府負擔之一）三石三斗，種子一石九斗五升，共計四十六石四斗二升二合。按平均產量八斗，每份地可收穫四十八石，儘可餘一石五斗七升八合。假定每份地爲八十畝，可種餘三石二斗，假定每份地爲一百畝，可種餘四石八斗三升，如每畝產量以平均一石計算，則每份地八十畝，方可種餘十九石二斗，惟人民多不承認一石之產量爲恰當」（六八問。行動，九卷五期一六頁）。

大家看！這並不是什麼負擔「百分之三十五」。根據這種實際的數目，農民將閻氏私人政權掠奪去的，一般竟達全產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包括餉料在內，竟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優待棉花還不算在裡面。按照閻氏的規定，每份地除了田賦征購、村撥派及地租等負擔，以至種子肥料還一部分生產成本外，還有「餘餘」是百分之五十，作爲「勞動報酬」（換句話說，作爲農民種地的生活費），但根據這個報告：六十畝地的「純餘」儘可佔全產量的百分之三十八畝地的，儘可「純餘」百分之五；一百畝地的，儘可「純餘」百分之六。我們這把閻氏的所謂純餘加上括弧的符號，就是說，實際上那並不是什麼純餘。閻氏既掠奪農民全產量至少百分之八十六以上，就不但掠奪了農民全部剩餘產品，而且還掠奪了農民大部必要生產產品（即掠奪了農民爲維持生活的必要生產產品）。閻氏所留給農民的那點「純餘」，並不是農民必要生活的「純餘」，而只是閻氏掠奪後的殘餘。農民辛苦種地一年，所得的「享受」結果就是生活的完全沒有着落。絕大部分的收穫量都到那裡去了呢？都到閻錫山私人政權的倉庫中去了。但是：閻錫山說：這就是「不收人的糧」的「按勞分配」！這就是「勞動結果歸勞動者享有」！

閻錫山對於上述報告的回答是：他的幹部這種報告並不可靠。可是，在上述同一個地區，同時還有提出同樣的問題的，並且還是載在他的革命行動第一期上面。那報告說：

「孝義一二兩區各村糧銀每畝九分四厘，計每份八十畝，共有糧銀七兩五錢二分，除過負擔外，純餘不到二十官石，按去年實際產量，尚不夠負擔」（六五問）。

閻錫山的回答，又是認爲不可靠，認爲這種報告不過是他們「做了偽裝分子精神俘虜以後的一個表現」。奇怪的，閻錫山的下級幹部的報告，竟然有那麼多的報告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却只有閻錫山自己的腦筋。奇怪的，閻錫山下級幹部報告的不可靠，却是因爲這些報告是從下面反映來的，所以

就和閻錫山上面的計劃不相符合；而閻錫山自己腦筋的可靠，正是因爲他的腦筋是由「古人」來的，所以就和他閻錫山的計劃完全相符合。閻錫山說：「古人九分四厘銀子的地，應該是能打一石八斗的產量，至多三十畝，就是一份地」。現在每份地到了八十畝，竟說是「實際產量尚不夠負擔」，你想：閻錫山怎麼會不買火呢？

還有一個地區的下級幹部，也向閻氏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新縣縣劉莊、永豐莊、中蘇村、南蘇村等村，地質特劣，各村土地，每畝產量均不足小麥三斗，而穀子每畝均在一錢左右，每年收益，除田賦外，再無餘糧……」（二三八問。行動，九卷十期）。

閻錫山照例回答：「按古人定糧，一錢糧銀的地，普通產量在兩石左右，該村等爲什麼原因，成了如此情形」。就其地所說的「古人」是真實的肥，但閻錫山竟聰明絕頂到這樣：連蘇村土地生產力經過了他政權下二十年的掠奪已經極端衰下去，農民又無生產積極性，他卻絲毫不知道。就是這樣，所以他那些「妙絕人寰」的、「其味無窮」的、在權術家的所謂「學說」也就從這裡產生出來了。閻錫山的妙處，就是他有一副古人腦筋，於是自然而然地從這裡流出了許多古怪東西來。

閻錫山似乎也知「土地有好壞」的，所以，他把份地分成了七等二十一級。但他對於「好地種的畝數少，用的人工少，種子少，收的糧多；壞地種的畝數多，用的人工多，種子多，收的糧食少」（雖然對份地實地大調查是真實的）這類事情，却又似乎經常忘記了，特別是在對糧的計劃上和要糧的行動上忘記了。按照他告人：從一等級地的每份地三十畝起推到七等二十一級，增加到一百五十畝的每份地。就便是這樣，由三十畝的份地到一百五十畝的份地，所費費的人工、種子、肥料，其間的差別已經是很大了。但情形還有更進的。看下面的一個報告：

「大寧道教編村反映：所屬十三間，地質人稀，地質較其他地區，每畝年產量，多爲一易（即畝一年再種）二易（即畝二年再種）地，每份地約有三四百畝，種耕工較多，人少了，種不了，況該處水質太壞（俗稱湧流水），人在幼時吃了，不長高，像發胖，漸變成矮子，高有三四尺，耕力甚弱，每份不下三四百畝，如何耕種？」（三〇七問。行動，九卷十二期）

可見份地竟有多至三四百畝的。這種畝數多的壞份地事實上都是分給窮

最窮苦的農民耕種的。閻氏計算這樣的畝數也可以有「五十石至六十石之間」的收穫量，因而他所給的負擔，也可以和那些種三十畝地的份地，同樣豐收。至於補助數很多的份地，需要花更多的人工、種子、肥料等等，是都不放在閻氏的算盤之內的，因為在閻氏看來，這些對他都是沒有關係的，對他無關的，只是份地的同量負擔罷了。同樣地，在各村之間的土地好壞，因而影響到人工等等成本和收穫量，或者有的村種地的人少了，種的地也少了，收穫量也因此更少了，這些對他都是沒有關係的，對他有關的，也只是各村的「均糧」（依照該村舊定的糧額收糧）罷了。因此，這糧額又有了閻錫山式的特別「公道」：「田賦負擔則懸殊甚大」。「份地畝數太多，耕作小組既種不了，負擔又感太重」（一五五間）。「份地多，糧額重，負擔重」（二七二間）。「一樣產量的份地，甲村與乙村負擔不一」（八三三間）（以上見革命行動各期）。因此，這又值得閻氏自誇了：「不要巧妙的說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閻錫山治下的「人」，性情特別不同，他們是「同情」於「糧額重，負擔重」的。

可是，「同情」，閻氏自己也是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巧妙的說法也好，不巧妙的說法也好，實際的事情，總是那麼樣的。閻氏也知道說些什麼每份地除負擔種子肥料等成本外可「純餘」二十石，實在是不能騙人太久，即是不「能得到人的同情」，所以後來在他那對老百姓說話，就不能不逐步減去其虛構的數量。有一回，他說：「總也教他怎麼得到十五石糧食」（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革命行動，八卷九期），少了五石了。又一回，他說：「亦可得純收穫量十石」（三十三年二月。革命行動，九卷二期），少了十石了。再過些日子，說不定還要減下來。這樣，閻錫山自己的古人腦筋，和他下級幹部們的「不可靠」的報告，豈不有接近起來了嗎？但是人們儘可放心，閻錫山決不會和他下級幹部一樣，說什麼「尙不致負擔」的，糧額就是必然的。請不致人死不休，是中國一切腐敗統治者的道德，一有機會，他還是變態其欺騙。這回他不是利用了記者對當地情況的隔膜，就大施其騙技嗎？

中國農民大眾從來受舊統治者橫徵暴斂的掠奪，以致失掉大部農產物，他們只好被迫去利用一些農餘的時間，從事各種副業，以延續其牛馬不如的生命。但是，在閻氏那裡，不僅如上述的無情掠奪農民絕大部分的糧食，而且無情掠奪農民全部農餘的時間，叫做「義務勞役」，「定為每人每日不得超過（好慈悲呀！）四小時，全年至多（好仁慈呀！）以百廿日為限

」（見兵農合一施政綱領）。即是說，除了當當備兵的不算外，農民還要以全年三分之一的時間去當閻氏這個新農政權作「義務的勞役」，連不能領份地的「役齡婦女，每日亦須要服四小時的義務勞動」（行動，十卷九期）。同時，不准農民從事其他的職業，並以取消他的份地為恐嚇，使他不致在開土地。這樣，絕大部分的租稅掠奪，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勞役掠奪，又不准農民從事他業，三者夾攻，真是使農民走頭無路了，這就是他的超越古今的極端反動性，他的統治基礎也就非常「鞏固」了。

閻氏拿了這個「盡甜無辣」和「不收人的糧」的土地政策（即佔有農民產量的百分之八十六以上和每日四小時——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義務勞役），來和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作比較，說共產黨「對勞動者先甜後辣」，「與人土地」又「收人的糧」。寫到這裡，只好簡單地插一筆說「說我們這裡的事情」。

不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有人民交公糧而政府收糧這件事。但我們這裡的人民對共產黨領導的三三制政府的看法，和閻錫山那裡的人民對閻錫山私人政府的看法却大不相同。首先，人民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交納公糧，是交給自己的政府和軍隊為着抗日、救國、救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交納是為老百姓自己的利益，是為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其次，各根據地都實行了減租減息，農民從地主那裡大大減輕了負擔，還在國民黨區域及閻氏區域都不肯實行的。又其次，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收糧是在從優可能減輕人民的負擔出發的。在戰爭條件或環境困難的時候，收糧多些，但只要情況稍好，不需要多的糧，收糧就減少了。政府又盡量發展公家生產，發動軍隊自己生產，發動機關學校自己生產，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又其次，黨政軍警幫助人民發展生產，變工隊和合作社的組織大大提高了生產力，邊區「耕三餘一」的任務，兩年就可完成，人民達到了真正的豐衣足食。支差動員，盡量減少，會也少開，「不進縣時」定為政策之一，在這種條件下，一方面，人民生活逐年改善；另一方面，糧稅負擔逐年減輕。現在邊區全體人民負擔平均不過佔其全收入的百分之十四，而且全人口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民因為他們比較窮苦根本免稅。但閻氏的說法，這就叫做「先甜後辣」，又叫做「給人土地又收人的糧」。照閻氏的想法，以為農民恰恰「同情」他所給的那百分之八十六以上的負擔和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義務勞役，以及那「不許改變的囚籠制度」，反而不同情共產黨所給的這個百分之十四的負擔和豐衣足食的生活。照他看來，農民不會同情自己的解放，却反而「同情」自

己的被壓迫地位，這就充足地顯現了。閻氏獨家出版的政治詞典中所載詞彙，沒有一條與世人相同，這也名之曰「學說」，豈不令人作嘔三日！

隨着看閻氏怎樣在談他那個新農奴制度。他說：

「去年各縣歡迎新戰士入營時，新戰士都是踴躍前往，入營壯丁及其家屬都是十分欣悅，毫無痛苦表現。今年劃分份地時，中隊留營村的人民說：『我們沒有修下好老子，可是我們今天修下個好兒子，給我們自己一份大家產，也就如同自己的好老子；修下好老子，只能養活我們自己，修下好兒子，能養活全村全縣人』。所以兵後合一的制度下，不但沒有逃丁、逃兵，及細細入營等病象，反而能使人人歡迎，人人興奮，做到打仗人多，種地人多，鞏固了國防力量，擴展了勞動生產，實現了勞軍合一，取消了剝削現象，做工人盡其才，地盡其利』（閻錫山：激進實行兵後合一）。

他又對那裡的民衆說：

「你們看看，到那裡當老百姓，能得這個便宜？到那個隊伍裡當戰士，能得這份子優待？」（革命行動，九卷十一期）

啊！何須說佛！不知道山青的老百姓有了幾世的積德，修下了這麼一個好長官！

可是，我翻閱了閻氏那出版的所有東西，除了閻長官怎樣自己稱讚自己外，也沒有再看到對閻長官更加歌功頌德的文章了，這又作如何解釋呢？

可是，像我們這些還沒有看到閻氏的「真理」，或還沒有被閻氏「真理」所「說服」的人們，却要發生點問題來了。

問題一：既然「兵後合一」是像你所說的「人人歡迎，人人興奮」，為什麼「國民兵」竟然「有不願意領份地者」呢？（見革命行動，九卷九期，二一七期）

問題二：為什麼「各村國民兵，有向村公所請求，自己願意設法交納稅特種花，不願意領份地」呢？注意「各村」二字。（見革命行動，七卷五期，六五期）

問題三：為什麼「國民兵已因生活所迫搬家到地產謀生者」呢？（行動，九卷十一期，二六五期）

問題四：為什麼很多地方「發生的現象，人民秘密合謀劃分份地，表面上農村政府，將各份地自劃自己的地，明分暗不分」，需要你去「打擊」呢？（見行動，九卷十二期，二一二期及其附屬文件）

問題五：為什麼「耕作小組之編成，因助耕人之勞動能力大小不一，耕作技術優劣不一，並與主耕人立場不同，領受份地後，增加強政治管理，合夥耕種，亦不如樂於自動耕種收穫大」呢？（行動，九卷五期，六六期）

問題六：為什麼「國民兵，因劃分份地，令國民兵領租，該兵恐種不了逃租」呢？（行動，九卷十二期，三〇七期）

問題七：既然你說：「當國民兵自有地種，且是很大的一份家產」，為什麼「國民兵領份地，有頂替情事」，不要你這份大家產呢？（行動，九卷十二期，三二一問）

問題八：既然你說：「過去在修齡之內的，總是說自己不及齡或逾齡，想逃兵役的義務，今日是十七歲以下的想充一八歲以上的，四十八歲以上的，也想充四十七歲以下的，爲的是充當備兵可以受大的優待，當國民兵可以領一大份家產」（行動，八卷十一期二頁），為什麼你又會「感到滿臉的太多」，希望「謀有效辦法發覺之」呢？（行動，九卷十二期，三〇六答）爲什麼在一個鄉村就發現出離職年齡的，有那麼多呢？（行動，八卷九期三五頁）

問題九：既然你說：「這次實行兵後合一的結果，當備兵入營，歡欣鼓舞，盛況空前，他的好處，真有意想不到的」（行動，八卷十一期六頁），為什麼在軍隊送時，竟會「有許多人哭叫着」呢？（行動，九卷四期）

問題十：為什麼你說：「今天我們優待種花的戰士，可以比兩個牛上蹄不抵他一個」，而你就會聽說到有一「個編村，有五個編了，以後還添了」呢？（行動，九卷十一期十一頁）你說「這太糊塗」，為什麼糊塗的竟那麼多，有的「新入營潛逃的常備兵」竟然就這麼說：「把我補到那裡，我也要潛逃」呢？（行動，九卷四期）

問題十一：既然你說當了官校軍是那麼幸福，為什麼你那「多數幹部反映，部隊派飯吃錢，情緒異常不好」，「部隊已到瓦解的危險境界」呢？注意：這是「多數幹部反映」，這又是「已到瓦解的危險境界」啊！（行動，九卷七期封面）

問題還可提出很多，但不在這裏再作篇幅了。要知道，這些問題都認其是根據閻氏的官報提出來的，如果到閻氏統治下的民間去調查一番，那就更可以提得出千萬個問題來。根據上述閻氏的制，我們可以斷定：這種各種現象，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行政上個別錯誤所引起的，而是閻氏所建立的制度的必然結果。在那種制度下，這種現象必然逐步發展出來，

而且會日益大表現出來。

總之，實際的情況和閻氏的「巧妙說法」不一樣。那裡並沒有什麼「按勞分配」，而僅僅是「按勞掠奪」或「按人掠奪」。老百姓不同意這種「按勞掠奪」的，就被看成「叛逆」；閻氏幹部對於這種「按勞掠奪」提出疑問的，就被閻氏看成「做了偽裝分子的精神俘虜」。那裡「對勞動者既公道又通情，所以人人樂意勞動」（行動，九卷六期封面），但却是只准許在閻錫山一個人面前公道，為閻錫山一個人通情，只准許「人人樂意」閻錫山的農奴式勞動。

閻錫山說：「劃分份地是實行按勞分配」（行動，九卷八期六頁）。是的，這種份地制度，的確是把閻氏所謂「按勞分配」的真相切實實地說明了。自從「九一八」前夜，閻氏躲在日本帝國主義租借地的大連，發明了一種什麼叫做「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的「學說」，隨後又在「一九三五年河北事件之後把它公開以來，若干人士，對於這種以「華章為利」、「投機取巧」著名的老學問，山西的大財主忽然以「發明學說」叫囂於世，不無覺得一些驚奇，雖然隨後又覺得可笑。這位以黨軍閥和官僚起家的大財主，對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學說，雖則毫無所知，連書都沒有看過，但不知道在那一天他忽然聽人家說過：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者認為共產主義包含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即是按勞動分配）；第二階段才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第一階段叫做社會主義，如衆所週知，是在蘇聯早已實現了，並是在蘇聯斯大林憲法上寫上了「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幾個大字的。閻錫山知道了這麼一件事之後，想了一會，竟心血來潮，動機一動，啊！有了，雖然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者主張先實行「按勞分配」，後實行「按需分配」，但我可以偷竊他的「按勞分配」名稱，算是我自己的發明，又裁割他的「按需分配」，叫人駭怕，這樣，我反共就有本錢，馬克思主義就此可打倒了。於是他白晝見鬼，著書立說了：「按需分配，是共產主義把勞動者的勞動結果，全拿上走了」（行動，九卷六期封面）。「這是勞動人心中人人不樂為的，必須強制，強制的最後方法是殺人，這收勞動者勞動結果，是繼續不斷天天要做的，就是欲貫徹共產主義的主張，須繼續不斷天天的殺人」（閻氏言論選集，二輯二三頁）。「這遺於人類的禍害，可說太大了」（閻氏言論選集，八冊五四頁）。而牠呢？「按勞分配」，從此就算是他的「發明」。又從此他就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批評者」自居了。世界上當面撒謊，頭銜無恥的事，竟也有這樣的。我們

生當這個無線電發達的世界，每天聽到各種外國新聞，感覺快樂。但是外國人究竟沒有中國人幸福，如像閻先生這種「天天殺人」的土新聞，外國人怎麼聽得到呢？

但是也毫不奇怪。按照閻先生的哲學：「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這叫做鬥爭」。他「批評」共產主義，是屬於「別人如何壞」一方面，下面還有另一方面。

他說他這個制度，既「合乎公道」，又「合乎人情」，又「適於生產」，是「無一人行不通，故可以永久不變」。他說：

「井田之制，行之三代，大同之說，倡於孔子；後世學者亦多欲更井田憲章之制度，惜有志而無是力，不能見諸事實。僕懷有志者，得改造之大權，則「按勞分配」之制度，早實現於中國矣」（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六二頁）

「吾國今日之該改革經濟制度與講學教育，多效法西歐，此實我民族失却自信力之表徵。……返觀井田憲章之制度，既公道而能永久，大同理想之學說，復蘊含乎古今，倘吾人本其意義及其遺教，發揮光大，規定制度，使適合今日之實際，則所謂經濟問題，自不難迎刃而解，此非特可以救中國，且可救世界也」（同書七五頁）。

閻氏的「按勞分配」，是以軍事方法恢復中國古代「井田」為目的。就這點上說來，他的主義，是一種軍事封建的社會主義。他的所謂「農工社會主義」，就是這麼一種軍事封建的社會主義。他想：他既「有志志」，又「得大權」，實現就該沒有問題了。果然，近年他和日寇實行和平共居之後，竟實現了這個「兵農合一」的「現代井田」，他說：

「我們中國古代就有井田制度，這制度實為歷史上之至寶。歷代的多少聖賢豪傑力謀恢復這個井田制度，都是經過多少次的考慮，始終都不敢拿出來實行，孟子也曾極力提倡恢復井田制度，但後來也沒有實現了。現在共產主義者，恐怕出現了比他好的主義，故有的說「中國古代並沒有井田制度，那是孟子誇誇的話」。大家應知井田不是個單純不剩餘的土地制度問題，實際是個兵農合一，勞享合一，收養合一多方面的公運完善制度。……今天的兵農合一，就是現代的井田」（閻錫山在份地會議上的重要訓話）。

說來好笑：閻錫山竟以為我們怕井田主義比現在共產主義更好，所以故意否認中國在古代有個井田制度，據我所知：懷疑孟子關於井田制度的描

「賈餘」，竟是一盡自由主義的罪者。至於「現在共產主義者」，倒是老早就發覺了，承認了原始農村公社的存在，並且在封建社會中，仍有它的遺留（在封建社會中，農村公社的遺留，對於地主的束縛農民在土地上是有益的），而中國歷來所傳說下來的井田制度，則不過是這種原始農村公社的反映（則有些主觀渲染）。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農村公社日益瓦解，一去而不可復返。這是閻氏所謂「歷代的進步與衰頹」和孟子等主觀上想恢復而事實上不可能的真實原因。可憐的，據閻氏說：這種井田制度「既公道而能永久」、「合乎公道」、「合乎人情」、「適於生產」，為什麼後來又不能存在呢？為什麼後來「墾墾墾」要恢復而不能恢復呢？閻氏本來是「不可知」論者，他的哲學是「不止」是什麼「最後有個不可知」，「為什麼」最後也有個不可知（物產與勞務分配，四八頁），他在這裡也只好用「最後不可知」來答覆了。但閻氏既然以為「最後不可知」，為什麼又能知道他的井田制度和他的「按勞分配」是「可以永久不變」的制度呢？

我們共產黨人是人民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的。如果真如閻錫山所說，有什麼別的主義比我們主義「更好」，那末，我們為什麼要排斥他呢？事實絕對不在這。事實證明：現代共產主義是最好科學，最能造福於人類的科學，並沒有什麼主義比它「更好」。閻氏是反歷史主義者，只看到過去，迷戀已死了的骸骨。而我們共產黨人是歷史主義者，不但知道過去，而且為人類現在與將來奮鬥，更為人類的幸福奮鬥。中國歷史發展到現在，社會發展到現在，古代井田是不可能再來了，就是閻錫山式的「現代井田」也必然很快要死亡的。現在的中國正需要大大發展生產力，把中國歷史向前推，而現在階段發展經濟的道路，正如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所實行的毛澤東政策，必須是經過農民的解放，經過經濟上、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也即是要建立以解放農民為基礎的、以發展大眾經濟和發展大眾福利為目標的新式自由經濟、新式自由勞動和新式自由市場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這也即是把農民擴大，把生產擴大。而閻錫山的「現代井田」，却是以東鄉農民為基礎的、以破壞大眾經濟和發展大眾福利為目標的、反自由勞動和反自由市場的新農奴主義——新農村主義的經濟制度，這也即是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這是幾千年前的古董、死屍，一點生命力也沒有的。它是阻止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歷史注定了它要很快地死亡。

閻氏利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這一點，在那裡儼然有介事地咒罵

着資本主義。但他從恢復過去封建農奴制度的「光榮」，去咒罵資本主義的。其次，他又是不對地地咒罵資本主義，因為現在中國經濟的主要危機不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却是生產不足的危機；而這種生產不足危機，正是由於民族壓迫、封建壓迫和官僚資本統制的壓迫而來的。現在中國人民所遇到的民族壓迫、封建壓迫和官僚資本統制的壓迫的痛苦，却遠大於所遇到的資本主義壓迫的痛苦。現在中國類似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對於德國所說過的：

「……德國是像歐歐大陸各國一樣，不僅受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痛苦，而且受資本主義生產不發展的痛苦。除了近代生活所特有的種種痛苦，還有許多舊傳的痛苦，壓迫着我們。這種種舊傳的痛苦，是古代生產方法依然殘存的結果，而這種古代生產方法的殘存，自然會引起種種時代錯誤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我們不僅吃生產者的虧，且吃死者之虧。死者叫生產者煩惱」（資本論，一卷初版序）。

文類似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對於俄國所說過的：

「在俄羅斯這樣的國家裡面，工人階級感受資本主義的痛苦，還遠不如它所感受資本主義發展不夠的痛苦。因此，工人階級絕對需要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消滅國內一切障礙資本主義普遍、自由和迅速發展的舊制度的殘餘，對於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兩個策略）

我們是科學共產主義者，正因此，我們承認資本主義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承認自由商品經濟之一定的歷史進步性，這種經濟，比起封建農奴經濟，發展起龐大的社會生產力，生長起最新型的社會勢力，作為推動歷史積極進步前進，走向沒有階級的社會的偉大動力。但閻氏和其一類，如中國之命運一書所代表的人們，則完全相反；他們完全否認了這種自由經濟的進步性，而只歌頌過去的封建時代的政治經濟。他們否認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如閻氏之流，則主張封建的份地經濟，領村經濟。即閻氏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是主張「互通有無，使供給各得其利」的「交換經濟」，而反對「封鎖經濟」（見閻氏中日經濟提議問題，言論輯要九冊），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自由市場（也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壟斷市場），但閻氏對於人民則主張相反的東西。現在在他統治的地區，竟要人為地取消自由商業。他的井田主義正是「小國寡民」「死後無出葬」的農村主義，而用軍事力量來約束它。他的「社會主義」就是領村的軍事封建社會

主義。這種軍政封建設會主義，不過是上述這等官僚的國家奴才制度的別名罷了。這完全是反動的東西。不錯，閻錫山也主張對工農，但一方面他仍主張對地主的經濟單位，另一方面他又主張以今日在野的常備兵或輪到的常備兵去擔任工廠的勞動，換句話說，他主張的工廠不是建立在自由勞動之上，而是建立在不自由勞動之上的。這種不自由勞動又是東亞殖產力的發展。這道理稍為說一下閻錫山的物產證券。因為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他這價值論提出過批評，並批評得很好，特別是關於貨幣發展史方面，所以我在這裡不準備多說。只說一點事實罷了。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國民黨政府公佈法幣制度，停止兌換現洋以後，閻錫山即在山西成立「物產準備庫」，打算「以省鈔向人民購買長餘的物產。……增發省鈔，發出省鈔一元，即收回一元的貨物」（二十五

年二月，閻氏關於物產證券成立的勸諭和辦法）。「人民拿值一元的貨物對準備庫可以換得一元省鈔，庫中收了若干貨才發出若干鈔票去，有一元的省鈔發出，庫中就有一元的貨做準備，所以可稱為準備十足」（閻氏為設立物產準備庫事告山西商民書）。這是物產庫的「買進」。這出呢？「又規定貨物價格，只准（一）至多按成本加百分之三十五的手續費」。「準備庫往出實貨，只准（一）按原來買入時成本加百分之三十五的運費等手續費；如此人民仍可照原價格加高一點向準備庫購買……」閻氏說得周到：人民可用實物去向他換省鈔，但不可用同量的省鈔去向他換回同量的貨物。當然，這種所說要增加的數目字，還是說得復。

事實上，這些貨物從人民的手裡拿到政府物產庫中去，豈能不再從政府物產庫中轉到人民的手裡。據閻氏說：「就政府方面說，實行這個物產準備庫的辦法，不但無利可圖，而且還得賠錢，因為準備庫為換回貨幣，活動金難免見，不能不將本有貨物運到外省去賣，更想這錢做，有時就非賠錢去出售不可。……故實物準備庫成立以後，政府在財政上須增加一筆支出，這是政府的苦痛」（以上所引，均見前兩文件，閻氏言論輯要九冊）。你看！好惹起好苦痛的閻氏政府呵！實際上沒收了人民的物產，而給了他一條沒收的收條（閻氏自己這麼說：「物產證券是收貨證券，等於百貨的價值收條，有多少貨可以開多少收條」（實物輯要，八冊八十一頁），把這道沒收來的物產往外省拍賣，換回貨幣，大發其財時，却又算是賠錢了。賠給了誰呢？那只有天知道了。這就是閻氏「物產證券」的實際秘密。但是：大概山西人

民那時還沒有感謝他這個「政府的苦痛」，而竟加以抵制，所以就不見下文了。

按照閻氏所說：「農工商生活這樣不安全的原由，是大洋貨幣制度造成的」（言論輯要，八十一頁）。而閻氏的「物產證券」，按閻氏本來所規定：是給政府「賦予法貨資格」，「其尺度單位仍沿用已往貨幣七錢二分之銀圓單位，其名仍稱為元、角、分、釐」（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十一頁）。那末，自從實行法幣制度，停止大洋兌換以來，可以說：你的主張業已實現了。但為什麼在你及你的同類者所統治的區域，農工商生活的不安不但沒有消滅，而且還有減少，而且還在繼續大大增高，那末你的「偉大學說」的「偉大」却到那裡去了呢？

閻氏關於「物產證券」的根本思想，是給利用小生產者對於市場的隔絕，以便於便宜佔取和壟斷他們的生產品而出發的。就是說：閻氏的「物產證券」不過是向人民強制徵收的一種形式。自從實行了「兵農合一」，已經那樣按奪了直接生產者的大部生產品，又迫令他們每年繳三分之一的「義務勞役」，那末，似乎可以再榨奪的東西已不多了。因此，閻氏說：「兵農合一的實行，可以說超過了物產證券的效用」。……物產證券如禹之治水，能治其所無害，兵農合一根本將水壅堵塞了，當然用不着治水了」（行動，九卷八期三頁）。他還想說，經過「兵農合一」，已把人民的物產直接徵收得那麼徹底，似乎已用不着那種作為徵收人民物產的工具的「物產證券」了。但是，事實上，他那種還有一種所謂「合作券」。這種合作券，在閻氏官家拿來對人民時，拿來向農民購買「餘糧」，向手工業者購買生產品，向農家婦女購買手工業品時，是「實物證券」。但人民對閻氏官家時，却不准當實物了。比如：人民要用合作券交換特種花去領用份地，是不被允許的。交納更不必說。（按：有人問：「可否以合作券交換特種花？受優待人可否以合作券向民團購買糧？」）「應出優待特種花，是否仍交合作券？」閻氏答：「可以產品換糧，折應交糧在現品」。「優待特種花須交特種花」，「行動」十卷八期，對於可否以合作券向民團購買——即閻氏官家對農民糧食的問題「民食調節處」——實糧，閻氏就不予回答了。只要人民那裡還有可被榨

的東西，閻氏是不會放鬆一手的。

閻氏所從事榨取的人民的血汗，是不能終久堵住的，一旦人民的大水壩決出來，那你看閻錫山要怎樣呢？

總的看來，閻氏的「經濟思想」，本來是山西落後農業經濟和小生產經

濟在代表大地主大壟斷商人這個統治集團中的反映，他的出發點就是在於鞏固這個代表大地主大壟斷商人的軍事官僚統治集團的利益。他的「兵農合一」乃是利用抗日戰爭的條件，在最後後的經濟地區，那種自然經濟和家長制經濟原來盛行，加上地多人少，而進行的。以閻氏為大家長的這個山西老軍事官僚統治集團，在抗戰的烽火中，企圖維持自己從黨編得來的統治權，一方面，「親日亦未嘗無益」，另一方面，必須向人民要糧要命，所以就出現了這個「兵農合一」的計劃。這個計劃，把大地主大壟斷商人的某些利益轉移到了軍事官僚統治集團手中（如地租的某一部分由地主之手轉移到閻氏這軍事官僚統治集團之手；大壟斷壟斷由某些個人之手轉移到這集團之手），正是真的便利對於人民的統治，便利壟斷直接生產者，並便利犧牲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阻擊他們來服從這個統治集團。同時，這又是由於大地主大壟斷商人自身及其家屬屬員，大部分都加入了這個軍事官僚的統治集團，成為這個統治集團各級大大小小的分子，充實其中各級軍事官僚機構的大大小小的首長或人員，所以，某些利益轉移到這個統治集團手中，就等於又轉移到了自己的手裡，而這種轉移，可以使他們對人民統治權更加集中，正如閻錫山自己所說，對於他們是有很大的好處的。但是，經過閻氏這種苦心經營，施行未久，連閻氏自己也有「好事多磨」（行動，六卷十一期）之感了。這種違反歷史、違反人心的措施，雖則閻氏自以為「能在廣大農村的經濟基礎上，築下堅固的基石，這個力量是永久不能消滅的，也是永久不可戰勝的」（行動，九卷二期），但歷史的變遷必將很快使閻氏這種幻想化為落花流水，那是完全可以預卜的了。

最好是由閻氏自己先來做些結論吧：

本年三月間，閻氏對他的下屬幹部說：「我近來最感不快者，即兵農合一之下，入營的新戰士決的不少」。

本年七月間，閻氏又自己廣播說：「因各縣辦理兵農合一不力，損失我戰鬥員兩萬人」。

換句話說：閻氏實行「兵農合一」之後，不是如閻氏所說的「打仗的人多」，而是打仗的人少了。不是如閻氏所說的「種地的人多」，而是種地的人少了。份地和領村如東博農民，但是，農民却是要努力走脫這個束縛。

閻氏不了解這種道理，他說：「兵農合一之下，不應該再有逃兵，如果有，是等於太陽從西方上來，因為潛逃了的，除已享受的優待糧食必須退還外，還得調劑優待人，並且限不上份地，被補種後，服役年限！不但自己

無辦法，且連累的全家無活路，真太危險了！」可是：太陽終究是從東方出來，而不是從西方上來。你越要用各種方法束縛「兵農」，而「兵農」却逃得越多越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個老子哲學，倒被閻錫山真忘記了。在閻氏的「兵農合一」之下，如果兵農不逃亡，那就不合理了，那真等於太陽從西方上來了。如果大難逃亡，那就合理了，那恰是等於太陽從東方上來了。

至於閻氏「取消商業」的結果又如何呢？閻氏是說他已「廢除了公私商業」，事實上他是想廢除私人商業；官商却還要存在，並且更加集中在他做「局長」的山西省經濟管理局和各地官辦「合作社」之下罷了。但是：私人商業是否因為閻氏的廢除而不存在呢？且看閻氏自己說的吧：

「我們某種物價比黑市還貴，這讓，你如何能保證無黑市」（經濟動力，第二二期）又：該刊載有第二期經濟計劃合作部門對黑市問題討論總結說：「定價不合理」、「黑市比我們價低」。

這是說的什麼呢？這是說明了：閻氏官家商業（說為「合作社」）的官定價格，是如何的高，私人商業所定的價格却要低得多了。這又說明了：不管閻氏的官家是如何地在那些「實行檢舉、突擊、保證做到無黑市」，「展開反黑市運動」，以求保證其獨佔的價格，但人民則仍在「地下」冒險進行自由的貿易。那和人民反對閻氏官定高價的壟斷價格，進行自由貿易的黑市，要算是進步的「黑市」。

閻氏說：「我們的新經濟制度是管理經濟」（行動，十卷八期）。也即是新農奴經濟的別名。但是山西人民究竟沒有被「管理」住，也「管理」不了。他這個「管理經濟」的必然破產，還有疑問的嗎？

閻氏自稱他這個經濟計劃是創造「公道嚴嚴的新社會」，這兩個字「森嚴」，使得我想起閻錫山主宰陰間地獄的「森嚴殿」來：閻氏不過是在把那殘酷兇暴的陰間地獄轉化為人間地獄而已。但是覺醒中的山西人民必定會打破他這個活閻王的森嚴殿及其人間地獄，還有疑問的嗎？

三 閻錫山的「政治計劃」

在第一個部分，我們曾經提到了閻錫山的政治企圖；在第二個部分，又用較長的篇幅論述了閻氏的經濟計劃及其實際措施，那末，他在政治上走的什麼道路，弄的什麼計劃，已經可以呼之欲出了。

談折扣

荷 賓

有人形容兩個澳洲人打架：各自誇起獅子，磨拳擦掌，氣勢洶洶，說：「你來，老子揍你！」

好像真的要打起來，但旋即說：「好，明天在X X地方見，有種的來！」

於是兩位英雄，拂袖而去，都很光彩，相安無事，這往往使得好心的旁觀者捏一把汗，怕真的打起來。這叫做雷聲大，雨點小，實際上，連雨都沒有，是一種折扣：無中生有，以壯聲勢。因此，就有人推論以為這是中法民族愛好和平的一例。

其實是不然的，中國也有這樣的人：分明是存心不良，早有準備，拳脚交加，打了你一頓，他衣面上却說：「咱們有事慢慢談，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轉過來，大家談談……」如果有人問他：「你剛才爲什麼打人呀？」他馬上便放紅脖子粗地分辯：「沒有這回事，沒有這回事！」倘若掩飾不住，便改口道：「是他先打我，我才打他的呀！還是小事，沒有什麼。」這是流氓手段的兩面政策，暗中踢你幾腳，明裏又發給你交朋友。這是另一種折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南京三鎮商界一帶，是有種黑市，是在夜間交易，黑市上賣的東西，大半是「來路不明」，而以小偷的贓物居多，有時也可以買到一些好東西，但對價錢得注意，賣者總是「漫天討價」，你得「就地還錢」，這裏有很多的折扣。有經驗者編成了這樣的一個口訣：

「對半減價款，八折九五扣。」
比如對價是十元，「對半」是五元，「一摺」是一元五角，「八折」是二元，「九五扣」，就只有一元九角了。所以討價十元的貨色，一塊九毛錢就可買下了。
但是，你不必吃驚，中國國情不同，如果不了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二月，閻氏向晉綏軍官訓練團演說，最近在各國發表演說，向世界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我

因此感到飛機式進步的國家進步之驚人。

……最近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想說說就是說，英國的張伯倫法國的達拉第以及美國的羅斯福的奔走和呼籲，可以說都是爲了應付他們。這是什麼原因？此因爲他們有現代化國家的組織，有力量，進步快，成了現代化的國家（走上飛機式進步的路子，言論集二輯）。

你看！他是這般稱讚了希特勒、墨索里尼這兩個法西斯妖魔。他認爲希特勒「向全世界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這種瘋狂的侵略要求，是「驚人」的「飛機式進步」。他認爲這兩個個人類創子手「說甚麼就是甚麼」。照他看來：法西斯的國家組織並不是墨索里尼這橫暴的組織，而倒是「現代化」的組織了。法西斯並不是把他們的民族國家野蠻地拉向後退，而倒是「進步的快」了。在他「手諭」作爲訓練軍官村幹部教材的現代國家的國民中，到處稱讚了德意日法西三國國家，那裡說：「希特勒這次作戰，在德國國民的精神大都是拿上雪恥報復去鼓吹民氣」。德國的士兵及國民黨軍人，就沒有希特勒能打仗的，無論在如何的困難中，他總說希特勒有辦法，完全聽希特勒的指揮」。天津日報界有個「天津報社」，這種邊立的一個大石碑，上邊刻的金字「日清戰役紀念碑」（甲午之戰），專奉鐵錘的，這石碑有一池沙土，係給兒童玩沙設的一種遊戲，意思是讓日本小孩常時紀念留印，每早初經過此門前的人，都要向碑的方向，脫帽鞠躬致敬……：諸如此類等等。對於（或者毫無仇視的觀念，而且自食其言）鼓吹法西斯侵略的東西去做教材，說這些東西就是「現代的國民」的模範，企圖在國民的統治下培養法西斯的奴才。對於日寇在我國領土內建立鐵蹄我國的紀念碑，不但不以爲恥，而且在那裡那裏洋洋樂道，這就真不知是何心肝了。

意大利法西斯強盜的統治業已在去年垮台，這對於閻錫山是不會不知道的。可是，縱使在法西斯崩台以後，他還是不放棄對它的歌頌。比如，今年二月十九日，他的朝會演說，又讚美無窮地歌頌起來：「烏衣黨（按即黑衫黨）的叛亂能人人保證意大利無盜案發生，且他記起下辛苦的戰在大軍本領中，破獲偷竊人的東西」（行動，九卷六期）。閻氏是拿這些話去歌頌他所謂的「革命團體」的「同志」的。法西斯本是世界最大的強盜，但在閻氏看來，法西斯黨是強盜的對頭了。在全世界民主勢力如日方中，法西斯末日已臨的時候，閻氏不拿民主國度的精神去鼓勵他的「同志」，而却拿法西斯去鼓勵他們，不正是證明閻氏始終一心一意地追求他的法西斯制度嗎？

閻氏的「政治計劃」，完全是以法西斯爲模範的政治計劃。他在那裡「提綱」的那一套，完全是抄襲法西斯的。閻氏那「民族革命」之名，而由他自命爲「會長」的所謂「民族革命同盟會」，完全是侮辱民族革命、反民族革命的一種特殊法西斯組織。在那裡，閻氏是具絕對性「同志」的「獨裁者」，那裡所採取的儀式，也完全是法西斯的儀式，例如：在閻氏統治地區，就有一「集會及談話中間會長時致敬之規定」：

得這種折扣的學問，是僅憑了解中國一切事件的具體的。比如說，會談和要，白紙黑字，分明寫得一清二楚，要和平民主開統二，然而這只限於紙上的和平。會議這要談話未結，會議內容在寫在耳，第二天就發了一期「手令」，九年前收起來的「剿匪」手冊，又大為翻印，大小官兵，人手一冊。據說：這不叫內戰，叫內亂。

其實這已是進步了，從前不是叫做「剿匪」嗎？現在雖然也叫，不過不敢明目張胆，只是偷偷摸摸叫喚罷了而已。人民在歷史上有求，不是叫做「匪民」，就是叫做「亂民」，由來已久，不足為奇，既要有亂，當然要平，於是乎二百萬大軍向解放區出發了。這就有了所謂「根據地」。

同時，一些整齊的謀士食客之流，磨擦擦，搗起戰鼓來了。最近出陣的是國民黨改組的參議員孔庚，胡適之，陳西的三等男爵孔庚是也，此人善變，然而不亂。從前可以在袁世凱面前俯首稱臣，幫助袁世凱消滅人民的力量，雖然并未成功，然而他卻健忘，歷史的教訓并不記得，現在又大聲急呼的號召了。

「這是我政府明令討伐，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一舉而殲之。」

二號元老，袁世凱之聲，以討主上歡心，何足怪哉！不滿意變的孔庚之流，即連遁入空門的太虛法師，近日也出一股殺氣，不信，有時為證：

十年標榜妖術。

一旦和平到來。

更有和平時確在。

太虛法師也遁入空門，但又變紅臉。他就在空門紅臉之間，左右逢迎了。他這幾年，阿彌陀佛！至於十一月十一日的上海國民政府的民報日報社論「老百姓要改變眼光」，更公認主張：

「吾人平日號稱為老百姓者，從此應深懷戒懼」

「各種儀式之會議與茶集會及觀音會，開第一次會議會長時，一律立正致敬，並發言，自行稍息，或坐下；若再開辯論時，可以鞠躬致敬，不必立正。」

這些都是法西斯的鬼把戲。不能如此，中國皇帝那一套把戲，閻錫山也用了。例如，國民的官職或命令，都一律稱「諭」，他的部下見他時就叫做「親見」……等。你看！這真是一個偏安小朝廷的小皇帝了！（可憐！只有那點小地方的芝麻土皇帝！）

這個小獨裁者，為着叫他的部下（等於臣子的身份）能夠完全的受他控制，不敢「叛其上級」，制定了其苛苦自裁的辦法，如果沒有照狀上所規定的，就發令實行這種中世紀式與法西斯式的對野蠻的自裁，並且已有些人就這做了閻錫山的羔羊。他並叫他的部下給他上書，說如果有人對他的「領袖」的話，就當處他打死，不然，就須自裁。這真是專橫極了。他設置了特務網，不但處處監視人民，而且對他的幹部也是一般監視。照他自己對幹部說：「……說到今天，我的組織的同志，人是受監視的，人人是受監視的。……你在工作的一切言行，組織上總會漸漸的知道，最遲你一點也瞞不了。大家要切實注意，不要作了監獄之門內殺場之路上的犧牲者，大家千萬再不敢輕舉妄動了」（行動九卷十期）。另一方面，又由他的特務實行所謂「突擊人」，要使他統治下地區的一切人，個個納在他的控制之下。閻錫山對幹部說「突擊人」的人這樣說：「突擊人是為你堵監獄之門，斷殺場之路。……這正如你將有失足墮崖的危險，有人預先來拉你，真是你的救命恩人……」（行動十卷一期）。由此可見，閻錫山在他的統治地區，已到設法了「監獄之門，殺場之路」，順之者生，逆之者死了。

在人民中，閻錫山要造成一種對他這特務法西斯組織的神秘觀念。他「對國民兵常備兵防團團出發人員」訓話：「你們這支部隊，……第一要發揚國民兵防團中，統要知這組織，不待三十六歲以上，發他，和給他的組織中發送組織的各種，組織的意義；組織的力量，組織的效用，一定要使他們切實印組織，認識了組織，信仰了組織。」……使組織中以為組織是神聖的，使你們走了，他們也不知道你們是作什麼的，只是印發組織派來問他們的」（行動九卷十期）。為什麼閻錫山要使人民對他這個組織形成一種神秘的觀念呢？因為法西斯是常把它的權威和神祕結合起來的，把它的權威變成神祕的權威，把它的權威變成神祕的權威，這是法西斯統治人民的法寶之一，是它赤裸的刀槍劍戟的一種補充。

閻錫山把他的所謂「不容人」的法西斯精神，當成他這個組織的主要組織。所謂「不容人」的實際，就是：不容你不這樣，不容你不那樣。換句話說，就是：強迫你要這樣，強迫你要那樣。如果你不這樣，不那樣呢？也即是：如果你不絕對服從——自從那末有「監獄之門，殺場之路」在等著你，讓你「做羔羊」。據閻錫山說：「不容人」就是「保險不做羔羊」（參考行動十卷四期）。所以，要實行「不容人」的方法，就是「請君入彀」的方法。就是「不容人」的方法，就是「請君入彀」的方法。或者是順從的奴隸，或者是犧牲的羔羊。閻錫山的政治計劃的精華，全在這上面了。

，改變眼光，協助政府，努力制亂。此時而願帝室政
治解決者，非如白日做梦，亦等於夢中喃喃耳。」
這已是從個人的呼喊助陣，發展為對員與論，
內敵持槍者在製造內戰的理論了。不祥的預兆，開
始籠罩全國了。

但政府表面上是不承認有內戰的，不是說地方
軍事衝突，就是說內亂。并且還一再說漂亮話，要
和平解決，政治解決！

這是第二種折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這種折扣，如果不指出來，是很難明白真象的。
但有一種折扣，一看就知的，像商店里面，分
明掛着「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門口却又掛了一
個招牌，上面「大減價」三字，這是自打折扣，當
然老奸巨滑立名目，有所借口，如「夏季大拍賣」
，「商店大減價」之類，不過，他這價商店，是永
遠不變「真不二價」，永遠「真不二價」，是永
，又永遠「大減價」，於是乎生意興隆！

中國式的一打折扣的國家。
然而，折扣的學問又豈止中國獨有，慢慢流傳
開去，也到了外國，而且學得頗為精通。十一月八
日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第二天就是：「不
直接干涉中國內政」，十日聲明却是「并無衝突事
件發生」，十一日是：「僅三人受傷，并無若何
意外。」到十二日則聲明：「美軍將保護美國的生
命財產，倘或遭過激攻擊，將必予以有力而制勝的抵
抗。」一華北非無美國的生命財產須要保護，這點美
軍與外交委員羅斯福早說過了，何勞美
軍與外交委員去華北？

這就叫做自打折扣，露出自己的嘴臉來了。然而
這聲明是這打折扣的政策的，也違背中美人民
的願望的。
折扣的學問，於中外歐美，皆有淵源，可謂
一貫而大觀一了。
但是中國人民是不講折扣的，事實的發展也沒
有折扣的，況又何必自焚其身。這是一十年一變內
戰，這是一變如何？這不是和平。當時人民的力量
弱小，都不能「一舉而殲之」，何況現在呢！今
天中國人民要求的是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發動內戰
的人，是人民的公敵，是千古的罪人。果真進行下
去，一定會被滅絕的，這是一點沒有折扣的。
十一月十六日。

因此閻錫山斥責了他一些幹部「作了人民的精神俘虜」。他說：「我們的村幹部作了人民的精神
俘虜。人民說這就是甚。一個為政的人，如果就作了人民精神的俘虜，就不能為政，也就是一天盡成了
書獃，作什麼事也要無興趣」（行動九卷九期）。閻錫山的「不替人」，正是更人民作他的精神俘虜
的。應該問說說就是否，而不應該人民說說就是否。但是，從閻錫山的斥責中，可見他不管如何賣力
，他的法西斯組織究竟控制不了人民，甚至他統治下的村幹部也免不了受人民的影響，那類法西斯組織
的脆弱不也可想而知了嗎？

閻錫山把人們分為四等：

- 一、人民：是組成國家的分子，不分種族男女老幼完全包括在內。
- 二、民衆：是人民能發生政治作用，表現政治行為的。
- 三、羣衆：是由民衆中經過選拔而組織起來的，受組織的影響，支配和領導不在紀律範圍以內者。
- 四、組織：組織是同志所集合，是在同一主張、同一目的統一領導下，有領袖、有幹部、有羣衆、
有主義、有政策、有政綱、有紀律、有政治行為的團體。

把次序倒過來，第一等人是閻錫山為領袖的統治集團，以閻錫山的那個法西斯組織為其代表，是金
部政治的領導者。第二等人是已經受過這個法西斯組織的政治影響或麻醉的，是上述政治集團的附屬
。第三等人是能起一定政治作用，可作為政治的搖籃的，助統治之威的。第四等人是絕對大多數，
期完全排在政治之外，對於政治絲毫不得過問，只是純粹被統治的奴隸。
的確，閻氏把他在經濟上那一套新奴隸制度完全反映到政治上來了。他「巧妙」地、可笑地、也可
鄙地，把人民、民衆、羣衆分裂為三個不同的階級，不同等級。他說他要「建立民衆基礎的人心政權」
，就是要建立以他那個統治集團的附和者為基礎的奴隸主法西斯主義的政權，在這政權下，人民（即他
所認為的第四等人）是完全被統治的，是完全沒有發言權的。

正如我們在他的「經濟計劃」上所看到的，他這個新奴隸制度乃是反動的份地制度和領村制度；而
符合於他這個新奴隸制度的政治，也正是以村為統治的基本單位；他們要「在基礎工作上做到：健全村
支部，統一村組織」。閻錫山這個奴隸主法西斯主義就是以鞏固他經濟上的新奴隸制度為其目的。閻錫
山那一套經濟上的新奴隸制度，就需要這一套政治上的奴隸主法西斯主義去加以控制。
閻錫山還不要「人民」呢？當然還是要的。牛馬都要，為什麼人民不要呢？沒有人民，還有什麼
農奴和士兵呢？沒有人民當農奴，誰去耕地呢？那裡得有糧草呢？沒有人民，他還有什麼可供統治的呢
？他如何得成為土皇帝呢？

但是：閻錫山却死記着孔夫子的愚民哲學，叫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的口號是：「
拿起人民來」。就是說：人民只是可以「拿起」的，即便死的工具一樣，是可以「拿起」的，而不能是
「喚起」的。「拿起來」做什麼呢？拿起來掠奪，拿起來奴役，拿起來做豬羊。

在閻錫山那裡，人民是農奴，是「死的工具」。閻錫山的政治，但是為的去「拿起」這種死的工具
來為他工作。但是，閻錫山對於人民究竟就是知道「拿起」使用，而一點「仁政」也沒有嗎？是的，他

也有一些「仁政」。比如，關錫山的「手諭」就有過以下的一些話：

「據報三十三軍補志團長張宜生，於陰二月初三日在駐地高家坨，經過村民鄭明渠之門口時，被犬咬傷褲腿，該營長已將狗擊斃，怒猶未息，復進院內將犬主鄭某亂打亂罵，踢傷其小腹，並勒迫將狗交出，投交樹上，用棍擊斃，村中人民大為不滿等情。張營長此種行為，真是太不聰明，太違反軍人的德性，也太吃虧了。此事正當處法，應本愛人以德之心，為狗主設想，為今後不再咬咬，則切勿勒告犬主，將犬管住，免爾後再傷他人，滋惹事端，則犬主一定感激涕零。此係「仁者安仁」之處法。不能如此，亦應利用狗咬，表示寬宏大量，使聞者欽佩，藉狗咬的事實，做了要好的機會。這是「智者利仁」的處法。不能如仁智的處法，亦只可忍而不究，聽其咬人，日久自有人抵制。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鄭莊公之誦言是也」（行動九卷十期）。

大家看！關錫山的「仁政」竟把恩惠施到了狗身上去了，「可以人而不如犬」嗎？不過，關錫山這套手法，不是他手下那些人能學的，大概只有關錫山自己，或者加上其他一兩個「修養到家」的人，可以辦到。但是「仁者安仁」這一條，他也一定辦不到。假如關錫山被狗咬了，他會取上「智者利仁」那一條，並在克難坡的報上登一條新聞，將來還要寫在他的傳裡，將這一個「仁」充分地「利」用一下。至於那班營長之流，弄得住把「領袖」的「手諭」拋之腦後，一遇狗咬，總會抓出狗主，亂打一頓的。因為在關錫山訓練下的那批特務頭兒們，對於人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怎能有什麼真正的仁心仁政呢！

除此而外，是否還有其他什麼「仁政」呢？要說當然也還可以找得出，例如：

「汾西區統委會主任程全香，為安插地方游散類兒，會於上年十一月二十日特組織第十二區統委會，汾西及臨石組、政、軍、經、紀律糾查團各一。其作法如次：

- 一、目的：救民愛民，主張公道，使人民安居樂業，人民得享安寧幸福。
- 二、途徑：除暴安良，維護地方治安。
- 三、方法：先斬後報，肅清地方壞人。
- 四、在行政上：（一）協助並完成當前工作。（二）保險並掃除工

作障礙。……（五）抗五抗：（一）抗戶不上，（二）抗差不支，（三）抗糧不納，（四）抗兵不當，（五）抗款不出」（行動，九卷三期）。

關錫山對於這個報告批了三個大字：「豈行動」。雖然他批在他的官報革命行動上發表，當然不是其他各地一體響應的。對於這個所規定的東西，又應該倒頭上去的；行政是「剷除五抗」，方法是「先斬後報」。這就是關錫山的「除暴安良」！這就是關錫山的「為民愛民」與「主張公道」；總而言之，這就是他的「仁政」！

但是，從有「五抗」的存在看來，究竟可以反證：關錫山的「仁政」是如何的一種「仁政」了，他這個假民主法西斯主義的政權是否有「榮國」或「開展」的希望，也就不難明白了。

四 結束

事實上，關錫山自己也是會感到他那個假民主法西斯主義並沒有什麼力量，並沒有什麼前途可言的，他是會感到他那些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思想辦法之不可免沒落的悲哀的。所以，他又得求神庇佑了。且看這次新聞記者關於關錫山住宅的描述吧：

「三個密洞中，中間一個是會客的，就是那洞口壁上，發現一個凹進去的神龕，裡面供奉著一張花花綠綠的紙條，上面印有「天地三界十方真宰之位」，神龕的外邊則貼著「天地交泰」和「天天進步」了。」「地地要劃分」的對聯。這大概是關先生自己的手筆吧！」（重慶新報，六月二十四日）

「地地要劃分」，就是他那種極端反動的份地經濟、鎮村經濟的新法以制度思想，這一節既開命矣。「天天進步」呢？就是說，必須天天要壓迫人民的新辦法。在關錫山這種法西斯分子看來，壓迫人民愈急愈叫「進步」了。但是我誰幫忙呢？雖然「親日亦未嘗無益」，又有國內其他法西斯勢力可為呼應，可是，在人民面前，關錫山無疑地是孤單得很，於是「天地三界十方真宰」就被請出來了。然而古語不云乎，「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這個「天地三界十方真宰」爺爺立在雲端，慧眼垂視，不著猶可，一看可要氣破肚子。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這位假世修下的「領袖」爺爺，這叫做「長官」的哲學，是「故意製造謊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這叫做鬥爭」的。而且「宣傳有時可以不作，鬥爭一刻不可放鬆」。原來是一位撒謊大家，未免和「真宰」爺爺的宗旨不合，叫他保佑，那是不可能的。於是乎可以斷定神是不會保佑的了。那末出路怎麼樣呢？——

——如果他不敢向人民悔罪的話——
要知出路怎樣，
請看墨索里尼！
（一九四四年八月稿）

孫中山先生論三大政策

資料室

一 革命三民主義的生命線：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總理遺囑，一九二五年）

二 聯合蘇聯

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同俄國革命都是走一條路。所以中國同俄國不但是親善，照革命的關係，實在是一家。（與長崎新聞記者談話，一九二四年）

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關係最密切，且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以推翻封建帝國主義，解除弱小民族壓迫爲使命；本大元帥夙持三民主義，亦爲中國革命世界革命而奮鬥。現在貴國命令率艦遠來，定使兩國邦交愈加親睦，彼此互助提攜，掃除障礙，共濟大同，豈惟兩國之福，亦世界之幸福也。（歡迎俄艦祝詞，一九二四年）

我們和許多國家立了不平等的條約……做了十幾個國家的亡國奴，最近新發生了一個俄國，自動的廢除了中國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交回帝俄在中國所得的特別權利，放棄主人的地位，不認我們是奴隸，認我們是朋友。（「國民會議是以解決中國內亂」，一九二四年）

外國在中國訂了那些條約，便和中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便用來壓迫中國，享種種特別權利。經過這次歐戰之後，德國和奧國廢除了那類條約，德國和奧國現在中國不能享特別權利。德國和奧國之所以廢除了那類條約的原

故，是因爲他們是打敗了的國家，被我們中國廢除了的。近來俄國也廢除了那類條約，俄國之所以要廢除的原故，是因爲俄國革命之後，復主張公道，知道那類條約太不平等，對於中國太不講道理，所以他們自己甘心情願要廢除那類條約，要送回俄國在中國所享的特別權利。（對蘇聯各團體歡迎宴會講詞，一九二四年）

近來俄國革命成功，還不忘中國革命的失敗，所以中國國民黨同俄國國民因革命之奮鬥，日加親善。（與長崎新聞記者談話。）

吾幸得彼（指蘇聯）津梁，從事可日爲接近……無論如何艱苦艱難，必當留在軍中，與我在外之奮鬥相始終，庶幾有成，外間日日之進步，非紙墨所能盡，仲凱來此當能略道一二。總之數十年來，在今日爲絕好之機會，吾人當要分途奮鬥，不可一時或息，殊不負先烈之犧牲，國人之期望也。（與蔣介石手札，一九二三年）

我船已來過此地，以後再來，當更容易，如我確有可派之兵，要槍來用，以後不成問題。此頭一批之械，不過到來一試耳。以後祇要問我有人耳，必可運之接濟也。（與蔣介石手札，一九二四年）

若西南局面日有發展，當先鞏固西南，然後再圖西北，且最好能由西南打開一聯絡西北之交通線，如陝甘等地，則西北之經營乃容易入手，蓋西北所欠者在人，如無捷徑可通，亦難溝通海外，殊屬艱難也。（與蔣介石手札，一九二四年）

本總理會接到海外華僑數次電，詢問此次改組，是否爲改國民黨爲共產黨，如爲改共產黨則華僑同志決不贊成，蓋華僑處於帝國主義政府管轄之下，深受帝國主義國家宣傳破壞俄國革命論調之毒，故發生種種懷疑，不能自釋，世界上從前對於俄國革命之懷疑，本不獨華僑爲然，即各國人士亦莫不皆然，不過彼一時也，此又一時也。多數華僑，不願外

國文字不備，故外國輿論之進步為轉移。三四年前，傳聞於外國人士者，至今猶以為光，不知外國人士之輿論亦依俄國之進步而變遷，近來俄國內政進步之神速，與前大不相同，故英、法、美、日等國之國會，均欲變議承認新俄國，意於意大利則已承認，其他各國在此一二年後，亦必相繼承認，俄國已為各國所承認，故俄國利密而吾，本國與之聯合，將來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決無大害。（民生主義之說明，一九二四年）

今日中國之外交，以國土為接，關係密切言之，則莫如蘇維埃俄國。其於吾國利害相之，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援助互助，策進兩國利益。吾憶三年前，日本參謀本部員某，訪余於上海，問余能否贊助俄國之無政府主義者，余答其俄國列寧政府，組織完備，因其黨正正之政府，無得指於無政府耶？該員聞此，亦不知其言所自出，乃竟不語復答。……其事已逾一年，而國人不知，至今尚指其為過激派。其故蓋由某國不能發覺其無政府主義於東亞……宜俾其為共產黨，當過激派，以彼之恐怖而不相察者，早人輸交親善，故特布此恐怖之宣傳。（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與蔣介石等談話，見蔣著孫大總統廣濟雜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而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囑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恢復其自由，從古代奴役世界為其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共產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其自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壓迫國之歷史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完之業，移交與後進守國民黨主義與我黨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禍。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囑咐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與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那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蘇維埃獨立之中國，兩國在華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請以兄弟之說祝你們平安。

馬克思（致蘇聯遺書，一九二五年）

三 共產黨是二民主義的好朋友

從前講社會主義的人，都是馬托邦派，祇希望造一個理想上的安樂世界，來消滅人類的痛苦。至於怎樣去消滅的具體方法，他們並沒有想到。到了馬克思出世之後，便用他的聰明才智和學問經驗，對於這些問題，作一極透澈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所不能解決的，都統統發明出來。他的發明是全憑經濟原理。他照經濟原理作透澈的研究之後，便批評以前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不過是有個人的道德心，和羣衆的感情作用。其實經濟問題，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決得了的。必須把社會的情狀和社會的進化，研究清楚了之後，才可以解決。這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原則，可以說是全憑事實，不尚理想。至於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學說一出來之後，便舉世風從，各國學者都是信仰他跟他走。好像盧騷發明了民權主義之後，凡是研究民權的人，都信仰盧騷一樣。（民生主義第一講，一九二四年）

馬克思主義的發明，是人類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學說一出來之後，便舉世風從，各國學者都是信仰他跟他走。好像盧騷發明了民權主義之後，凡是研究民權的人，都信仰盧騷一樣。（民生主義第一講，一九二四年）

列寧是革命中的聖人。……力，還要宏大，成績還要圓滿，他們之所以能够有這種美滿成績的原因，就是由於俄國出了一個革命聖人，這個聖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寧。（北上時對黃埔軍校學生告別詞，一九二四年）

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却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實全由其首領列寧先生個人之奮鬥及能理與組織之完善，故其為人，由革命觀察點看起來，是一個革命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現在俄國的首領列寧先生去世了，於俄國和國際會生出什麼影響來。我相信是決沒有，因為列寧先生之思想精力奮鬥一生的工夫，全精盡在黨中，他的身體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現在提出大會名額或莫斯可，對列寧先生之死表示哀悼，請大家議決。至於各行政機關，已由政府通令下。三日，本會亦應休會三日。（「政黨精神在黨員全體」，一九二四年）

多數青年
贊成共產
黨，共產
黨在中國
國進行激
底的革命

一講到社會問題，多數的青年便贊成共產黨，要拿馬克思主義到中國來實行。到底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那股青年志士，用心是什麼樣呢？他們的用心是很好的。他們的主張，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以為政治社會問題要正本清源，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所以他們便極力組織共產黨，在中國來活動。（民生主義第二講，一九二四年）

現在有很多新思想的青年出來……故此改組……使力量增大，使革命容易成功。（政黨的神精在黨員全體，一九二四年）

現在的革命需要青年，隨着世界大局所趨和中國的進步，我有許多新的看法，新的做法。現在國民黨的一股老同志，很多不能完全了解，也不能堅決執行。只有青年能跟得上我，能和我共同奮鬥。（一九二三年與張繼等談話，見李慶著中山先生論青年，載中蘇文化中山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特刊）

三民主義
是共產主
義的朋友

本黨多數同志，對於此主義（民生主義），向不盡留心研究，故近日因此主義而發生誤會，因誤會而發生懷疑，因懷疑而生階級，則既有此現象，恐怕將來分裂，發生不良結果。故本總理對於此主義，必須再行剖解，庶幾本黨同志，因此主義所發生之誤會懷疑階級，可以完全打破……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階級既明白民生主義之真義，則新舊同志，因誤會而生之階級，從此便可以打消。（民生主義之說明，一九二四年）

為什麼我敢說我們革命同志對於民生主義沒有明白呢？就是因為這次國民黨改組，許多同志因為反對共產黨，便居然說共產黨與三民主義不同，在中國只要實行三民主義便够了，共產主義是決不能容納的……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與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

四 工農是革命的基礎、扶助工農

在這種勞動紀念日，來開這個工人大會，要怎麼樣，一個大才不是空閒的呢？依我看來，要從今日起，立一個志願，組織一個工人大團體。現在文明各國的工人，都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近來發生工人的風潮，都是由各國傳進來的，就是今天開這個大會，當然也做各國工人的。各國工人現在是

什麼情形呢？他們所處的是什麼地位呢？各國工人現在都有團體……是生在不文明的國家，工人也能自己組合團體，提高自己的地位。譬如俄國工人在幾年以前，給成大團體，推翻專制的俄皇，改革政體，弄成工人的獨裁政治，無論什麼資本家都不許執行政權，只有工人可以管國事……其他各國工人的勢力，都是一日擴充一日，他們的地位，都是一日提高一日，所以他們在本國之內，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我們中國人……既有了團體，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便可以做全國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在農前的陣線上奮鬥。（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一九二四年）

這次沙面工人的罷工，是什麼原因呢？沙面本來是中國的土地，是滿清送給外國人的。外國人設立種種苛例來壓迫中國人，工人便全體罷工去抵制，你們大家都知道中國向來是怕外國人的，凡是中外發生了交涉，中國總是不敢講話的，但是這次沙面的工人抵制他們，因為……很堅固的團體。所以遇到外國人發生苛例，便全體罷工，要求列強來取消，列強因為看見工人有堅固的團體，所以不敢再壓迫，便要而工人來講和。由此可見工人要有團體才可以保障自己。（農民大聯合，一九二四年）

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農民就是中國的一個最大階級，要一個個階級都覺悟，都明白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的革命才是徹底……中國社會上的人，最辛苦的是農民，享利益最少的是農民，担負國家義務最重的是農民……現在用政治力量來提倡農民……要一般農民都有新思想，都能自己來救自己的苦痛，這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耕者有其田，一九二四年）

中國現在尚未脫農業經濟農民生產，農民既佔全生產百分之九十，為要實行總理之三民主義，首先在解放農民，吾國人口既佔農民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亦是則吾國四萬萬之人口，農民佔三萬萬有餘，所以中國之國民革命，喚言之即為農民革命，為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惟有首先解放農民，基於以上之論斷，則中國國民黨無論何時何地，皆當以農民運動為基礎，無論政治的或經濟的運動，亦應以農民運動為基礎，黨之政策首須於農民利益之本身，政府之行動亦須於農民利益而謀其解放，因農民解放即國民革命大部份之完成，而為吾黨三民主義實現之根據。（中國國民黨第二次

代表大會農民運動決議案，一九二六年

革命必特
加始可決
勝

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特全國農夫工人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

國民黨於此，一方面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補助其經濟組織，俾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助國民黨與黨不斷之努力，以維國民黨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四年）

組織工農
武裝工農

今天開這個農民聯歡大會，這是革命黨和農民的第一次見面。我們大家見面之後，要做些什麼事呢？就是從今日起，要實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如果能夠實行，人民才能享幸福，才是真正以民為主。民生主義若是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不過是一句空話。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的責任，現在大家農民的身上。……農民的總數在人民里佔有百分之八九十，是佔極大多數。……中國現在是民國，要成農民國，是大多數人能夠辦到的，多數農民如果能夠結成大團體，就有力量

以講話。本黨今日開這個農民聯歡會的目的，就是在提醒你們農民，要你們回國之後，更積極大衆，大家團結起來，結成團體便可以不做奴才的奴才。……從前被人搶去了的利益，便可以爭回來。若是爭不回來，或者被人壓迫，便可以設法來自衛，或者是裁制。……你們各地農民向來不知結團體，農民團軍來自衛，所以總是被人欺負。如果要以後不被人欺負，便要從今日起結成團體，挑選各家的壯丁來練團軍。你們能够這樣進行，政府還可從中幫助，用極低的價錢供給你們。你們有了槍，練成了很好的團軍，便是中國第一等的主人翁，請很有力的話。（農民大聯合，一九二四年）

諸君結成了大團體，要擔任甚麼責任呢？就是要擔任提高國家地位的責任。……要抬高中國國家的地位，便先與中國脫離了外國的經濟壓迫，也是對資本家宣戰。現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樣的作戰，所向的目標，都是一樣的敵人，所以中外的工人，應該聯成一氣，中國工人聯絡了外國工人，對外國資本家去宣戰，便更顯辛亥的革命志士，同心協力，一往向前，抱定破釜

沉舟的大勇氣。……現在中國同各國不平等的的原因，是由於國際的東洋，譬如政治經濟種種的壓迫太多，要解除這種束縛，在工人一方面，並不是難事。俄國的工人，便是中國工人的好榜樣。（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一九二四年）

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心之革命軍，其兵員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廠、並各省黨心革命同志招集。（與蔣介石手札，一九二四年）

和不農做
朋友爲工
農服務

我素來最敬佩的是你們做工的人，所以，我喜歡與工人做朋友，因爲工人是與世界、國家、社會最有利益的人。我所最痛恨的，就是軍閥官僚，資本家，因爲他們是與世界、國家、社會最有害處的。（在機器公會成立大會時演說，一九二〇年）

你們這次集會，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這是我們做農民運動所辦的第一件事。……這回的宣傳是第一次，諸君去實行宣傳的人，居心要誠懇，服務要勤勞，要真是爲農民謀幸福。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用極好的聯絡方法，先把廣東全省的農民都聯合起來。（耕者要有其田，一九二四年）

現在文明進化的人們覺悟起來，發生一種新的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要替衆人服務。這種替衆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世界道德之新潮流，一九二四年）

青年具有勇敢犧牲的特性，實爲國民革命的先鋒軍，在目前國家之制度束縛之下，對建軍開國之下，種種教思想統治之下，買辦廠主剝削苛待之下，帝國主義者經濟政治文化種種侵略之下，青年的生活教育各方面都受特殊的痛苦，所以青年革命的要求，比其他民衆更爲熱烈，本黨爲求革命勢力的充實與擴大，對青年運動有特別注意的必要。……在農工運動已經能够公開領導民衆運動的地方，應極力促成農工運動的聯合組織，使學生青年實成工農運動，不要說離工農羣衆，成爲落伍的形勢。（青年運動決議案一九二六年）

馬克思是怎樣研究和寫作的

M. 格略塞爾

在第十九期的「彙集」中，已經介紹過馬克思學習的情形，現在這篇文章中所要介紹的，則是馬克思從事研究和著作的情形。在此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馬克思並不是一位書齋中的學者，而是一位革命鬥爭的戰士，他永遠是把理論研究的工作，和革命鬥爭的工作緊聯在一起的。

馬克思是用嚴謹的態度

從事研究和寫作的

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所寫的一封馬克思恩格斯的會談錄中道，二十五年來，馬克思「最用一種無與倫比的真誠」在研究和思考自己的科學，「在他還沒有滿意他所作的結論的形式和內容之前時，在繼續沒有最終相信，他沒有留下一本尚未讀過的書，沒有留下一個尚未考慮過的問題，並且每一個問題都已由嚴密研究到透徹的程度之前時，這種嚴謹是不允許他用有系統的形式來發表他的結論的」（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四卷第八七——八八頁）。

馬克思這種嚴謹的工作態度，「他經常地、永無間斷地工作，只要他有一點可說的話，甚至在散步的時候，他也隨身帶着一本筆記簿，不斷地在上面寫着筆記」（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四卷第一六頁）。

馬克思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這樣描述他寫出馬克思的工作日：

「雖然他常常很晚才睡覺，但在早晨八九點鐘之間的時候，他是已經起床，在喝黑咖啡

和讀報紙了，然後就走進自己的書房，在那兒一直工作到深夜兩三點鐘……年青時，馬克思就已有通宵工作的習慣。工作成了他最醉心的一件事情，這種精神佔有了他整個的人。以那時為他最發奮忘食。在他最後終於走進食室進餐時，往往總要喊他好幾次，他又重新回到他的書房了」（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九〇——九二頁）。

馬克思就是這樣工作的。用巴比塞的形象化的說法，這位天才的思想家，「有着一個巨人似的身材，足以吹散思想的天空中的一切烏雲」（見巴比塞：「斯大林傳」一九三六年俄文本第二十五頁）。

馬克思把他所有的精力，都獻給了毫不知疲倦的工作。他曾用這樣美滿的句子，表現出他對於他自己以及一切要把握人類知識峯頂的人們的要求：

「在科學中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些在攀登多石的小徑時不畏疲勞的人，才能達到光輝的頂點」（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十七卷第廿三頁，這封信是馬克思對他的女婿不害怕勞作，不管它是多麼艱難、繁冗，而時時時刻刻學習克復積壓在道路上的切困難，——這就是我們在研究馬克思著作與作家的工作方法所應採取的一個重要的教訓。

有一本負不起馬克思來編訂者的一本論貨幣流通史的著作，而他當時正在寫作關於這一個問題的文字。他就寫了一封信給恩格斯，請他郵匯一筆所需要的錢款給他，馬克思在信裡面寫道：

「在這本書裡面，大概對我沒有什麼更新的東西，但是按照「經濟學界」雜誌對這本書的重觀，以及我親自讀過的幾段摘錄的文字來看，不啻一着這本寶，我的理論上的良心是不允許我再繼續寫下去」（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二卷第三四〇頁）。

恩格斯在他的回憶錄中，又曾經這樣講起馬克思：

「他文字上的良心，正像他對科學上的良心一樣，是同樣的嚴謹。他不僅從不肯引用他本十分相信的事實，而且也決不允許他自己討論一個他事先未曾透徹研究過的問題。在他對於他所寫的東西還沒有作徹底的修正和多次的改作而求得一個滿意的形式之前時，他絕不發表任何東西。雖然有成堆的東西拿到公衆面前去的這個念頭，在他是受不了的。他保留着一個觀點沒有改正過的原稿拿給別人看，這在他簡直是種莫大的痛苦。在他心中的這種感受是強烈了，有一次他甚至這樣說過，寧可把他的原稿都燒掉，決不願讓它們沒有完成的留下來。

「在他的研究方法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那是讀者所不能想像的。譬如，為了要在『資本論』中寫一段將近二十頁的關於英國工廠立法問題，他不得不翻閱了包含清英格蘭與蘇格蘭專門調查團及工廠督察員的報告的全套藍皮書；我們只要從他在這些藍皮書中所作的許多記號上，就可以知道他是把這些書從頭一直讀到尾的」（見『馬克思選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九四—九五頁）。

在今天，大家已很不容易想像出馬克思著作『資本論』時所處的那種艱苦情況，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毫無疑問地，（『資本論』這本書）是一顆什麼時候要射向資產階級腦袋裡去的最可怕的砲彈」（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五卷第四八頁）。

窒息馬克思家產的那種物質上的絕望的困難，要求他不得不花費很大的精力來弄錢。假如我們再想到作為一個革命政黨的領袖與組織者的馬克思經常所做的龐大的工作，再想到他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許多敵對政黨作不斷鬥爭時所耗費的精力與時間，那麼當他著作『資本論』時所預先做的那種巨大的準備工作，看起來就完全不像是個人所能為力的了。可是馬克思完成了這一工作：我們只要舉出一點就夠了，就是他為了著作『資本論』，曾經研究和做了一千五百多種書的提籃。

馬克思著作『資本論』的歷史，是特別富有教育意義的。按照他所採用的作為科學研究工作的一種特別的制度，他在發表他自己的著作之前，先寫好許多專論形式的大著作，——這些著作「並不是為了發表的，而是為了對自己問明許多問題用的」。

馬克思在開始著作『資本論』時所寫的許多論

著，共包括七個抄本，大約五十個印張，這就是他對於政治經濟學所作的批判的最初的草稿，並且是作為一個大的開端。為了他在一八五七年才開始寫的這個初稿，他從一八四三年起就開始了龐大的科學研究的準備工作，最初是一個人，到了八四四年底時，就和恩格斯一同研究，而從這個時候起，在革命工作上，恩格斯就成了他最忠實和獻身的朋友。

為了自己的工作，馬克思曾積聚了大量的準備材料，像摘錄，提要，表格統計，草稿以及圖書目錄等，馬克思儘力地將這些材料組織起來，以便在將來的研究工作中更容利用這些材料，並且做了索引。為了同一目的，他還為自己的著作的原稿做過索引。

在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七年這五年當中，馬克思研究了並且批評地分析了所有重要的經濟論著。我們不應忘記的，就是馬克思在這一個時期中間，還曾經努力於研究法國革命的資料及文獻，並且也沒有中斷他對於哲學的研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合著的『神聖家族』一名『批判的批判』之批判』及『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書，就都是屬於這一個時期的。

馬克思是把理論研究工作和革命活動緊聯在一起的

馬克思的這種大規模的理論工作，是和沸騰的革命活動相結合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並不只是在這本著作中，向「學術的」世界敘述出自己科學成果的學者。

拉薩格在回憶他和馬克思的談話時，曾經這樣寫道：

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寫了一本反對普魯東的小資產階級與反動觀點的著作『哲學之貧困』，在這本著作中，馬克思已給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作了一個總的分析。一八四七年秋天，馬克思作了關於『庸俗勞動與資本』的演講，最後在同一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因『共產主義同盟』的委託，寫成了斯大林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教義」』的『共產黨宣言』。

列寧這樣寫道：

「在這篇著作中，馬克思以天才的明確性和顯明性，描繪出了新的宇宙觀，將社會生活領域也包括著的徹底的唯物論，作為最全面和深刻的論證科學的辯證法，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為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創造者——無產階級之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作用的理論」（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八卷第六頁）。

在這些年代當中，馬克思還為各種報紙和『德意志年報』寫過很多的文章。

以上所述的，就是馬克思在那些年代中，最初開始準備他主要的著作『資本論』時的規模的概括情形。

馬克思「……認為一個學者，假如他不願意降低自己的水平的話，就必須永遠不斷地積極參加社會生活，就必須永不把自己閉關在自己的書房或實驗室中，正像祇身在於箱中的蛆蟲一樣，離開他同時代人的生活與社會與政治的鬥爭。『科學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職業，那些能够献身於科學的幸運的人，應該首先

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人類服務。」「爲世界工作」，這就是他最喜歡的一句話」（見「馬克思選集」俄文本第一卷第八六頁）。

我們知道，馬克思事業的偉大的繼承者——列寧和斯大林——，他們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是經常向我們表示出一個榜樣，告訴我們一個忠誠獻身於人類的革命戰士，應該是一個表現出工人階級利益的科學的人，同時也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應該具有多麼廣大的知識準備。

我們只要引出新大林在聯共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一段著名的話就足够了：

「那種局限於自己的專門知識，譬如說局限於數學，物理學或化學，而除了自己的專門知識之外再也看不到其他什麼東西的人，雖然他們自稱爲列寧主義者，但決不能視爲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列寧主義者絕不能僅僅是他自己所愛好的科學專門的專家，——他應該同時又是政治家與社會活動家，非常關心自己國家的命運，知道社會發展的規律，善於利用這些規律，並力圖成爲國家的政治領導的積極參加者」（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第五九八——五九九頁）。

馬克思首先就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與社會活動家。他所掌握的那種龐大的知識儲藏，是他在爲了無產階級的最有利的武器——革命理論時所必需的。

馬克思還在他最早的一篇作品「黑格爾法理哲學批判」的緒言中，就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提綱：「只要當理論一被資產階級，理論立即成爲物質的力量」（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三九二頁）

「黑格爾法理哲學批判」是年青的馬克思在一

八四三年時所寫的名著之一，當時他還不過才二十五歲。用列寧的說法，在這本著作中馬克思已經作爲一個革命者出現，宣佈對「一切存在作無情批評」了……」（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八卷第六頁）。

馬克思把他的每一個理論上的收穫，把他所有偉大的發見，都首先帶給羣衆，帶給無產階級。馬克思認爲口頭上與文字上的宣傳，是具有頭等的重意義的。

馬克思的同時代人，曾經告訴我們一件事，說一八四六年在布魯塞爾時，馬克思曾經召集了一次討論在工人當中宣傳工作的方針，以及團結與組織工人從事革命鬥爭的特別會議。出席參加會議的，有一位是德國的空想共產主義者魏特林。

據當時出席參加會議的安年科夫告訴我們：「我們坐在一張不大的綠檯子旁邊，坐在檯子的另一頭的是馬克思，他手裡正拿着一枝鉛筆，低聲地在紙上寫什麼東西，而同時他的終身不可分離的同伴和宣傳工作上的戰友，身體高大的恩格斯，正在用沉重而嚴肅的英語致詞會辭」（見「歐羅巴通報」，一八八〇年第二期第四期第九八頁）。

在這次會議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張必須把工人運動和科學及革命理論相結合起來，因爲只有這種結合才能保證勞動者從壓迫與剝削中爭取解放的偉大事業得到成功。而魏特林則反對馬克思的意見，並且發揚了他自己的理論，說必須在具體的條件上，用工人們組織起來參加具有集體化的設施的團體的方法，來直接幫助工人。

當魏特林還是繼續在提出反對的意見時，馬克思就帶着巨大的憤怒說道：「無知永遠不能幫助任何人」，工人階級要得到勝利，那只有在他們能夠組織自己的鬥爭和依據着社會發展的法则的鞏固基礎才行。

馬克思從年青的時候起，就是一個傑出的宣傳家，羣衆工作者。據馬克思同時代人的回憶，他的宣傳的發言、報告、演講經常是富於形象化的，並且是工人們明白的和瞭解的。馬克思忍受不了庸俗化和簡單化；他把他自己的知識，他自己的革命（這是社會科學的最大的成就），給與羣衆，而他的演講永遠是站在這個科學的頂點的。他用特別苛求的態度對待他自己的演講，這些演講都是深思過和盡力地準備過的，並且他還要別人也這樣做。

拉發格寫道：馬克思「僅僅抱着傳播他研究的結果的企圖，和爲在此前被空想的迷霧所籠罩住社會主義運動打下一個科學基礎的堅定決心，才從事寫作。他參加社會活動，也祇爲了一個目的，就是促進工人階級事業的勝利，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當它維持了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的領導權時，要立即建立共產主義……」（見「馬克思選集」俄文本第一卷第八七頁）。

（葆素譯）

代 郵

利斧先生：
請示通訊處。

編者



解放區報告

晉察冀行進

周而復

從村選看邊區的民主生活

在反掃蕩當中，一切的黨團團體，學校，政府機關，部隊，都集中全力在為了一個目的的工作：取得反掃蕩的勝利。等到反掃蕩一結束，各個部門的日常工作又開始了。

春天，是邊區一年一度的村選的季節。一早，曲陽三區的張區長到軍區政治部來請教，他告訴我今天是鄭家莊的改選，問我去不去，說當然是很願去的，便一同走了。

鄭家莊是一個五百多戶的村莊，選民（凡年滿十八歲以上的任何抗日人民，不論性別職業，當選都是選民。）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位。會議佈置在村邊的一個廣場上，很廣闊，在收穫的季節是打穀場，冬閒的季節，是村區自衛隊的操場；春天，便成為人民的會議場所了。這時候，廣場上還沒有什麼人，只有幾個村幹部在佈置會場，桌子四圍豎起了一塊塊長長的木板，上面貼着紅紅綠綠的標語，主席台裏鋪着黃布，那兒一排放着三張桌子，會中

一張桌子正放着一個大紅色描金花的小櫃子，上面貼着一張紅紙，寫了三個字：「投票箱」。一會，村幹部把一張開會日程貼在當中的桌子前面。

張區長為了準備這個村的改選，曾經在這兒工作了三天，幫助村長總結工作計算賬目，今天，他巡視了一下會場，又把村長拉到旁邊去談，檢查一下還有什麼工作沒有準備好。正在他們談的時候，走向村中去的遠路路上，忽然傳來整齊的步伐，接着是聽到雄壯的口令：「一二三——四……」我轉

眼望去，原來是村自衛隊，腰帶綵帶槍，四個人一排，向會場走來，他們到會場的中間，停止了，很整齊地排成了一個長方的隊形，坐了下來。接着是兒童團，婦女自衛隊，青壯先，老頭隊等都排着隊來了，把場子填得滿滿的，兒童團坐在最前面。我看到一種新鮮的氣象，蓬勃的精神，充沛的力量。聽說中國是一隻新豹，如果真長的話，那是說治兩

人民自己。
新的社會里，人民組織起來，成為這個社會的主人。

主席宣佈開會以後，老村長把過去一年的工作做了一個很詳盡的報告，說明這一年來在收支上，春耕上，優抗上，教育上……各方面的情形，像一個管家的僕人，向主人報告他的工作一樣。報告完了之後，主人——坐在廣場上的一千一百二十五位的選民，從各方面提出了問題：有的說去年冬學沒辦好，不能完全按時上課，還責任不能完全推到教育委員身上去，村長是個導全村工作的，教育委員不過是幫助村長辦理教育而已，冬學沒辦好，村長要負責；有的說這一年來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差，原來政府規定每月發優待糧，給抗屬送柴送水，有些抗屬就沒有收到，甚至有把兩個月的優待糧合併到一個月發，沒有照顧到抗屬的需要；有的說改選民的工作做得不好，反「掃蕩」以後，上級規定要捐糧食，大人一年錢六升，可是村長沒有好實做，并且這項救濟工作，只是附近駐軍給村子裏了一筆款子賑災，村長沒有全心全力推銷這一項重要工作……

各種不同的意見，從各方面毫無拘束地發表出來。我看見村長像一個忠實的僕人一般，坐在選民前面，回憶着這回事，臉上顯得有些慚愧。

最後張區長總結了大家的意見，並提出村政工作的事業關係不修，羣衆團體是領導羣衆的，是保證政權任務完成的，這一點却村長忽略了。這一年來的工作，用張區長的口吻說，就是：「檢討這一年的工作，優點只有三個，缺點却有七個，可以說這一年工作大體上沒有做好。」

張區長檢查一下選票，準備選票了。村長主任提出了農會會員做候選人，給農會提出他們的會員來競選，首先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一候選人一個個都舉到主席台上去，要聽他們的演說，一個青年農會會員這樣說：

「你們大家要選我當村長，俺一定要爲大家謀利益，根據鄉親們的主張，把每一項工作辦好。希望你們熱心幫忙，我一定領導大家抗日保衛家鄉，把俺們的光景過得更好……」

婦女候選人也上台說了話，姿和別人競選，她要把村裡的工作做得比別人更好。這時候坐在選民前面的兒童團開始活躍起來，唱歌叫口號，鼓勵大家競選。

競選演說講完以後，就開始投票。這是一種不記名投票，村裡的小學教員，村幹部，農會會員等三個人擔任監票，另外有數家選出人來監票。每一個選民走到寫票台旁取出自己選那個人，寫好以後，由自己投進投票箱。有的扶牆拐杖，有的扶着小孫子，從十八歲以上的青年男女，到七八十歲的老者，都走到投票箱前，選擇下一年給自己辦事的人——村長。

選完以後，大家便有序地對面講話，說說笑笑，在估計誰可以當選了。

開票結果：是一個青年農民和一個中年婦女當選了正副村長。張區長把一疊選票送到他們兩個人手裡，慶賀他們說：

「這就是你們的委任狀，大家選的，你們要好好辦事，不要辜負了大家的希望……」

他們兩人笑嘻嘻地接過封好了的選票，點頭同意張區長的話，沒有辭職的舊村長，在羣衆的意見之下，解職了，第二天他開始移交給新選出來的正副村長。

那家莊的村選工作完了之後，我給張區長談到邊區的區級縣級和邊區一級選舉的事。他告訴我，「大政和村選不無其。」所謂不無其，是這樣的意見：

村裡每十五人劃分爲一小組，每個小組提出候選人，成爲村代表，這樣的代表組織起村代表會，也就是村議會。由各村的代表，又推選出按人口比例的一定數目的代表，當區參議員，出席區參議會，從區參議會裡選出區長來，成立區公所。又在區參議員里推選出席縣參議會的議員，縣參議會裡產

生出縣政府，縣長等。專員公署一級，是邊區政府的代表機關，沒有參議會機構，從縣參議會裡直接選出出席邊區參議會，各縣的代表組織成邊區參議會，這是全邊區的最高權力機關，也是全邊區的代表邊區人民意見的機關，從這個機關裡產生了邊區政府委員和主任副主任。這些主任和委員，和各村的村長一樣，邊區參議會有一切權力可以改選罷免。政府的工作人員，他只是爲人民服務的勤務員，他的去留不決定於什麼法律關係私人關係或諸如此類的理由，而是取決於他的主人——就是人民。好的勤務員當然會繼續服務下去，壞的，也自然會被解職的。

像這樣以人民爲主的政治生活，孫中山先生追求了四十年都沒有成功，臨死時還說「付託」同志仍須努力」。經過八年的抗戰，在全國範圍來說，依然只是一個希望，在大後方所實行的仍舊是黨治，或者也可以叫做民主，不過這種「民主」是：「我是主，你是民！」

全國人民的希望，孫中山先生的理想，首先在解放區實現了。

人民的勤務員

村選完了之後，張區長和我一塊回到軍區政治部來，三區的區公所駐在軍區政治部這個村裡。

一路上走過沙灘地，小河裡的水發出淅淅的響聲。我們邊走邊談着：我問他村長有沒有薪水，他笑着稱地向我望了一下，然後臉紅的搖搖頭，最後說一句：「舊政府時代是有的一。」

原來邊區的村長和村幹部，是不脫離生產的，

村長忙，實際上過問不上自己的生產的。然而沒有薪水，過去村幹部還到村公所辦公，報銷，現在在村裡辦公，這一點也取消了。實際上，村長是個無報酬的職位。他的唯一的報酬，就是替村裡人事情辦好了，大家的感謝，下一次再選他。可是他的任務是繁重的，要計劃全村的工作，領導生產，教育，武裝鬥爭……

原來邊區的村長和村幹部，是不脫離生產的，

區幹部都是脫離生產的，但那薪水，却少得可憐的，只八塊錢一個月。就拿張區長來說，他穿一身粗布棉衣，戴個草帽，身上揣一個土黃色的飯包，整天的跑來跑去給老百姓辦事。比如，三年前遭到水災，全區的人生活發生了問題，幾乎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要缺三個月以上的糧食，據老年人說，這幾年來前所未有的災情，是餓死不少人的。從前還沒有這樣嚴重的災情，都要餓死不少人的。張區長和邊區其他政權工作人員一樣，到處想辦法，以政府的名義，向地主富農借糧，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費三四次的動員，左一趨右一趨的說服，最後又開了士紳借糧會，這樣才說動了。從地主那兒借來糧，借給大多數缺少糧食的農民，這樣才能渡過災荒，能發生產，到秋天打下糧食，再還給地主。因此，在空前未有的水災下，全區沒有餓死一個人。只要老百姓有困難，有需要，他就去籌劃，去辦理，去解決。

做區長這樣，在解放區根據地裡工作，工作雖忙，生活雖苦，但很平安。他給我談到冀中游擊區趙縣縣長的生活，那簡直是在生死線上鬥爭。

趙縣的縣長是陳翰儒。陳縣長不像從前的縣老爺，整天坐在衙門裡要錢、要糧、吃好的、穿好的，一個人殺個老婆，出來的時候，威風凜凜，不是騎馬，就是坐車，從前更是吆喝開道，甚至街上連老百姓也不讓走。可是陳縣長就完全不同，他每月只拿十五元的津貼（這是邊區政權工作人員的最高津貼）。吃的和老百姓一樣的飯，穿的和老百姓一樣的衣服，甚至比老百姓还不如；夏天因為「掃蕩」緊要，上級機關及部下單大，他仍舊是穿老一身的棉衣。老百姓愛戴他，他一身單衣給他，他不穿，怕增加老百姓的負擔，既是不久會

發下來的。陳縣長就是這樣穿著一身棉衣，大熱天到處奔走給老百姓辦事，想活路。不認識他的人，在路上碰到了，誰也不會知道，這就是一個縣的父母官陳縣長。他在敵偽根據地的據點中開展了民主政權，建立了民主的政府。開頭，因為環境緊張，人手不多，他一個人便在敵人據點附近，做好幾個人的事，他自己說得對：「這時候，縣長是我，科長是我，秘書是我，交通的頭也是我。」可謂是身兼數職了，然而他的津貼也還是十五元，甚至有時拿不到。但是他腦筋裏沒有時間想這些事，他怎樣給老百姓多做事，能夠把老百姓生活改善。

說到趙縣的縣政府，誰都會吃一驚的，既不堂皇，也不華麗，更不威嚴，不但是不是一個縣政府，連縣政府的門房也不像。趙縣的縣政府是在地裡看水車的一間小屋子，陳縣長在這兒辦公，這兒就是縣政府。這不像縣政府嗎？是的，不像。可是有什麼關係呢？主要是在實質，不在形式；過去縣政府雖然堂皇壯觀，那是用權力從人民身上剝削下來的，這政府是和人民敵對的，是人咀咒的對象。

看水車的一間小屋子固然不像縣政府，但團結了趙縣全縣的人民，他是人民力量的動力站，它是由人民組成的全縣總指揮部，人民的一切問題都來找陳縣長，人民關心這間小屋子，愛這間小屋子，擁護這間小屋子，因為這間小屋子和小屋子裏的人，給他們辦事。

陳縣長的生活很簡單，簡單到這樣一個程度：連伙房沒有，飯也不做，他身上只是經常掖着乾糧，他覺得這樣既省事，也節省時間，更可以避免繁瑣，因此能夠抽出時間來多給老百姓多做事。他在繁瑣的據點當中，開展了統一戰線的工作，使得過去曾經懷疑過民主政權的人，也舉起雙手

來贊成民主政府的措施。他在敵人的破壞之下，建立起趙縣的民主政權，包括各個階層的代表，團結了各個階層，抗擊敵偽當時所進行的安撫化運動。平時他對處為全縣人民工作奔走，掃蕩來時他帶著縣里的地方武裝——義勇軍打遊擊保護人民。去年二月里反「掃蕩」，他帶着少數的義勇軍被優勢的敵人包圍了，他一個人勇敢地頂着，企圖突出敵人的重圍。但是敵人又從縣城開來了兩輛汽車增援，終於不支，陳縣長和他少數義勇軍都被打倒，陳縣長受了重傷，被敵人送到偽縣政府的民衆醫院去治療。這時，敵偽開始了誘降，慰勞，送禮物，探問，勸解，他卻一一拒絕了。起初是偽縣長來勸投降，不肯；接着是偽縣長，派兵隊長，一個個來勸誘，一個個被罵回去。最後偽趙縣的敵人小隊長來勸降，也被罵走了，他始終不肯爲了個人的生死，而出賣趙縣人民的利益。敵偽束手無策，無可奈何地把他槍決了。

陳縣長雖然死了，但是他勝利了。縣長，和一切政權工作人員，現在是人民的勤務員給人民服務的人。過去的縣長老爺，和一切官員，是騎在人民脖子上剝削人民的。這種爲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是解放區政府工作人員的典範，陳縣長不過是千萬萬的政權工作人員當中的一罷了。這種爲人民服務的勤務員，怎麼會不得到人民衷心的愛戴，至誠的擁護呢？

張區長指手劃腳地給我說，越說越有勁，不知不覺已走到軍區政治部村口了。進了村，因為他疲勞了一天，又給我談了這麼久，便不敢再打擾他，和他分手，讓他回區公所去休息休息，我一個人回到政治部去。

(未完)

編采及評書

讀葛琴的小說

鉅耳

「總退却」、「磨坊」、「伴侶」

過去自己寫過一些東西，都是就書論書，也還簡單。現在是把一個作者四本書擺在一起，這就不但要論作品也要論作者了，這實在是我力所不能勝其任的，何況我與葛琴女士更無半面之緣呢！這篇文章不是說對作者葛琴女士的評論，只不過從作品中感覺到的幾點印象和意見而已。

九月二日鉅耳

「總退却」出版于一九三三年，是五個短篇的合集，「一天」、「藍牛」、「總退却」、「枇杷」，其中「枇杷」、「犯」二篇又收在「磨坊」中，「磨坊」是四篇短篇小說的合集，除了上述二篇外，還有「磨坊」、「葉」二篇，「磨坊」是集中篇，出版于一九三七年，以上都是較前的著作，其中「磨坊」是在四二年才出版。伴侶包括八個短篇，「客地」、「伴侶」、「隱忍」、「鬥士」、「雪夜」、「呂克寧」、「守夜人」、「父子情」。是較後的作品。

順着寫作時間順序看，作者寫作的成熟風格的形成是很顯然的。「總退却」中的五篇，除收集到「磨坊」中去的二篇是比較成熟的，剩下來三篇可能是較初的作品，這三篇可取的地方都很少。「一天」和「藍牛」結構鬆懈，有時難于使人了解其主題。「總退却」中的人物，反映了當時創作中政治口號化的傾向。但到了「枇杷」和「犯」中，就顯出作者的大進步。這兩篇都從兒童的一個生活側面悲慘動人地表現了農村的貧困，不安與憤怒的隱微。這種進步是由於作者觀察的深刻而來。到了「磨坊」，便更顯示作者生活和筆觸向廣闊的方向的開展。這個進步很重要。處理像「磨坊」這樣廣大的題材，在中國女作家中還是非常少見的，密地刺到了抗戰以前的時期在日本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中國農村手工業的破產。如果，創作的廣大與深刻是不可分的，惟有在廣大基礎上的現實生活才能使一個作家能從容取捨題材，剪裁典型，在個別事件中寫出來週全而精確的形象。那麼，我們豈不應該特別重視在「磨坊」中所表現的作者的現實實踐與才能麼？

然而，就抗戰以後的作品而論，（我這裡所看到的只有八篇，也許是不公平地遺漏了作者別的重要作品吧？）我們一方面看到作者日漸在「小慧」方面，在題材處理與結構的精巧方面的成熟與動人，

讀者之頁

他其及組織的會工職際國

美門先生：

來信所列：「一、國際工會之實地」是「國際工會」的執行機構。總秘書歐文約爾斯是英國著名的機會主義者，正如別的工會主義者一樣，其興趣是集中在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去和資產階級求得諒解與妥協。這一個「國際工會」的組織來源是這樣的：一九〇二年第二國際在哥本哈根成立「國際勞動組合書記處」，實了「國際勞動組合運動之組織機關」的作用，是「國際工會」的前身。一九一三年正式改名為「國際工會」，成立「國際工會秘書處」，本部設在阿姆斯特丹，又稱「阿姆斯特丹國際」，亦即「黃色工會國際」。它是在叛變了工人階級的「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之理論的政治的指導之下，以各國之改良主義的勞動組合團體為

構成要素，是第二國際的基本部隊。

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一起，這些工人階級的叛徒們都去擁護和參加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祖國戰爭」去了，其組織就分解、腐爛和死亡了。但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平會議時又在英法帝國主義聯盟之下復活起來，與國際帝國主義之工具的國際聯盟的勞動機關密切地配合起來，去破壞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散佈改良主義的毒藥。國際勞工

一方面却感覺到作者向「俄國」方面的廣大發展是停頓了。這也可以從下面事實中看出來：在「伴侶」中的八個短篇，「各地」、「伴侶」、「鬥士」、「守夜人」、「父子情」六篇都相當好，其中尤以「父子情」更非尋常好，都說到了抗戰中市民生活的苦悶面，而「鐵錘」一篇雖然初期抗戰中一般救亡青年的幫助與幼稚，已經使人感覺到描寫的多於生活的，多像是一篇文學少像是一個真實了。在「呂克甫」中，作者寫着呂克甫「在鄂爾天地裡，噴過許多學校裏沒有讀過的書，放得步槍，捧得手榴彈，也和那其他青年一樣：眼睛軍隊打過仗，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在千萬人的呼吸中呼吸，在千萬人的成長中成長。他們的眼睛永遠望着前方，望着千萬人一致尋求挖掘的東西」。但在故事中也顯地顯現出來的呂克甫，以及作者處理這題材的手法，都使人遠遠地離開了能使人在整個光輝的方面所應有的境地。從呂克甫的形象說，它像是一個鬥鬥敗了但是個強烈的公雞，從題材的選擇上說，作者反映的並非是那為千萬人一致所尋求挖掘的人民戰爭，而毋寧還是戰爭中後方生活的一個側面。這個側面，從一個人民戰爭中的戰士身上表現出來，而作者對這種戰爭中的戰士却並不熟悉，因而這個側面也就未能很好地表現出來。

就作者處理題材的廣度來說，出現在作者筆底下的最多的兒童，作者對兒童題材的熱情和深刻，實在是空世無二的。其次是工人，青年市民，農民，婦女和士兵，直接地以農村生活為對象的並不多，但主要人物的兒童，大部分是農村兒童，而以工人青年和士兵的面貌出現的，我們正也能從他們身上明白地嗅出泥土的氣息。魯迅先生在「總退却」的序中說作者寫農村是於她為工廠。我想，在中國雖然城市和農村是那樣的含糊不分（因為我們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沒有造成這樣尖銳的對立），但是在幾個大城市，真正現代化的無產階級也還是有所謂廣大的存在的，然而作者筆下的上海工人（一天）却是驚人的。「警報」中的工人也充分具有農村氣質。就士兵說，「藍牛」、「總退却」都寫得不好。因此我們能說：作者所熱習的是兒童和市民，作者之對得熱習于農村，毋寧是因為作者所熱習的人物都那樣地充分地具有濃厚的農村氣質而為作者自然地反映出來了吧？

當然我不是認為一個作者非要把廣泛地描寫一切人物並且要描寫得好，我以為作者是應該向着所熱習的題材繼續努力去發揮其獨特的風格的。但是，不論我們只是描寫某類人物，一個廣闊的現實生活的經驗和知識是絕對必要的。這理由很簡單，因為一切人物之間都是互相聯繫的，當作家企圖通過作品向讀者訴求什麼，他作家必須先真正了解，而了解之第一義必須明瞭我們社會的整個複雜的結構，至少是瞭解。我們儘可以集中力量描寫某幾種人物，但是我們不能不去探知我們的人物，在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它與其他的人物的相互關係。當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才能給予我們的人物以正確的調色，我們才不致使我們的人物成爲被關在盒子裡的，從而才可能向於詩般的維偉闊大方向去發展。

在西安一個報紙的副刊上，曾經看到作者的一篇文章，題目大概是「女人與女作家」吧，作者強調作爲一個女作家應該在生活的各方面去反抗社會的和男權社會的黑暗與壓迫，大意大概是如此。這種「反抗精神」，似乎是我所需要的，但是我們從作品中看到的作者這種深淵的「反抗精神」，却

局長阿爾托馬以及國際勞務理事會的委員烏台格斯特，梅爾坦斯等，都是「阿爾托馬國際」的最高級幹事。做頭做尾的是資產階級壓迫和分化工人階級階級的工具。

這次，機會中我們以歐文的羅斯爲首，千方百計地要破壞真正爲謀工人階級的團結解放的「世界職工聯盟」，原不足奇怪。這正如法國總工會秘書所說的：「該國際彷彿只在它可能利用自己來破壞工人階級團結的時候，這才令人知道它的存在」。

研究國際職工運動發展的實際，還沒有一本觀點正確內容豐富的可供參考，商務印書館刊行過一本「各國勞工運動史」，也頗簡略。目前還沒有什麼適當的書籍可以介紹。如果你對這方面有很大的興趣，你可以到像青島的環境等處我們，可以替你提供一一些意見及介紹參考材料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中國勞工分局」，就是「國際聯盟」所屬的國際勞工組織的國際勞工局在中國所設立的。其成立的經過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國際勞工局長阿爾托馬來華一聘，一九三〇年三月派陳宗城回國籌備，於七月間正式成立於南京，在上海設立辦事處。一九三四年秋將上海辦事處改爲分局，南京分局改爲辦事處，一九四一年在重慶設立分局。

中國分局直隸於國際勞工局，分局長由總局局長任命之，經費由總局支給。在中國沒有工人組織。

其任務是根據國際勞工局的指示，約有以下數端：甲、與中國政府、勞資團體等技術機關聯絡感情，增進合作。乙、搜集國內勞工材料及有關勞工之社會經濟材料。丁、介紹世界勞工消息。

這完全是一個在改良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代價們聯合控制下替資產階級政府服務的團體。不能爲工人謀利益的，也從沒有替工人作過謀福利的事情。中國勞務協會，於民國二十四年在上海成立，選推定薩京士（社會部副長），陶百川（國民黨中

常常是表現于對於生活的細微以及生活的某一側面的洞察。我不以為這是不對的，但我們顯然越更難！有另一種的廣大的開展，把我們的憤恨與反抗在歷史的豐盈的路上作更大的努力。

作者顯示得異常的成熟的生活的側面的精細描繪，這種風格自然應該繼續保持。這種風格，我們差不多從作者所有的作品中都看得到，從最初的粗糙的如「一天」中已經顯示了，「一天」描寫上海工人生活中的一種不應有的宗教現象，這是從工人生活中的一個片段並使用側面的象徵手法表現出來。

——附帶說，我們雖然不應該過分強調與工人階級生活中心的一點，當作一個獨立的主題，我們應該從「宗派」現象中透視出工人階級集體主義的動機和本質。就是在今天的重要，從「新華副刊」中勞動生活描寫里屢次所反映過的一些光輝的片段來看，不也能够證明這點麼？例如，當阿金先生的「深夜」在報上發表了之後，立刻就在工人中引起了說助的熱情，那個被沉痛地描寫的實在的人物，因此獲得了一種同階級伴侶中來的那麼動人的偉大的同情與援助。因此，從「一天」來看作者初期的創作意識，也表現了在當時文藝水準上慣有的錯誤的現象。

繼續下去，在「磨坊」中，從一個童工的生活的片段，反映出他們的痛苦，在「枇杷」中顯出了作者的成熟，從一個枇杷，從一個孩子的口腹慾望發展開去精神地抓住它，動人也呈現了農村生活深層的痛苦；在「藥」中，從一個女人害病的側面集中地表現了工人生活中的粗魯與愛情；在「客地」中，從一個死了家長的孩子的半天生活中，描述了戰爭中流亡的人民的悲慘；在「伴侶」中，由一個醫院的孕婦的病痛情緒，刻畫了今天社會中孩子們的受難；在「鬥士」中，從長途汽車上的一個片段，作者含蓄地苦笑着描寫了市僧的狡猾；在「父子倆」中，從一個城市的街頭的一個平凡的故事，顯出了一個失業的小公務員的悲哀。……

從生活的高象中尖銳地抓住了一個戲劇性的片段，然後緊緊地集中地在這個片段中展開了被描寫的對象的全部悲慘和不幸，這而就是作者所慣用熟練了的手法。

我們在作品中的對話和敘述中看出作者的另一個特點。如果我們把作者初期作品和其後來的作品對照，我們可看出人物的對話從單純激烈的叫喊發展到含蓄而悲哀的憂鬱；然而憂鬱中又常常流露出不少不失其明快的個強。而越到後來憂鬱的成分越多。為什麼要叫喊？作者感到的太多，而看到的還不多，為了充分表現其所感，言語上就誇張了起來，「一天」，「葉中」，「離遠却」就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典型的深刻發掘，典型的心理刻劃就不够。這自然不但是技術問題，深入對象，擁抱生活不足，於是臨淵悚息，有時就把政治論文也搬了出來。從時喊的發展到含蓄的，這是個大進步，這從「伴侶」，從「呂克齊」，尤其是從「深夜」中可看得出來。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却仍然不失其直率與個強，作者善于寫兒童，而尤善於從兒童的天真明快的語言中映現人物。但這種明快已不同於初期作品中的單純叫喊了。在「離遠却」中，作者對付軍隊中長官壓迫下級士兵的惡劣行為是給予士兵以一連串的咒罵和絕然地反抗力，作者把給予了在舊式軍隊中士兵們傳統的無組織和怯弱的意識的束縛，忽略了反抗的意識的成長是要經過一個艱苦的長期的曲折的過程，於是士兵的反抗成爲了單純主觀的爆烈的呼喊。但在較後的作品

委），朱學範等爲理事，朱氏爲理事長。巴里度中央黨部及內政部備案，爲一合法之團體，二十七年遷漢口，同年七月間由國民黨政府各機關派駐陪都。中央社會部特准中國勞動協會代表中國工人加入「國際工會」爲會員，二十八年七月朱學範代表出席國際工會聯合會。

這個組織，初僅限於研究性的，會員不一定全是工人，其宗旨是：「本會以根據三民主義，研究勞動理論，建設勞動文化，協助勞動福利，復興中華民族」。三十二年經過修正之會章上，在宗旨一條加進「……促進勞工運動」一句，自此以後，在工人中也進行一些宣傳組織工作。刊行有中國勞動月刊，中國工人週刊。

這個組織對勞工的指導目的是：「勞動合作在理論和行動的引導，引導勞動發展親密的合作……」（中國勞動月刊發刊詞）。

關於它的活動情形及對中國工人運動的見解，你可以訂閱該會出版的兩種刊物。

關於第三個問題：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現有工人組織不應參加，以及參加以後怎樣對付的問題。關於前者，我們認爲必須大加地參加到一切合法的現有工人組織中去進行工作。這雖你也要問在國民黨區域的工人組織總是不代表工人利益的，參加進去的意義並不大。

是的，自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以後以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上海總工會（老工會）突擊隊解散後，在國民黨區域一切的工人組織，就「必須在本黨（指國民黨）領導之下」（國民黨勞工政策八五頁）才能公開合法存在，這就是說，工人的組織都給官方包辦把持，變成爲不民主的反應的了。但是，我們無論如何要承認一個事實，這些組織多少是有黨性的，也可能在工人羣衆中間散播影響，正如來信

「批把」中，作者却描繪了一個展示了悠久的貧困與不滿的氣氛，而後在一個中了毒的毒藥的毒質的孩子身上，爆發了理所當然、理所應得的憤恨與反抗。在「犯」中，經過了長期的屈辱，而後在一個當工身上，爆發了憤恨與不屈的意志。

我們所表現的不僅是英雄的反抗與不屈的意志，我們所要表現的應該是這種意志怎樣從長久的歷史和現實中必然地生長出來。

越讀越來，作者的作品中越趨流露出含著更多更痛苦憂鬱，戰後的作品差不多完全如此。但是在這種憂鬱中也同樣顯露出那種不屈的憤恨與鬥志的。這正是相反相成的。抗戰以來，殘酷的現實使人們認識了這長久歷史的痛苦的真相，當沒有覺醒以前，客觀上令人慾氣沖天的在一切方面表現出來的社會政治經濟的漫長的黑夜，然後加上了主觀門焦渴與不耐，於是就會在人們，尤其容易在知識份子們身上發生一種被窒息的痛苦與鬱悶。如果我們不絕望，如果我們眼光堅定的看著前途，那麼這種憂鬱不是一件壞事，它正證明我們已開始深入於生活的裡層了。在這種意義上，「雲裏」中的：

「雲霧深處的街心，兩個模糊的人影對望，許多的時候沒有動。

一陣遠去的更聲，像什麼人在那飄揚飄揚的，悽然地在嗚叫的北風裡迴響着。」

「呂克寧」中的：

「後院泥地上，滾着一層霜。呂克寧發瘋似地從那霜地上奔，直奔到池邊邊的西湖柳底下，他要那自己似的狂的坐下，望着天壁上的一顆星。三更後，天上起風了，西湖柳發狂狂的搖着，呂克寧依舊咬緊牙，望着天壁上那顆晶瑩瑩的夜星。」

顯然使我們感覺到不同於「悲傷」，「犯」那樣的激着積極的鬥爭的勇氣，可是如果說「父子使」那情悲慘的故事中，從那孩子的天真明快的語氣中，豈不也是可以看得出作者在經歷了更多的痛苦，抑鬱而更少的動盪中，仍然保持着她對光明地對人生前途的希望麼？

要說有給是難免的，有時是感為更高階之發展的踏踏石的，然而它不足為訓。在一切場合，在一切時間，咬緊牙，忍着痛苦，跌倒了又爬起，始終算住我們的筆，堅決地相信我們的筆，一點一滴地寫了人類歷史的進步而前進，這是我們今天所必要的克服憂鬱的精神。我們希望在一九四二年寫「父子使」的作者，到了一九四五年寫「女性和作家」的作者，已經確實從若干憂鬱的失望的克顯中在更高階級上復回到「批把」，「犯」中的堅決的奮鬥了。

至於作者的一切作品和一切人物中，水靈地透著悲哀，不幸，憤恨和反抗，這種沒有笑，沒有一切紳士淑女甚至小市民的附庸，這種只有眼淚，只有無窮地燃燒著的復仇的火焰與光芒。這種可貴的風格，從我上而敘述中，我已經不必再詳陳了。

一九四五、九月。

所說，你們的工會扼殺了一次工人的會鬥鬥而工人還對他們抱著幻想，就是很好的例子。從這點上來看，參加工會工作已是具有重大的意義。這對我這這樣的話：「不在反動的工會內工作，就是犯十分覺悟的，或落後的工人放棄，委棄於反動階級的勢力之下，委棄於資產階級走狗，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的高階工人階級力之下」。

參加進去怎麼辦的問題，就是如何根據具體情況靈活地運用統一戰線的作法來保障工人利益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從實際的工作中我對進入工人階級中去的道路，進行宣傳教育，組織以及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必要的鬥爭，以逐步地提高工人的覺悟程度，達到保障工人利益，使工人羣眾脫離反動的以及一切有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工人自身利益而鬥爭的每一具體事件上，去調查研究這些工人組織所採取的態度和作法，探入地找出它為什麼要這樣的原因來，與我們的態度和作法有何不同之點，又有那些是相同的，或者根本是沒有共同之點，從實際求是的調查研究中，來正確地決定我們在那些方面可以合作，那些方面應該加以排斥，揭露，或者作必要的容忍來增加對於教育和組織工人的有利條件。

只有這樣作，才能解決所謂態度問題，因為對於現有工人組織的態度之最後抉擇，主要的還是依據於這個組織在每一個有關工人的切身問題上，對於工人利益保障的表現而定，不能離開了具體的事件來空洞地談態度問題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就談到這些，希望你認真地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提出來討論，我們是樂於盡量地提供意見，作為你的參考。

編者 十一月十一日



美國人民的利益與安全烏乎在！

黎 望

當中國人民想起美利堅合眾國的時候，總是想起這出生過華盛頓、傑佛遜、林肯、威爾遜、羅斯福這些偉大心靈的國度。總會聯想起獨立戰爭，解放黑奴；想起揭發過的「民治、民有、民享」，「民主的政府永不能毀滅」的傑佛遜、林肯的思想；想起獨立宣言所保證的一切人的「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不可割讓的權利」；想起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不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想起羅斯福總統標榜的四大自由；我們也清楚的記得，這裡面就申述了每一個民族的人民有自由決定他的政府形式的權利。當我們想起這些逝去的巨人，這一個曾經誕生過許多先賢的國家，這種追懷會喚起過無數的人對自由生活的嚮往，鼓勵過許多為自由而鬥爭的戰士的信心。而且在中國人民經歷的艱苦戰鬥中間，美國人民從道義的聲援，物資的援助一直到併肩作戰，中美人民傳統的友誼在共同戰鬥中是用血汗來鞏固了。

然而，今天中國人民對美國的友誼却遭逢着嚴重的考驗，中國人民不能不對曾經併肩作戰過的盟友的行動感到困惑，對於美國友人不公平的措施感到憤慨憂鬱了。

像自由世界的一切人類一樣，美國人民也一定和中國人民一樣的渴望和平與民主的生活，但是今天却有一部份美國人違背了林肯、威爾遜、羅斯福這些先賢們的思想，在用「不公平的干涉」的「政策」

去扼殺那些曾經併肩作戰的中國人民，那些為着追求自由與民主生活的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鬥中間，中國人民沒有流完的血，又將在這種「不公平的干涉」政策下繼續的流淌，中國人民經歷了八年餘的戰鬥還是創痛猶新，今天却不能不繼續遭受苦難；而這些執行砲艦政策的人，無疑地是違背了美國人民的意願，是違背了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的精神，是違背了羅斯福總統援助「一切自由民主的人民，不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的遺訓」。

中國人民經歷的八年艱苦的戰鬥和今天所追求的正是獨立宣言所保證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割讓的權利」。中國人民用血汗爭取到勝利的戰果，但却有人夢想着獨佔和榨取勝利的果實。要便耕耘的人得不到收穫，要以一個專橫的主宰來代替法西斯的統治與奴役，希望在掙脫了鎖鍊的人民的脖子上又加上一根新的鎖鍊。但，有一個顯明的事實，經過了八年戰鬥的錘鍊，中國人民已經空前的覺醒了。「從奴役的狀況下解放出來的人民，是不會回到被奴役的秩序了」(H. 華萊士)。我們「作戰以保持自由」，而今，曾經和我們併肩爭取自由生活的盟友，却轉而要扼殺我們爭自由的願望了。

管偶爾如何巧飾着要搶掠租界物資的標記，而這些由美國人民的血汗所製成的保衛自由的武器，是會永遠烙印在那些傾在血泊裡的爭自由的人民的心上。而今天在華北，美國人民製造的武器，又用來屠殺中國人民了，從不合理的運兵受降，對反民主力量物資的接濟，軍事指揮，公開的讓路，甚至於轟炸那些手無寸鐵的和平人民，所有這些都是嚴重的損傷了中美人民的友誼，嚴重的損害了美國在自由人類中間的威望的。

所有這些損傷中美人民友誼的行為，正如美國社會服務員工會所指出：「因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趨向是在支持中國政治上某種少數力量，而這種少數力量是在維持中國的封建的落伍勢力，以阻礙中國民主的發展，同時美國這種對華政策已使美國許多官吏及記者給美國社會對中國一種不正確的認識。」正因為美國這種維持少數落後力量的行為，就使得這些少數反動力量能夠放手進行反人民，反民主的勾當。雖然僞善者口口聲聲說：「不干涉中國內政」，「不直接干涉中國內政」，而「砲艦政策」的直接結果，是中國人民的受難和死亡，反人民，反民主的力量愈益猖獗，這種「不公平的干涉」，顯然是違反中國人民，違反一切自由人類的意願的。

像任何違背人民意志的事情，總不能不尋找一個個人的藉口樣，這些「砲艦政策」的執行者尋找

內政部發新登記證警字第陸捌陸伍號

掩飾的是「協助」受降。在廣大的北平原野，中國人民的軍隊不正和敵偽戰鬥，包圍敵偽嗎？有何必要要這勞苦我們的友邦來「協助」呢？華北人民還在抗戰初期，軟骨病者曾向敵人乞求讓渡，卑怯的遺棄了人民，但華北的人民始終沒有向敵人屈膝和妥協，堅強的戰鬥着；為甚麼這些八年堅苦抗擊敵偽的軍民沒有權力受降，而那些在敵人來時遺棄了人民的軍隊却有權受降呢？說是「協助」受降，但不平的日軍不仍然在橫行無忌，甚至在改組敵人為「反共志願軍」，改組偽軍為「北上先遣隊」嗎？在這些所謂「協助」受降區裡，敵寇的騷擾不是連美國士兵也覺得「頂不好」嗎？而在解放區，却是徹底解除了敵人的武裝，由人民的意志來懲處漢奸，這是任何不懷偏見者所共同承認的。北平新聞聯盟的記者斯蒂芬·安德列斯在對北平和平張家口後，就坦白的指出：「北平一切漢奸和日本戰爭罪人逍遙法外，繼續橫行，沒有受到管理上制裁，可是張家口却大不相同，我看見許多戰犯正被政府搜捕，廣大人民可以起來控訴他們的罪狀，這是真理與正義的表徵，這是該市市民擁護民主政府的原故」。從這裡，我們不難看清楚，這是中國人民無力受降而必須借助友邦呢？還是這種扶助少數及功力的政策，助長了這種不合理的受降呢？

如辭似乎並沒有因此而窮，據解釋這種不合理的干涉政策是「美軍將保護美國的生命財產，如果美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損傷，將予以有力而無畏的抵抗」，不管法利賽人是如何偽裝，是無法掩蓋其貪婪與偽善的，美軍今天憑着砲艦登陸的華北，美國人究竟有些甚麼「生命財產」需要砲艦去保護呢？我們無妨聽一位美國議員孟斯非爾德的話：「真的，在那裡（指華北）並沒有美國的商业利益，也沒有美國僑民住在那裡需要我們去保護，如果這個政策（指這種不合理的干涉政策）繼續執行的話，

那麼，我國在那個區域裡的士兵的生命就會被捲入到危險的漩渦去」。華北原來就沒有甚麼美國的「生命財產」需要保護，但却偏要驅使美國士兵捲入這和危險的漩渦，既然開去了美國的軍隊，因此也就有要保護的「生命財產」。循着這種奇怪的邏輯，美軍可以開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去，因為開去了，「生命財產」的安全要「保護」，就可以繼續派去軍隊與砲艦，「生命財產」愈大，保護的力量也就更需得大；如果誰表示拒絕，就可指為這是受到「攻擊」，就可以放手去進行鎮壓自由人民的戰爭。這種不合理，不公道的干涉，不僅是破壞了中國人民對美國的友誼，扼抑了中國人民爭取「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不可割讓的權利」，降低了美國在民主世界的威望；而且這也是直接損傷到美國人民的利益。遠見的美國人早已洞見到：「中國的內戰可能威脅美蘇的友誼」，中國「長期的內戰，無疑地要阻礙中國成為美國物資市場的恢復力」（上引文見「新共和」A·鮑思文），紐約時報也曾指出：「贊助任何一方去進行內戰，這不是我們的事情。正當的事情是我們必須利用我們的影響來求得協議與和平」。

我們記起「下午報」的發行人藍納的一句話，世界不意分成了兩個，「一個是為恐懼所苦惱，用殘暴去緊握住它的權力的資本主義。但我們却想正當這些仗着權力而企圖左右別人，企圖用不合理的干涉來阻抑自由人民的願望者，中國人民已經空前的覺醒，任何斯考比的企圖，都將要受到嚴酷的幻滅。

對於一切繼承了林肯、傑佛遜、羅斯福民主傳統的美國人民，我想複述一句湯姆·潘恩（Tom Paine）「常識」裡的話：「現在是大陸的團結，信仰榮譽的播種期的。現在一點點的破壞，將像用針尖在一棵幼年的橡樹嫩皮上刺一個名字一樣，那疤痕會跟着樹的生長而擴大，我們後代子孫所讀到的，將是長大的字跡……」對於一切懷着民主思想的人，這自然只是膚淺的常識。

羣衆

第十卷 第二十二期

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 本期零售 一百二十元
- 六期 三百六十元
- 十二期 六百五十元
- 廿四期 一千二百二十元
- 外埠郵費平寄每期四元掛號三十四元
- 航空十六元航掛四十六元 國外照加